

话说中国

百年记忆

卷一

主 编 李 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孙中山遭到驱逐	(1)
袁世凯逐渐成为中国军界的明星	(8)
一样的难题	(17)
孙中山当上了“本党总理”	(23)
革命思潮在南方涌起	(27)
辛亥革命	(32)
孙中山的两个秘密武器	(32)
黎元洪糊里糊涂就当上了都督	(38)
当选总统,和谈不成	(44)
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	(52)
孙中山被迫让位袁世凯	(54)
共和与专制的较量	(63)
袁氏独裁专制	(63)
唐绍仪拂袖而去	(67)
内阁混合	(72)
陆征祥内阁的风波	(76)
张振武之死	(82)
孙中山转向实业救国	(88)

“民国政党,唯我独大”	(93)
孙、黄联袂北上	(97)
复辟与反复辟	(103)
袁氏帝王思想的多元因素	(103)
辛亥后两股复辟势力的交错	(110)
“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一步”	(117)
《共和与君主论》	(122)
“筹安会”推波助澜	(127)
梁士诒后来居上	(133)
洪宪帝制粉墨登场	(137)
全国讨袁的声浪	(138)
中华革命党的斗争	(143)
孙黄重携手	(148)
梁启超师生的猛醒	(153)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159)
蔡锷一去不复返	(165)
蔡锷与云南独立	(168)
一枕黄粱梦	(173)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179)
独夫民贼之死	(185)

孙中山遭到驱逐

1897年8月2日，自英国维多利亚始发的皇后号船到达日本横滨港，清廷驻英大使罗丰禄在接到船到港的消息后签发了这样一个文件：停止追踪。大英帝国伦敦司赖特侦探社的专职侦探们也长长舒了一口气：终于这个中国人滚蛋了。

这个中国人叫孙中山。他下船后直接去的地方，是在日本的外人居留地137番旅馆。在那里，有一大批革命党人等着他。按照现时的说法，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危险分子”，无论他到了哪个国家，都有被驱逐的危险。英国政府的内部文件是这样描绘他的：“孙逸仙先生，一八九五年离去香港。当是时，香港政府据报：中国发生革命，党人几度举义，谋夺广州，孙均与于其事。嗣据探报：孙将有回港之行，香港政府行政委员会遂下令将其放逐出境。彼未违反当地法律，未被控告，亦未被官厅审判成立罪状。该放逐令现且是否有效，或有无为之申请撤销等情事，本席概无所知，容当另行前往查明真相。”

孙中山先生只有暂住日本。

英政府1895年放逐中山先生，系援引1882年，第八号条例办理。这一条例内容，原是香港政府1855年1月15日，正当太平天国革命时颁发的。其内容是取缔当地官民干预中国内政。1856年，又下第一号条令，予以补充：太平天国党

羽在香港图谋补充军粮，并于九龙募兵，使香港治安受到影响。1857年1月5日，港府又颁布“维持地方治安条例”。1882年又重订为第八号放逐出境条例，其内容为：“凡在境内之外籍人民有危害治安之嫌疑者，得下令驱逐出境。”1896年，英港政府即据此，不允中山先生返回香港，并下放逐令。但是，孙中山先生并未在香港境内起义，更未扰害香港治安，而竟下令放逐，不但不符合国际法，亦不符合香港政府的地方治安法，完全是以“妨害邦交”为由，并不问什么国际法及其政府之有关法律。香港政府以前放逐孙中山先生，完全没有法律根据，是不合法的。但是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惟利是图，惟势是趋，对于在野的百姓或革命家，是完全可以任其意而行的。其不允许在本国和领地逮捕入境外籍人，主要为维护自身主权，并非同情与支持革命家等。

这时，为国为民的中山先生，真是处于万分艰难的逆境中。但八天之后，孙中山先生得到日本东京政府正式签发的侨居证，暂住日本，并在日开始一系列活动，并与国内的康有为、梁启超进一步接触。这一切，都是犬养毅等日本友人的全力帮助所致。

早在1893年，中山先生已与康有为有一次不愉快的交锋。当时，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学，好看西书。后长兴学舍移于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与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甚近，孙中山先生常至书楼行医。得知康氏有志于西学，欲与结交，但康有为太狂妄自大，一定要孙中山先生先拜他为师，方可见面。孙中山先生见事不可为，便不再提及此事。

康有为及其弟子，当时提倡新学，固属进步之举，但康

氏自号长素，弟子陈千秋号超回，麦孟华号驾孟，韩文举号乘参，颇为时人所怪，而平心而论，此种行为亦太狂妄而不尊重先贤。轻薄而肤浅，绝对不足为训。

就在 1893 年的冬天，时年二十八岁的孙中山在与康有为谋面无缘，堪称十九世纪末中国两大“民间巨头”擦肩而过之际，在广州成立了早期的“兴中会”。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由一群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讨论时局的书生们组成，由孙中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纲。此时之孙中山，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在创立兴中会不久，他即萌发了上书李鸿章的念头，他非要和这个掌握中国时局的关键人物“谈一谈”不可。1894 年 2 月，孙中山先生和陆皓东找到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其写信帮助介绍。这样，孙中山先生特意赶到上海。

在上海他们见到了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王韬亦系早期改良主义者，著有《韬园文录》，主张变法甚力。

王韬特意对孙中山先生的上书进行审阅，并修改润色，对孙中山先生表示十分赏识。

同时王韬也写了介绍信致李鸿章幕僚罗丰禄。中山先生的上书最后经罗丰禄的同事徐秋畦呈交了李鸿章。但李鸿章对此不屑一顾。这件事可能对孙中山的刺激非常大。他由对政治的过份的热情转而进入对极权的仇视，自此，内心深处便逐渐由维新转向革命。而当时稳坐权力顶端的李鸿章可能也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三番五次要找他理论一下的青年医生，组织了十几次血腥的武装暴动，葬送了他赖以维系的大清帝国，最后的赢家是后者。

孙中山自此自称“革命家”，活动频繁，并为当局所注目，同年10月，孙中山领到了出国护照，送经日本转抵檀香山。11月24日，中山先生在檀香山重建兴中会，把兴中会由原来的只以倾覆清廷为目的的宗旨，改变成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集会成立地点，是卑涉银行（BishopBank）何宽经理家。出席会议的人有何宽、李昌、刘祥等二十余人（二十三人）。

主席为孙中山先生，誓词由李昌宣读，中山先生首行入会议式。其办法如下：

把开卷圣经放在左手上，右手向上高举，恳切求上帝鉴察，然后照誓词宣读：

“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神明鉴监。”

然后讨论宣言和章程，并推举职员。永和泰商号司理刘祥和何定分任正副主席；永和泰商号司账黄华恢为管库；程蔚南、许直臣为文案；李昌、郑金、邓前南等为值理。

同时决议发起募集革命军债，并议定革命成功后，以千还百，集得款项数百元。中山先生兄长德彰公捐款最多，其次为邓荫南。同日，会员开始交会银（会底银），每人五元。至1895年6月2日，共收（共58人交银）银二百八十八元。德彰公和邹松盛等又捐献一千一百元，共一千三百八十八元，这是兴中会当时的总经费。

1895年1月，孙中山为回国策动武装起义，自檀香山经日本回到香港，回港后，孙中山入立即邀集旧部陆皓东、郑

士良、陈少白等，于2月18日在香港中环坭顿街十三号挂一乾亨行招牌，也就是兴中会会所。“乾”为天，“亨”为通，当时兴中会的人认为，满族达虏的气数已尽，汉人的天象已是否极泰来，通达无阻了。至此，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

3月13日，孙中山先生开会商讨广州起义计划。16日，兴中会召开干部会议，决议攻取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同日，陆皓东提议用他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旗，会议一致采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青天白日旗”的由来，1928年，中华民国正式采纳此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又经过一个多月时间，至10月6日，攻取广州军事计划始定。起义时间为10月26日，阴历九月初九。香港方面由杨衢云、陈少白、黄永商、邓前南负责，谢缙泰负责联络工作。以杨主事，具体购买军械和招募壮士等。广州起义则由中山先生主持并和郑士良、陆皓东共同负责。

10月10日，兴中会总部选举总会长，名曰：“伯里玺天德”，即英文 President，大总统之意。意思是起义成功后，总会长任大总统。

一开会议，当然一致通过举孙逸仙当总统。通过之后，大家就同孙先生拉手，恭喜道贺。这件事情办好，孙先生就想先到广州，预备不再到香港来了。

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对先生说：可否把总统的地位让他，以后到省城，事情办好了，再还给孙先生。孙先生听了这句话，觉得事情还没有开始，同志间就发牛地位之事，非常痛心，精神也受了一个很重大的打击。所以就约了陈少白、郑士良三个人开一个会议。郑士良听到孙先生说明上面

的事情，就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他不可！”陈少白表示不同意，“这是不对的，杀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了；我们还能起事吗？照我的意思，我们先入省城办事，办成功就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当总统是没有关系的。”孙先生就依照陈少白的意思在当天晚上再开一次联席会议。在会议上，孙先生就自己提出来，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在事前既然说妥了，会议表决，也无异议，让给杨衢云做总统。第二天，大批起义人士到广州去，只留杨衢云一个人在香港。这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让位。

后来的起义，也主要坏在杨衢云的手上。杨衢云因为已有“大总统”之实，竟先组建了自己的“总统卫队”，并配以良枪，引起人心不服，造成指挥失灵。杨衢云于是电告孙中山，须迟两日出发。就在这两日之内，广东官府已得知密情，调兵一千五百人回省防卫，事机遂泄。孙中山先生26日接杨衢云来电：“货不能来。”因当时事机已泄，便回电杨氏：“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哪知电到之时（27日），枪械、人员均已装船，杨明知不可，也未加阻止，仍令朱贵全、丘四向广州进发。并回电孙中山先生曰：“接电已迟，货已下船，请接。”

当保安轮抵广州时，广州党人已无法接应，而船中枪械，又因临时移位而被杂货积压，一时无法取出使用，被南海县令李征庸及巡防管带李家焯截获，捕走四十余人。并同时在全城内大搜捕。这是革命党人的第一滴血。当时参加起义的，大多是一些绿林勇士，在他们的意识中，革命还是个比较模

糊的词儿，而且起义的直接动机也是大汉民族主义的理想激励了人们，但是鲜血的流淌毕竟表示了他们的激情和勇猛。

中山先生闻变后，非常沉着，事败后三日，仍留城中。于29日经澳门至香港，又转至日本。孙中山到达神户时，已经见到日本报纸对他的专门报道：《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

清政府的通缉令是这样给这次起义定价位的：

孙文，即逸仙，香山县东乡，翠微人。额角不宽，年约二十几岁。花红银一千元。其次，杨衢云，三十九岁，花红银一百元。

陈少白名列第八，花红银亦一百元。

这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名闻朝野，也由此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涯。

同年（1895年），中山先生决意远游美洲，并向华侨募集资金，以再次起义，于是向各同志商借五百元，作为旅费。但各同志皆谓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拿出资金来。赵明乐为此辞退管库一职。幸亏冯镜如、冯紫珊兄弟二人合借五百元，中山先生才算筹到了旅费。他从中拿出一百元付陈少白，陈断发改服；又拿百余元付郑士良，再赴香港收拾余众。1896年1月，中山先生也断发改装（西服），将“猪尾巴”割掉，成为职业革命家，只身再赴檀岛。中山先生走后，因陈少白不善交际，会众日少，又不每月交费，办公日益困难。

袁世凯逐渐成为中国军界的明星

正当孙中山奔走英美，又被英美各国政府驱逐，最后辗转日本、彷徨无计之日，在中国政坛和军队，冉冉升起了两颗新星。他们就是袁世凯和康有为。

清朝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使清统治阶级认识了两点：一是满籍军队绿营已腐化到不堪一战，不可依恃，而汉人的战争潜力是巨大的；二是由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对清廷的忠贞，使清廷的统治集团认为汉人仍可信赖。清末的垂危王朝能苟延数十年，便是由于这个信念得到证实。可是这只属于对内而非对外。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对于外国一直视为番邦，从没有以平等地位相待。鸦片战争后虽饱受列强的欺凌和迫害，也并不觉悟，直到甲午中日之战，才真正认清自身力量的薄弱可怜。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清朝的海陆军面对小日本竟不堪一击，这一个刺激结束了清廷朝野的旧观念，于是在军事上要整军经武，西法练兵；在政治上要变法图强，除旧更新。

整军经武落到袁世凯身上，演变成北洋军阀自成一系，这是当时清朝统治阶级所没有预料到的。而变法图强则分为两途：一是康有为公车上书，导致维新运动；一是孙中山先生领导全民革命，创建中华民国。

袁世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成了宠儿，对清王朝来说，他取天下于革命党；对革命党来说，他则是继承清王朝的天

下。

对于康有为来讲，他则成了这时代的悲剧。本来他可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而命运莫名其妙地让袁世凯捉弄了他：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人沉下去了，而另一个人自然浮上来。

袁世凯是河南陈州府项城县人。袁家在当地是一个世家，袁世凯的叔祖曾官拜总督。在 1880 年（即光绪六年）冬天，庆军统领吴长庆督办山东海防，年轻的袁世凯离开家乡，来到山东从军。1882 年 6 月，朝鲜发生兵变，请求清政府派兵镇压，直隶总督张树声乃派吴长庆率军前往，剿平乱事。事后，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16 字奖语，列袁世凯为首功，咨请李鸿章、张树声会奏请奖。九月初一，袁世凯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

一个人的成功决非偶然，他必须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成就，然后加上机会。

就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步点。世人以为袁从小站练兵起家，其实如果袁在朝鲜没有杰出的成就，清朝练新兵的责任就不会交给他，他不在小站练兵，光绪和维新党也不会选中他劝王，他没有谭嗣同要他勤王，就无法向荣禄告密而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所以朝鲜的成就是袁一生的开始。

清朝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有过三种军制：最早的是“旗兵”和“绿营”；到了曾国藩组织乡团后，所谓湘军、淮军，官式名称叫做“勇营”。

旗兵是清王朝的原始军制。

旗营的官兵是世袭制度，腐败之极，竟有列名行伍而不识弓箭为何物。光绪中叶，外侮日亟，满族有远见的王公大臣，乃有整顿旗营之议，派遣八旗子弟出洋留学，如荫昌、良弼等都是。同时积极整理各省驻防旗兵，挑选精壮编成“八旗练营”；有“洋枪兵队”、“洋枪马队”、“备练马队”、“洋枪步队”等编制，聘任教官为新式的训练。可是八旗子弟娇养已惯，满洲人当年勇武矫健的风气已经完全丧失，所以整顿自整顿，旗营的腐化已至不可救药的程度。

绿营的制度完全依照明代，官兵全是汉族，因为所用的旗子颜色是绿的，所以称为绿营。归兵部所辖。到清末绿营缺额在半数以上，也是腐化已极。

旗营、绿营既成废物，曾国藩招募土著编练“勇营”，就是后来各重一时，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和淮军。湘淮两军虽恃功而骄，但数次对外战争，全一败涂地，旧军的弱点完全暴露，于是清廷下决心编练新军。

李鸿章在直督任内时就锐意摹仿西法练兵，办了一个天津武备学堂，由戈登代为购置新式枪械，聘请德国军官为教练，由满人荫昌为总办。可惜军事教育和军队组织并不能配合，因此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被分派到淮军的各军去担任教习，教练新操，而军队指挥权则仍旧在旧统帅手中，一切战略战术依然陈旧，因此甲午之战，淮军一败涂地，淮军中最有名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全军覆灭。这时清廷上下恍然大悟，仅只是西法练兵还不够，整军经武必需彻底的大改革。于是两江总督张之洞首先练自强军于吴淞，聘用德国教官，一切规模体制全部仿效德军。另一方面在北洋操练定武军十

营，假小站旧日盛军的营地为练兵场。盛军原在小站屯田，所以有完整的营房和已开垦的稻田，由于盛军覆没于中日甲午战争，因此小站也随之荒废，定武军即以此为营房。

光绪廿一年（1895年）十月，醇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会商奏请改革军制，逐步训练新军以代替完全不能“保清卫国”的绿营，于是便在北京附近训练新军。这时直隶总督是王文韶。清廷最初是派长芦盐运使胡漪淇到小站练兵，这支军队命名“定武军”，聘请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几个月后，胡漪淇迁调为芦汉铁路督办，于是满清政府改派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头衔，留在小站接统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定武军原有4000余人，袁接统后便扩充为7000人，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

由于小站练兵完全新式，名目既多，花钱也不少，因此被一般守田人物所攻击。光绪廿二年（1896年）御史胡景桂上章参劾，认为小站兵事浪费国库，清廷派荣禄到小站详细检阅，同时考查训练进步情形。荣禄当时是慈禧的红人，他视察得非常仔细，也因此更深一步赏识袁的才干，和他所练新军的成就。

荣禄的报告到了慈禧和光绪手中，这两位最具权威的人物也对袁有了深刻的印象。

光绪这时锐意革新，虽然他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他能接受新的事物、新的建议。袁世凯因为练新军颇有成绩，加上他过去在朝鲜的种种作法，使光绪开始对这个小小道员有了好感。

慈禧也对袁有了认识，因为她对于荣禄的话是言听计从

的，荣禄曾亲自看过袁的练军工作，并且对袁甚有好评，则袁的能干有为是必然的了。

小站练兵给了袁世凯表现能力的机会，有了建立羽翼的条件，徐世昌、唐绍仪、冯国璋、段祺瑞等成了他的幕僚，也使他获得那时代最有权势的人对他的重视。慈禧特赏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和乘坐拖船，这些特权都是对一个大臣的无比殊荣。

反观康有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香门第出身。他少有大志，想做中国儒家的圣人。曾一个人躲在深山读书，又游历了大江南北，熟读了当时流传于中国的西洋著作，产生变法的思想。

康有为除了在思想上抬出一套东西支持他变法而外，他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来实现他的理想。他了解当时清廷的守旧人物都包围在西太后的周围，要想突破这个守旧围墙以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使用全力向清德宗光绪皇帝下功夫。当时慈禧已经撤帘不亲政事，光绪又是一个忧愤国事的青年皇帝，康有为先后八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的刮目相看。两颗忧愤的心灵在一起相撞，它的结果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历史由于这次碰撞而有了一次拐弯。

光绪廿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下午三点钟，康有为和当时清廷著名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会见，地点是在总理衙门西花厅。这是一幕精采的辩论会。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祖宗之法是为了治理祖宗的土地，如今祖宗的土

地都不能守，则还守什么祖宗之法？举例来说：现在谈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不是祖宗时候就有的，因时制宜是适应需要。”他的回答驳倒了荣禄。廖寿恒问：“变法如何着手？”康有为答：“应从改革法律官制入手。”李鸿章问：“那么六部可以尽撤，则例可以尽弃吗？”康有为答：“法积久而弊生，而且今昔异势，现在的法律官制实在应该改弦更张，就是一时不能全改，也应斟酌情形逐步更改，这样才能推行新政。”接着他从政治谈到经济财政，又说日本因仿效西洋维新而富强，如今制度已很完备，中国和日本邻近，应该向日本学习。这次谈话由三点钟谈到天黑才散。

1898年4月28日，清晨。康有为又一次入朝觐见。

他在外书房见到了荣禄，和荣禄先谈了一阵变法的细节和步骤。荣禄和康谈了一会便先上殿见皇帝，光绪问荣禄和康有为谈了没有？荣禄说：“康是辩言乱政。”荣禄退出后，光绪立即召见康有为，年轻的皇帝用兴奋和亲切的颜色和康谈话，先问康的年龄籍贯和出身，然后便叫康陈述政见。

康说：“中国已到了存亡的关头，外国侵略是永无止境的。”

光绪说：“这都因为我们太守旧。”

康说：“皇上既然知道守旧弄得这样糟，就该变法维新。”

光绪说：“所以现在非变法不可。”

康说：“近年来已有变法，但只是少变，所谓变法而不全变，结果不会有什么成绩的。须要把制度修改，应该先开制度局。”光绪说：“对，对，对。”康说：“臣曾考查过各国变法的情形，参酌中国的情形，哪几项可以施行的，都定出条

陈章则，请皇上参考。”

光绪说：“你写的条陈章则都很详备。”

康说：“那么皇上为什么不颁行呢？”

皇帝看了看帘外，停了一会叹口气说：“我受着种种牵制，不能放手干呀！”

康说：“现在的大患在乎民智不开，民智不开是因为用八股作考试文章，学做八股的人不明白世界各国情形，但他们可以靠八股得功名，做大官。现在朝廷里群臣济济，却没有一个担得起革命重任，就因为八股出身的缘故。”

光绪说：“是的，西洋人都做有用的学问，中国却做无用的学问。”

康说：“皇上既知道八股的害处，那么把八股废了嘛！”

光绪说：“可以的。不过要办新政财政困难，如何筹款呢？”

康说：“中国矿产很多，可以开发，只要开源，不怕没有钱。”

于是讲到用人行政、社会教育等，光绪都一一点头。最后说：“你可以下去了，还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上奏折。”

康有为出去后，光绪面谕军机大臣，康有为可以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专折奏事，不必由总理大臣代递。

自光绪廿四年四月廿三日（1898年6月11日）至同年八月初六（9月21日），光绪皇帝连续发布诏书，实行变法，史称“百日维新”。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被加四品卿衔，辅助变法，被称作“四京卿”，军机处的实权当时几乎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

康有为的新政派最大的失策，是误以为新政可以凭光绪皇帝的一道一道诏书就能达成。至于守旧派则紧紧地抓住西太后，完全不理睬新政的诏书，而各省督抚们更是些老奸巨滑的官吏，他们尽管接到了新政诏书，却并不行动，同时静观慈禧和光绪这场政争，到最后是谁胜谁负。

而慈禧对待这场变故的首要两个反击，一是驱逐了翁同龢，给光绪来了个小小的下马威。一是调荣禄去做直隶总督，实际上是先控制住军队。荣禄上任后不久就突然调聂士成的军队五千驻扎天津，又命董福祥的军队移驻长辛店（距北京彰德门40里），这种调动的意味是深长的，使光绪在深宫里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1898年7月28日，南海会馆。光绪求救的密函放在桌子上，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正在紧张地商讨。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凭心而论，他们只是一干书生，实际上又从来没有在权力的漩涡中经历过考验，而现在竟真的轮到他们来把握整个局势时，他们却有点慌了。

最后，他们拟定了四个对策，供光绪选择：

- 一. 仿照日本，皇帝直接担任海陆军大元帅；
- 二. 改元“维新元年”；
- 三. 迁都上海；
- 四. 联合袁世凯勤王。

皇帝立刻看中了第4条密计。并于8月1日召见了袁世凯。袁被光绪召见是公开的，守旧派不知袁的态度，见袁获旨嘉奖，又加侍郎衔，当然怕袁已投维新派，于是立即请求荣禄应付可能的新变化。荣禄乃调聂士成守天津，以阻断袁

由小站调兵入京之路。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这些日子中，北京和天津，到处都是谣言，一说维新派要谋害慈禧；一说守旧派迫光绪前往天津阅兵时把他废黜；还有个谣言说慈禧要毒杀光绪。光绪被这些谣言所困扰，也为自己的帝位而担忧。

八月初三这一整天，光绪皇帝的亲信们为了拯救皇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一是由谭嗣同深夜会晤袁世凯，一是梁启超去刺探消息，一是康有为去会见英国会使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希望藉外方的力量扭转局势。

谭嗣同午夜访袁，本是政治上一个大冒险，但是政治上的重要关头，任何行动总有三分冒险性，当时情势也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明知是险棋也只好下了。对于袁世凯来讲，他内心深处任何一点心理上的起伏，都会是一场历史变故的代价。他任何决定，都是他个人对自己人格道义以及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袁是个聪明机警，同时政治触角很敏锐的人，他所作的决定，自然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时也是衡量过成功和失败的轻重。要知道当时的袁是一个新旧两派的骑墙人物，他在新派中还是个守旧的。他如果拥戴光绪成功，大功只在康、梁、谭等之下，何况与维新人物共事，无论在学识和政见上都屈居康、梁、谭之下；可是如果他出卖光绪和维新派，则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旧派诸人中，除了李鸿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物。他完全不把守旧派的人放在眼中。在新旧之间的选择，投奔守旧派对他是有利的。

谭嗣同与袁世凯初三晚密谈后，光绪听了很高兴，于是初五再召见袁世凯予以嘉勉。

袁世凯在八月初五第三度蒙光绪召见后，立即搭火车返天津。傍晚抵津，下车后即往见直隶总督荣禄，把谭嗣同的计划和盘托出。当晚密谈到午夜，第二天早上二度密谈，第二天晚上三度密谈，并一起晚餐。这时慈禧垂帘训政的电报已到达。因为在初五晚上袁第一次向荣禄报告后，荣禄亲自入京向慈禧报告一切，初六日早上慈禧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采取行动了。

一样的难题

1900年的夏天对于北中国来说，可能是历史上最热的一年。北京至天津地段的老百姓，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战争的危险。而实际上在五六月间，战争已经从北京城内开始了。

慈禧仇视外国的心理，和中国普通人仇视洋人、仇视天主教、基督教的心理，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简洁的佛文化教育与基督教也是背道而驰的。尤其让慈禧震怒的，是康、梁等人受英国人和日本人的保护逃出中国，这使从政以来一直受到洋人敲诈的慈禧感到莫大的侮辱。这一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表示数千年中国古老的社会对于教会的拒绝，清朝王室和西方国家的嫌怨，汇成一股洪流，终于一发不可收拾。

1900年5月23日的正午，慈禧于仪鸾殿召见臣僚，决定要和各国宣战，命许景澄等通知各国使臣，即24小时内出京，清朝当派兵护送出境。光绪很激动，拉了许景澄的手说：

“再商量一下。”慈禧厉声说：“皇上放手，不要误事。”联元跪在地上大声说：“宣战只该对一个国家，如为了夷教，法兰西是传教国，只能对法宣战，怎可和十余国宣战？”慈禧置之不理，并命人加意捍卫宫墙，以备不虞。

这时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已有戒备，听说清军和义和团即将前来攻击，乃把留在北京的各国侨民全部集中在英国使馆内，各使馆联合武装抗卫，同时以重金派遣专差到天津求援。此后在北京各街市上，中西军士便展开激战，使馆区被围攻，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和俄国使馆均被焚，海关、教堂和各传教士所寓的房屋，亦悉遭焚烧。各国公使、外交人员及侨民既然受困于东交民巷，求救的信函均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负责遣派专差递送至天津。七月十八日，八国联军越过了通州向北京进发，董福祥率领他的武卫后军围攻使馆已一月余，东交民巷使馆区竟以寡敌众，坚守待援。当慈禧在深宫中获知李秉衡兵败战死，哭了起来，对王公大臣们说：“我们母子怎么办？你们说说看！”可是这时没有一个大臣说得出话来，大家相顾愕然。

七月十九日八国联军已兵临城下，董福祥在广渠门和英美军队接触上了，日俄军则攻至北京内城。计日黎明，洋兵自广渠门、朝阳门、东便门攻入。英军占领天坛。董福祥自彰义门出走，纵兵大掠。董福祥作战甚勇，可惜既无政治认识，又无修养，当时慈禧倚他为重镇，岂能不败。

廿一日北京城陷，八国联军陆续进据京城，这时北京城内多成瓦砾之区，尤以东交民巷附近为甚。

天还未明的时候，慈禧穿一件蓝布罗衫，发不及簪，满

目含泪走出了西华门。光绪也是一袭黑纱长衫跟在身后，偌大的北京城在他们背后，若隐若现，已是火海一片。

慈禧启驾前干了一件更伤光绪心的事，就是把光绪所宠爱的珍妃，推下井中。慈禧认为光绪对她不好，都是珍妃从中挑拨所致。珍妃的妹妹瑾妃落后，好容易追上殿后的载勋，才赶上逃难的行列。

宫中的景色凄惨，宫女大监有跳水死的，有裹了细软逃出安定门的。溃兵入宫抢劫的很多，炮声、枪声和人们号叫声乱成一片。北京城在清朝最繁盛时代，有居民400万，风阁龙楼，数不尽的豪华，自洋兵占领，只剩得瓦砾一片，坊市萧条，狐狸昼出，鬼哭神号！

李鸿章在北京沦陷后才到达天津，他这时的官衔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武卫军统帅及议和大臣，这些官衔对于八国联军所占领的天津是发生不了作用的。他之所以受洋人尊重，完全由于他个人的国际声望。他抵达天津几乎是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抵津的时间相同。可是他们两人正式见面则是九月廿四日在北京会面的。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有名的《辛丑条约》，李鸿章本人也由此落下了千古罪人的名声。而在当时，清政府唯一可以依赖出来收拾残局的，也就李鸿章一人了。

九月廿六日，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王公大臣已经在回往北京途中，这天是由河南省巩县抵达汜水县，得到李鸿章自京电奏：“病热危笃，请速派大臣接替，以资镇摄。”慈禧和光绪阅电都非常担心。慈禧这天以极忧郁的颜色对随驾的吴永说：“大局未定，李相如有不测，如此重荷，有何人可以

分担？

第二天，九月廿七日两宫自汜水赴荣阳，傍晚接到北京急电，李鸿章于午刻逝世，慈禧和光绪听见这个噩耗，饭都吃不下去，随驾大臣乃至宫监卫士都有梁倾栋折的感觉。慈禧和光绪立即召见荣禄等大臣，决定了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调山东巡抚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0年以后的中国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这个调令开始和决定的。

这一年袁世凯43岁，与当时的有名望的大臣和督抚比，实在太年轻了；因为他的三位前任，荣禄已快70岁，李鸿章79岁，王文韶68岁，袁世凯的年龄足够做这三位前任总督的儿子。

袁奉命署理直隶总督后，先把左右的人事作了一番部署，副将张勋、守备盖恩远、都司曹锟、吴凤岭等都蒙奏奉嘉奖，又特疏保荐唐绍仪。唐自朝鲜起便一直追随老袁，袁在山东巡抚任内曾创设商务总局，唐绍仪便以道员总揽局务，拟定各项规则，办理颇有成效，可以算是袁的左右手。

这样，李鸿章的去世，使袁世凯成为北洋正宗领袖，一时权倾朝野。

北洋大臣时代的袁世凯，怦然已是当代名臣，这一时期他集中智慧和心计在培养自己的力量，他练新军、办军事学校，加强自己的干部。对于干部除了用金钱收买外，还使用一套旧社会的统御术，让这些干部认他做义父或是老师，至于和那些有名望，有地位的王公大臣们，则用结成儿女亲家或拜把兄弟来加强联系；对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则收他们作义子或门生；对一般北洋军的士兵们，则指使私党在各营

中供奉袁的“长生禄位牌”；同时经常散播：“袁世凯是北洋军的衣食父母，有了袁世凯就不怕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

他懂得曾国藩和李鸿章成功的因素，由于时代不同，他没有靠战争建立武力的机会，但他却因为列强欺侮而获得练建新军的机会，因此他仍可以媲美曾、李。他和曾、李都遭遇到同一个难题，就是汉人无论替清廷出了多少大力，但最终都不会得到清廷的信任，这就是当年曾国藩惴惴不安的原因。所以他在功业一帆风顺的过程中，并不自足，相反地经常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尽可能地把清廷贵胄拉出来作为掩护，以减少清室贵族对他的猜忌心。所以他在山东巡抚任内，就奏调旗籍道员荫昌佐赞军务；署理直隶总督时，则挑选八旗子弟 3000 人参加新军训练，同时奏保旗籍道员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参预新建陆军训练工作；实授直隶总督后，建议成立京畿督练新军处，推举奕匡为督练大臣，而自任副手。

在袁世凯的事业上几乎要达到顶峰的时候，光绪和慈禧先后死去，这也是袁世凯万万没有料到的。他由此几乎跌了一个跟头。当时两宫不和，光绪所期待的，就是借助死亡战胜慈禧，不幸，正当慈禧病危时，光绪却抢在她之先驾崩。光绪先慈后而死，这件公案是清王朝最后岁月中一大秘密，有人说慈禧垂危时叫人先谋害了光绪，又有人说是袁世凯的阴谋。

袁世凯当然恐惧光绪重新执政，他死命地掌握着北洋军，巩固自己的力量，就是以防万一。光绪卅四年（1908 年）皇帝和太后都在病中，清廷计划为光绪立嗣以备万一，袁极力支持立庆亲王的长孙为嗣，可是他的计划却不被慈禧所接受。

慈禧虽然不喜欢光绪，但是她和醇亲王一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的亲妹妹便是嫁给醇亲王奕诤。奕诤的儿子中，一个是光绪，一个是载沣。载沣继承了醇亲王的王位，娶的太太又是慈禧亲信荣禄的女儿。所以慈禧为了这种私情，宁愿把天下交给载沣所生的，才三岁又好哭的溥仪，并命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名义抱了他的儿皇帝统治大清江山。

当病中的光绪听到自己亲兄弟要作摄政王，不禁流露了笑容，于是他秘密地写了一个字条给载沣，上面只有四个字，是“杀袁世凯”。

袁世凯在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以后，也曾做了一番努力，他以国家需立长君为由，建议载沣自己做皇帝，他希望以拥立载沣自己做皇帝，来求取载沣的谅解，可是他这个建议不仅未被载沣接受，反而却召来一顿很严厉的申斥。他于是称病请假到天津小住。

载沣当国后，真的在筹划要替皇兄报仇，诛杀袁世凯。自然，这遭到了当权者中间的大多数人的反对，载沣只得以降旨“回籍养病”把袁世凯赶出北京城。

由过度炫耀到仓皇远离，袁世凯经历了灿烂之后的一段平静。他非常“干净”地离了京，还把一所私宅送给了段祺瑞。在他归隐之后，他的老朋友徐世昌干得依旧很火，已经当上了内阁协理大臣，袁一手提拔的赵秉钧则任民政部侍郎，掌理全国警察和特务；袁的长子克定仍在邮传部任丞参，他们都负责京中联络工作。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陆军大臣荫昌也和袁保持密切关系；而各省督抚大员中，袁仍有不少的亲戚和故旧。因此，袁虽然在洹上隐居，可是却拥有极大的政

治潜势力。

袁在归隐期间，曾做了一首五言绝句，诗曰：“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诗句气魄雄伟，文采虽逊，却大似开同帝王口吻。

这年恰好是袁州凯 50 岁，他的头发胡子早已斑白，他一共有七房太太，已生了 15 个儿子。

孙中山当上了“本党总理”

日本人犬养在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之后，曾经说过这么一席话：

“孙逸仙能为中国革命党领袖的原因，有下列几个特点：

（一）他是一位诚实，不说谎，言行一致的人物。

（二）他笃信自己的学说，提倡共和主义，树立平等的旗帜。这是谁也不能动摇的，也是亿万黄金不能买他的。他的这种人格，可能由宗教信仰上而得来的，以这种伟大的人格，有笼盖无数人心的威力。

（三）清廉节俭，不爱金钱。”

1899 年孟夏时节，孙中山仍滞留在日本，5 月的一天，他会见了维新运动的主力之一、逃亡日本的梁启超。两个人长谈到深夜三点，颇有知音之感。但这一际遇并未改变梁启超的一生，不久两人见面的消息传到了康有为那里。康有为也是一位自己信仰的坚定狂热分子，他立即命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去檀香山办理保皇会工作。两个巨人的合作就这样匆

匆分手。梁启超没有入中山先生的“行套”，却又入了康有为的死囚。作为政府之外的民间势力，兴中会和保皇会有了第一次较量。

此时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三合会会合兴中会成立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会长，实际上就是承认孙中山为地下革命领袖。而此时保皇会也在世界各地设立分会，会员多达一百万人，两党开始激烈争夺阵地。孙中山先生在兴汉会成立之后确立了三个发展点：一路广东广西，一路福建浙江，一路上海，而此时的梁启超已洞察到孙中山的心机，火速致书康有为，劝康有为速围广东，以免广东落人孙中山之手。可见当时广东位置之重要。由于康、梁二人的影响，保皇会渐渐站稳脚跟，并且超过了兴中会在海外的势力。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温逸街设立中华革命军会所。同时发行“军需债券”，票额为银洋十元，并标明本军成立之日，即还本息美金拾元。票面有中山先生英文签名。但只募得两千余元。于是，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先生决定赴美筹款和宣传革命。

在离开檀埠之前，孙中山先生曾准备作最后一次讲演，恰逢清廷贝子溥伦赴美参加圣路易举行之博览会，路经此地，檀埠侨商中，有人设宴欢迎。中山先生便停止了讲演，并参加宴会。有人问，“孙博士为排满大革命家，何以参加欢迎皇叔（侄）宴会广中山先生答：“我并非有欢迎之心，所以参会，只想认识其人而已。”

中山先生行前，第一次公开宣布行程，并明言今年夏间，希望返回起义。记者则祝曰：“我希望有一天，你被公举为中

华民国大总统。”中山先生笑而谢之。

但是结果并非像孙中山先生想象得那么好。由于康梁等人已在美国占了先机，孙中山到美国后，受到了空前的冷遇。于是他转道周游欧洲。

孙中山离开日本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却异常活跃起来。1904年10月，黄兴、宋教仁、唐继尧等留日学生组织成立“革命同志会”，一度计划成立政党。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个叫程家桢的，是孙中山的最狂热的信仰者，他一定坚持要等孙中山回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认定了孙中山这个人，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孙中山也是因为有了这一次的坚持而获得了一次宝贵的机会重新当上了革命党的领袖。

1905年7月28日，孙中山匆匆赶到日本。这一天，他会见了两个对他后半生至关重要的人。7月28日上午，在中国餐馆风乐园，孙中山会见了黄兴，这是后来的中国国民党的两大巨擎。两个人谈了近两个小时。在中山先生到达日本之前，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日本留学生界通过信件已知中山先生已在比、德、法三国首都建立革命同盟组织，均希望中山先生为统一领导者，实际上这时的孙中山，刚刚由欧美周游碰壁而归，兴中会会员此时有名可考的，总计也不足三百人。而黄兴此时是“华兴会”会长，会员甚众，在国内及日本留学生中影响很大，尤其会中聚集了像宋教仁、陈天华这样的实干家和理论家，从实力上来讲是超过孙中山先生的。但从名望、资历和人格上来讲，孙中山先生又确超出黄兴，自这一次会面之后，黄兴便开始追随中山先生。

7月28日下午，在《二十一世纪支那社》，孙中山先生

会见了兴中会的另两个重要人物：宋教仁、陈天华。还有一个此次会见的最热情的鼓吹者：程家桢。孙中山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实力：这种实力不是来自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真知灼见的洋溢。为此他发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演说，完全感动了三个人。他们的目标达成了一致。

7月30日，由华兴会组织召开革命团体和各省留学生大会，组织中国同盟会。地点：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内田良乎住宅）。时间，宋教仁日记记为“未初”，当为午后2时许。首先由中山先生讲革命原因、形势与革命之方法，约一时后讲毕，即由黄兴宣布开会目的在组建统一政党，请到会者签名。中山先生又讲了一遍同盟会的宗旨，即席起草了盟书。黄兴提议：“请入会诸君自愿签名。”

会场变得寂静。刚从湖南来的曹亚伯率先站起来，边走边说：“大家主张革命，才来到这里，如果不主张革命，何必来呢！”说罢，写上“曹亚伯”3个大字。

程家桢跟着前来：“我亦凭我良心签名。”大家拥到桌边按次签名。

签署了盟书，孙中山领着大家同举右手向天宣誓。华兴会会员几乎全部加入了同盟会。实际上同盟会的成立，也宣告了华兴会的解散。

黄兴在全体签名之后，提议由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结果大会与会者一致举手同意。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于东京，刊发孙中山先生刊发词，以三民主义作为同盟会的主义，第一次发表三民主义。

1906年，孙中山主持修订《中国同盟会总章》。

同年冬写成《同盟会革命方略》，分为：《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三部分，并提出了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5年至1906年间，同盟会会员迅速扩展到一万人以上，尤其是在南方，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革命思潮在南方涌起

如果人们有机会在中国作一次穿越南北，横贯东西的旅行，他们将会发现，在这四个方位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以地理环境而言，东南方平畴千里，温暖潮湿，雨量充足，土质肥沃，人口稠密。

而中国的西北方空气干燥，冬天气温寒冷，春天则风沙弥漫。

东南方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纵横交错的内河。这对发展贸易，十分有利。当欧美现代文明东渐之际，这里无疑会得风气之先。而西北方地处亚陆腹地，受层峦叠嶂之阻，交通不便，资讯贫乏，外部世界的影响，到达这里已经微乎其微。

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南北民俗和民风也各异。千百年的沉积，造成相互间的歧视和排斥，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北方虽然以王道正统自居，但面对五岭之隔，亦难免有鞭长莫及的感觉。因此，南方一直是朝廷

流放罪犯和失宠官员的地方，这些人把自身的反叛性带到了南方，很自然地，他们所信奉的“异端邪说”也就在南方传播和滋长开了。

这种对北方和朝廷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终会酿成动乱，打破中国现存的文化架构和政治架构。

自从南方出了一个洪秀全以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接踵而起，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南北对抗，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中国人头一次听说天地间有一样东西叫“民主”。

在近代中国，南方是秘密帮会的乐园。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帮会势力的大检阅。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会”，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组织，不如说是一个帮会组织更为适当。当太平天国杀向北方时，活跃于东南方的所有秘密帮会——天地会、征义堂、青莲教、哥老会、金钱会、小刀会等，几乎都起来响应了。

太平天国唤醒了秘密帮会的政治意识，使人们觉得加入这类组织不再是可耻和骇人的事情，而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献身。现在谁也不会说帮会是“盗贼”了，他们被称为“会党”。

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革命党的出现，从一开始就赢得留学生的热烈支持，然后得到国内开明士绅和新军人的附和，在海外也广受爱国侨民的同情。同时也得到了三山五岳的秘密会党的帮助。

革命党在短期内发育成长，有赖于它所高揭的民族主义大旗。“驱逐鞑虏”的主张，和康熙年间洪门聚义时“满覆明

兴”的主张，一脉相承。大汉族的理想，曾激发起无数仁人志士彻底牺牲自我以救世的勇气。

在南方，反抗专制的革命党，把众多不同出身、不同阶层的人，上至名门望族、达人雅士，下至贩夫走卒、屠儿刽子，团结在一个团体之中。

光绪三十一年（1905）。

日俄战争刚刚结束，在“火红的夕阳”照耀下，满洲原野依然硝烟弥漫，日本人还没有从纵情狂欢之中平静下来。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把自己的锦绣山河提供给外国人打仗，天朝尊严，扫地无遗。在亡国空气的笼罩下，反叛情绪，油然而生。离经叛道的言论，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尤为畅销。谈论革命，已经成了公开事情。

9月1日晚上。在日本东京神田三崎町，一间光线昏暗的小房子里，聚集着几位从中国南方来的留学生。他们是胡汉民夫妇和廖仲恺夫妇。夜沉如水，大家都在互相望着，沉默着，等待着。

当门外传来脚步声，房里的人几乎同时跳了起来，目光一齐射向门口。通向走廊的移门打开了，从外面走进两个男人。前面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后面那个人站在阴影里，打量着四周的环境。当他走到灯前时，胡汉民一眼认出了，他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上前和他们用力握手。在异国的沉沉黑夜，在简陋的日本式房子里，这次会面对他们、对同盟会、对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历史，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孙中山盘腿坐在榻榻米上，用温和的目光注视着大家。

他开始纵谈三民主义，详细解答胡汉民提出的疑问。他所宣讲的一切大奇特了，太新鲜了，和胡汉民在法政学校所学习的经济学截然不同。

“究竟怎样才能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地位平等呢？”胡汉民问。“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孙中山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回答，“如果革命成功，还重蹈欧美日本的故辙，最大多数人仍然受痛苦，那决不是我们的目的。”

“好，”胡汉民兴奋地一拍大腿，“现在我什么疑问都没有了，从今以后，我就跟着先生干吧！”

欧美经验，在中国革命发端之始，就遭到强烈的否决。孙中山的谈吐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胡汉民知道自己的一生，都离不开这位40岁的香山人了——他们都是广东同乡，包括廖仲恺夫妇。

由于政治的腐败，要使一个青年走上反叛之路，并不困难。就在那天晚上，胡汉民和廖仲恺同时加入了同盟会，在盟书上郑重地画了押。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当时并不成熟。他对日本友人解释共和理想，“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可以追溯到三代之治，和近代世界的民主制度，扯不上什么关系。他承认他的理想是怀古的，不过他说：“其所以怀古，岂不正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证据吗？”在孙中山的心底里，也许更多地把自己视作天下寄其身的圣人，各派革命成立同盟会的目的，是希望把它变成全国各派革命组织的大同盟，以“驱逐鞑虏”的旗帜，号令天下。

在讨论成立同盟会的会议上，有人对孙中山的理想表示

怀疑，提出质问：“将来革命成功，你究竟是帝王还是民主？”孙中山没有回答，他带着慈祥的微笑望着提问的人。他常常以这种宽容的微笑使怀疑他的人感到愧疚。大家都觉得十分尴尬。程家桢急忙站起来打圆场：“现在只问满清要不要打倒，不问是帝王还是民主。”大家都笑了起来，气氛变得轻松了。是的，谁可以怀疑孙中山的人格力量呢？他不必替自己辩解，他的举止、神情，甚至一闪而过的目光，都使他显得那么伟大和具有说服力。

在东京加盟的留学生就有好几百人。除甘肃没有留日学生外，17省的人都有。

如果以籍贯划分，广东的人数最多（170人），湖南居其二（15人）；陕西最少（4人）。可见王朝叛徒，多出于南方。

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孙中山（广东籍）担任总理，黄兴（湖南籍）担任庶务部总干事，马君武（广西籍）、陈天华（湖南籍）负责书记部，程家桢（安徽籍）、廖仲恺（广东籍）负责外务部，宋教仁（湖南籍）为司法部检事，汪精卫（广东籍）为评议部长。会中要职，几乎由南方人垄断。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帮会中都担任着要职。

辛亥革命

孙中山的两个秘密武器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策动下层造反这一艰巨工作上面。尽管他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能说流利的英语，并在香港公理会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对西方政治和社会具有比其他中国人更深的认识，但他在从事革命工作时，却更热心于利用江湖游民中的秘密帮会。据他估计，全国的秘密帮会中，大概有3500万会员会追随他的革命事业。

事实上，孙中山本人也加入了势力最大的帮会组织——洪门，并成为其中一名地位颇高的首领。

这一类的帮会，都有自己的暗号、手语、法律。其成员品流复杂，地痞、流氓、散兵游勇、江湖艺人、农民、内河船工、小商人、手艺人、乞丐，几乎无所不包。尽管草创之始，他们有的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如洪门），有的是以安清报国为目的（如清帮），但到了后来，这两者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

江南的秘密帮会，以洪门、青（清）帮为主。

说起青帮，百多年来名震天下，无人不知，其势力足可以和江湖第一大派洪门平分秋色。但青帮原称“安清帮”，顾名思义，是一个效命朝廷的民间组织，和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可谓南辕北辙。

洪门也即天地会，三合会和哥老会属其分支。三合会在海外称为洪顺堂，或义兴会，在日本也有称为三点会的；在美洲则称为致公堂。江浙一带，洪门又有终南会、双龙会等小团体。青帮势力不及洪门，但亦有两大分支。一为主帮，系浙东温台人；一为客帮，系皖北江北人，又称巢湖帮，凡皖南、浙西的流氓光棍，多属这一流派。

青帮以佛祖为系统相传，按照宗派，招收门徒弟子，故为纵的组织，长幼尊卑，等级森严，所谓“师徒如父子”；洪门则标榜侠义精神，所谓梁山的根本、桃园的义气、瓦岗的威风，故为横的组织，“兄不大弟不小”。

青、洪两帮从本质上来看，并无多少进步性和革命性。会中法规严厉而恐怖，是儒家名教和江湖道义的混合物，纲常伦理，一应俱全，违反者砍头割耳，决不宽贷。

孙中山他们在河内设立秘密机关。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汉民化名陈同，以饮食业为掩护，招纳亡命志士。

这是胡汉民第一次来南洋，也是他第一次从事实际的武装革命。参与革命的大多数志士，是帮会中的义气之士。

孙中山用来收买会党的钱，主要来源是靠西贡的银行买办曾锡周和巴黎富商张静江的鼎力支持。

张静江是浙江吴兴南浔镇人，他的家族为南浔四大巨富之一，他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在

巴黎、纽约均有通运公司的分公司，此外还兼营汇兑和其他进出口贸易。他本人长住在巴黎。这样，在拥有了一笔资金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开始了一次次军事冒险。失败也接二连三地来临。

1906年秋，总部黄兴派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人，自日本归国，于12月4日便发生了萍浏醴起义。

萍浏醴的起义，在萍乡起义者多为煤矿工人，在醴陵起义者多为防营兵勇，在浏阳起义者多为洪江会党，每股约万人，浏阳一股为主力，革命起义之初，不数日就纠合了3万多人，蔓延若干县，声势不可谓不大，可是由于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人，起义之后只能株守萍、浏、醴三县不能进攻，而清廷则飞檄调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新兵、两江总督端方的精兵，由江西按察使秦炳直率领赣军节制各方兵马全力进剿，革命之火遂被清军扑灭。这次起义事件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而革命党人牺牲之惨重，也是从前所未有的。

萍、浏、醴起义，并非奉同盟会总部与中山先生之命令，而是返国之同盟会员自行决议发动的，故无周密计划。但当起义发动后，中山先生分遣胡瑛、宁调元、孙毓筠诸人入各省运动军界，以图响应。

在日本的东京革命党人，闻听国内起义军兴，莫不慷慨激昂，请缨效死，与满洲人拼命。每日到革命机关部请命投军的，大不乏人。

1月10日，孙中山先生在不知萍醴起义已近尾声的情况下，正式向国内各地会党发出武装起义的号召。至此，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以头试刀，大开杀戒，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

武装暴动，1907年1月，清廷也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大搜捕，双方已到水火不容之地步。这样，黄兴便秘密返日，与宋教仁会于风乐园，筹划新的计划。

适时孙中山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意欲离开日本，离日之前，召开会议讨论中华民国国旗问题，孙中山主张沿用陆皓东发明的青天白日旗，黄兴不以为然，双方争执不下，黄兴竟以此欲退出同盟会，宋教仁也表示要辞去总部职务。国旗做为悬案一直遗留下来。此时的同盟会，已有了一些裂痕。

3月4日，中山先生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日本和同盟会总部，转赴香港，随行者有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搭乘轮船为德国“亚理斯王子号”。临行，中山先生留下两千元作《民报》维持费用。胡汉民也辞同盟会书记职，将保管盟书事交何天炯接管。从此以后，同盟会革命运动重心，由日本东京转到了南洋。中山先生于南洋策划滇、粤、桂地区起义。

5月22日，孙中山亲自领导潮州起义，革命党被杀二百余人；继而相继发动了6月2日惠州起义，7月6日安庆起义，9月卫日防城起义等，均告失败。10月16日，革命军攻占镇南关。

1910年2月21日汪精卫准备在北京地安门外刺杀摄政王载沣，因事机败露而在北京坐监，名声大震。1911年3月，杀手温生才刺杀成功广州驻防将军孚琦，这些暗杀活动令清廷官员闻风丧胆。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党的头领的名字更是在私下里被清廷的官员们传来传去，以至有时候突然来了一个谣言：孙中山回国了，清政府竟不惜动用军队密探，以确保不让孙中山踏上一寸中国的土地。清政府心目中惟一

最可怕的力量，就是孙中山。至此更是到了一夕数惊。

1911年春天，同盟会布置了一次最大最完备的起义，目标是拿下广东。为此孙中山在海外奔走呼号，筹措到了约15万元作为经费。三月二十九日，一个伟大而动人的革命日子，下午五时三十分，黄兴率党人出发，由小东营进攻两广总督署。参加起义的人都臂缠白布，足着黑色胶鞋，路遇警察，全部杀死，疾行至督署大门，劝卫队投降反清，卫队不服，立即枪弹并发，号角大鸣，杀死了管带金振邦，破门而入，直冲入二门，二门有卫队八九人，见势走避，而两庑和大堂之卫队，凭栏射击，杜凤书、黄鹤鸣当场阵亡。黄兴凭大立柱还击，其余清兵因被截击，弃枪投降，黄兴又率军直入内府，不见两广总督张鸣岐。其时，张鸣岐早已逃到水师行台李准处了。黄兴等攻占督署后即举火，然后退出东辕门，在路上恰逢水师提督李准率领大队亲兵，林时爽上前喊话，欲招降其亲兵，不意时方突然攻击，林中枪身亡。黄兴右手中枪，断了两根指头，于是黄兴把他的部下分为三路，黄率10人出大南门，欲与巡防营接应，徐维扬以花县党人40人出小北门欲与新军接应，其他川闽及南洋同志则往攻督练公所。黄兴等在双门店遇上巡防营，这支巡防营部队正是前来响应起义的，因拟偷入城内直入水师行台擒拿李准，所以不挂革命军的白巾，怎知迎面遇见黄兴。黄等事前不知对方计划，见巡防营部队来着相应的臂号，乃下令攻击，巡防营死七八人，一哄而散。党人自相攻击，转胜为败。黄兴鏖战中回顾不见一人，潜入了一个小店，换衣而出。其他各路亦未能按计划完成。喻云纪等攻督练公所，失手遇害。李文甫为清兵

所捕，从容谈笑而死。朱执信平日文弱书生，攻督署时奋勇争先，后来潜入门生家易服出险。举义失败，革命志士纷纷潜入老百姓家中，李准大肆搜索，兼及港澳轮船和广九铁路。

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弃尸街头，没有人敢去收殓，前后五天，清吏才通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四个善堂清扫遗骸，将其移置咨议局前旷地，分成十余堆，折臂断脑，血肉模糊。后来移至红花冈埋葬，烈士们自死至葬，陈尸多日，继以夜雨，尸体霉涨，小虫蠕蠕自发孔蠕动。葬毕烈士，红花冈改为黄花冈。所埋尸体共 72 具，后人称作黄花冈七十二烈士。

黄兴负伤后，换装由一少年送其出城和渡河，下船步行至胡汉民家，胡汉民的妻子徐宗汉，刚回胡宅，为他另行包扎和派人购买止血药为之治伤。出去购药的人叫庄六，在途中遇上自港来广州的赵声，急引赵回胡宅，黄、赵二人相见后，大哭不止，黄兴晕死过去，及其醒来，包裹伤指后，黄急欲渡河再战，经徐宗汉力劝才稳定下来。

赵声对这次失败愤不欲生，每天狂饮烂醉，痛哭不止，5月6日突然口吐紫血，口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延至5月22日午后，病情急剧恶化，黄兴、胡汉民等人都到病房看望。赵声躺在床上，脸色蜡黄，气若游丝。

“伯先（赵声字），你好点了吗？”黄兴把头俯下，在赵声的耳边问。

赵声睁开眼瞧了瞧，勉强地回答：“问什么好不好，还怕我死了吗？我赵声罪当万死，对不起孙先生，对不起你，对

不起一般惨死的同志。”两行泪水猛地夺眶而出。

下午1时，赵声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来临了，他拉着黄兴和胡汉民的手，哽咽着说：“同志们差不多快死完了，你们未死的人，要努力呀！”

此役之后，黄兴和胡汉民均产生了以暗杀手段为烈士报仇的情绪。黄对胡说：“此时党人惟有进行个人暗杀之事，否则无以对诸烈士！”

自此，黄乃密令党人积极进行暗杀活动，并准备三千元为费用。胡汉民则积极襄助。胡汉民自谓参加革命时，对史坚如、吴孟侠极为崇拜，但中山先生不赞成暗杀手段，以为暗杀几个人，无以动摇其根本，胡也就同意中山先生主张，故不赞成汪精卫的暗杀行动。至此次广州之役失败后，便转而积极支持黄兴的暗杀计划，在黄的部署下，开始全国性的暗杀行动。

黎元洪糊里糊涂就当上了都督

天下事往往种了因就会有结果。孙中山虽然屡战屡败，但是“好杀”“好战”的革命党人的名字，已是像神话一样传遍中国大地。紧接着，同盟会在广州起义后又是在上海成立了中部总会。由上海沿长江而上，有两个众人皆知的大省：湖北和四川。

1911年九、十月间的武汉，盛夏的酷热还未有完全褪尽，但全城已笼罩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与不安之中：谁都知道

要出事，但又谁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出事。

秘密起义的日子定在10月6日中秋节，9月12日由湖北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雄楚楼10号召开了联席会议，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这个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创办人有刘公、孙武、居正等。以两湖为革命活动中心，会费由刘公担任、辛亥起义时本应推刘公为鄂军都督，因找不到他，才临时抬出黎元洪。孙武因名字和孙文相近，大家讹传他是孙文之弟：“孙文的兄弟都来了，我们快点参加革命。”新军就是这样踊跃参加的。

文学社是振武学社的后身，吸收的干部多为湖北新军。武昌起义，文学社的贡献很大，功不可没。

9月初，与湖北相邻的四川发生了保路风潮，湖北新军被分割出去入川作战，此时正是起义的大好时机。但由于黄兴、宋教仁、居正没有如期从上海赶来，起义改在八月十八午夜12时。不料这天下午，孙武在汉口租界宝善里试验炸药，爆炸负伤，起义消息得以暴露，武汉宣布特别戒严，党人纷纷走散。

由于武汉新军内秘密参加革命组织的干部很多，自湖广总督瑞对革命党人大加整肃后，军心惶惶，极为不稳，流言传闻，草木皆兵。过了一天，到八月十九日，整个武汉的新军已接近爆炸的程度，这时候武昌城内共有步队三营，工程队一营，旗兵三营，督署教练队一营，巡防营数营，兵力不可谓薄弱，无如人心思汉，清运将终。当瑞接替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时，一抵任所就问第八镇统制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也很老实地回答说：“不敢瞞大

帅，大约有三分之一。”

八月十九日晚七时，工程第八营副班长金兆龙和兵士程定国正在擦枪装弹，工程营后队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忽然跑到金、程二人面前大声叱责说：“你们想造反吗？”金反唇说：“老子造反你要怎样？”陶大怒说：“你敢犯上，这还了得，来人把他们抓了。”于是二人互相扭作一团，程定国乃自陶背后用枪托向陶头上狠狠敲击一下，立时头破血流，程再向陶射了一枪，这一枪就是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的第一声枪声。陶负伤下楼逃走，由于这一枪使得全队动摇的军心火上加油，大家争说“起义了！”班长熊秉坤立即集合营中革命志士开始行动，将营内子弹搬取而空，一哄出营，直奔楚望台军械所。这一支首义部队不过三百人，到楚望台时已有志士在内响应，所以未发一弹就加以占领。这时群龙无主，没有领导的人，于是大家推举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起义的革命总指挥。吴在楚望台西南凹地集合全体志士，确定军事行动。

辛亥武昌起义就是这样开始的！

革命军在八月二十日天明时，已占领武昌全城，以白布为旗，遍插城上，全城各营军士机关学校均闻风响应。

大局既定，需要有一人出来维持局面，于是革命志士马荣、杨启发奉命去寻找 21 混成协统黎元洪。黎元洪当时在清军中地位很高，当大队士兵闯进来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在向他发难呢。但革命党人只是想借他之力力促革命全面开花。黎元洪身不由己被革命党人推到了前面，但他唯唯诺诺，瞻前顾后。在关键的时刻，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宣布拥护革命，黎见这个非革命党人也同情革命，意思才活动起来。当

即决议组织军政府，推黎元洪为鄂军都督。黎则力辞，这时有人拟就都督安民布告，请黎签署，黎犹豫未决，其亲信王安澜亦拽衣劝黎。这时守卫的测绘生李诒东、陈磊等愤欲举枪，黎这才低叹了一口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黎是著名的稳健派，且相当有声誉，他出面领导革命，对内稳定了湖北人心，对外刺激了一般非革命党人，认为像黎元洪这样的人都参加了革命，可见反清革命确是时代需要。

黎元洪虽然就任鄂军都督，但他既不是革命党，对革命事业也没有信心，所以他脸上既无表情，又来个一问三不知，大家只好叫他“黎菩萨”。他在都督府组成后即要求回家一行，后来竟由家中转去他的混成协司令部，可是革命军方面对他护卫甚严，除派各军士保卫他的家眷外，还有12名随黎左右。

武汉起义横空出世，立即在各省遍地开花。谭人凤在湖南、张风别在陕西、李烈钧在江西、阎锡山在山西、蔡锷在云南、陈其美在上海、程德全在江苏、汤寿潜在浙江、杨苾诚在贵州、朱家宝在安徽、胡汉民在广东、陆遂在广西、孙宝琦在山东、尹昌衡在四川等相继宣布独立。

武昌起义的消息于辛亥年八月廿日下午一时传到了北京，清廷举朝顿时骇得手足无措，廿一日有旨派陆军大臣荫昌统率近畿陆军两镇南下征讨，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即日赴援。

就在这天，袁世凯“奉旨养病”的洹上村，来了一位秘密客人，这个客人是被派南下作战的冯国璋，他专门赶来向袁请示方策。袁给冯六个字的锦囊妙计，是：“慢慢走，等等

看。”袁的这六个字，立即影响了荫昌率领的北洋陆军，他们果然以极迟缓的行动准备出发作战，荫昌一看苗头不对，也就留在北京没有动身。

八月廿三日，清廷起用已罢黜两年余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再起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保荐的，摄政王载沣虽然不欢喜老袁，可是要打仗必须倚靠北洋军，北洋军则全是袁一手训练，所以不得不用袁。袁不仅是湖广总督，同时兼办剿抚事宜，照这道命令，等于是荫昌的副手，袁当然很没趣，于是以“足疾未痊”的理由，推辞了这个湖广总督的任命。袁本来并没有足疾，可是当年摄政王载沣放逐他的时候，硬说他有足疾，勒令请假养病，如今袁正好用足疾来回敬。意思是：“我明明无病，你叫我养病，如今事急来求我，我也只好给你一个因病不能复起的回敬。”

奕劻见到袁的来电，乃派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于八月廿九日微服前往河南彰德洹上村访袁，这两个老狐狸如此这般一番，徐就折返北京，装出一副又丧气又生气的样子对奕劻和满朝亲贵说：“真是不知好歹，他竟提出条件，他说：要我干未尝不可，可是必须得听我意见我看还是叫荫督帅快赴前线去吧，没有袁世凯不见得就不能打仗。”奕劻问徐是些什么条件，徐支支吾吾说出了袁的条件：

- (一) 明年召开国会；
- (二) 组织责任内阁；
- (三) 开放党禁；
- (四) 宽容革命党；
- (五) 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

袁世凯和徐世昌串演的一幕双簧，袁的条件是真的，徐的气愤是假的，袁的用意是利用革命党对付清朝，再留着清朝对付革命党，自己有北洋军，坐收渔人之利。袁世凯在这期间，确实花样百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方面宣称自己赞成君主立宪；一方面又和汪精卫等人往来，暗中表示赞成革命。一方面又命令冯国璋督兵猛攻武汉的革命军，一方面又派人至武昌和谈。忽进忽退，扑朔迷离，使人无法捉摸。就连他自己的出处，也是欲进欲退，弄得最后也不知该如何应付。

袁世凯算定了清政府不会一口气接受了他所提出条件，于是他便暗中命令北洋军将领按兵不动，不听荫昌的指挥。

荫昌南下后，北洋军全部停留在信阳和孝感之间，兵车阻塞不通。自八月下旬到九月初，荫昌的号令完全不行，只落得在孝感满头大汗，跳着脚骂人。而一省一省的独立，就像传染病蔓延得那么可怕，革命的声势一天大过一天，北方各省也酝酿着要学习南方诸省。

辛亥年九月初四，革命军在汉口发动攻势，惊慌失措的清廷，不得不向袁更让一大步，九月六日解除了荫昌的督帅职务，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的第一军和段祺瑞的第二军（这时第二军分布在武胜关一带，为后援部队），以及水陆各军。

袁世凯再起了，就在他的任命发表的这一天，北洋各军奉到袁的秘密指示，要拿点颜色给革命军看看，于是汉口的革命军便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的进攻。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张景良通敌。

九月二十一日，有两个秘密人物由汉口到了武昌，这两个人乃是袁世凯所派来的蔡廷干和刘承恩。他们携带了一封英国驻汉口领事的介绍信，过江来谈和。大厅上的气氛非常紧张，黎元洪看完信折了递给蔡、刘二人，说：“太奇怪了，袁慰亭到今天还要替一人一姓说话，君主立宪根本谈也不必谈。”

这时黎都督背后的屏风后面闪出了三个人，抽出指挥刀狠狠地凶凶地说：“谁人敢主和？主和就是汉奸，请先吃我们一刀。”蔡廷干、刘承恩一看这个场面，吓得脸都变了色，黎元洪这时又慢慢吞吞地说：“不必怕，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我会派人送你们过江的。”蔡、刘就这样抱头鼠窜过江了。

黎眼见袁世凯的两个使者去了以后，便对都督府内的革命党人说：“昨天美国领事跑来看我，他说孙逸仙博士就要由美国动身回来，我想他回来就有办法了。”黎这句话对当时的革命局面是一剂强心针，因为当时“孙文”两个字代表一种魔力，对革命事业来说是有极大鼓励作用的。

当选总统，和谈不成

九月初七日，黄兴由上海赶到汉口，被留在汉口指挥革命军。这时汉口已危在旦夕，武昌也人心浮动。黎元洪派人把黄接过江来，选了一匹大马，叫一个高大的人举着一面旗子，上书“黄兴到”三大字，骑马在武昌城外绕了一个大圈子。黄过江和黎匆匆谈了一下，就折返汉口指挥战争，布置

最后防线于演春茶园。九月八日、九日、十日、十一日黄一面抹汗，一面电调各军上火线，可是士气不振，若干人不听指挥。黄亲手杀了几个，局面才稍定，但汉口卒于十二日陷落。黄兴渡汉水到汉阳，豪气犹在，余勇可贾，黎元洪再催请他渡江议事，黄乃于十二日下午抵武昌。

这时武昌因汉口失陷而岌岌可危，都督府内有人建议请黄兴出任作战总司令，黎欣然同意，乃于九月十三日在阅马厂高筑将台，举行隆重的“拜帅大典”。九月二十三日，黄兴亲自督战攻击汉口，惨败而归。

革命军于是全力固守汉阳，清军因洞悉革命军方面作战实力不强，军令亦不统一，于是大举进攻汉阳。自辛亥年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初六，剧战八昼夜，革命军死军官 137 人，伤 85 人；士兵死 2693 人，伤 400 余人。至十月初七日上午十时，汉阳遂告沦陷。

汉阳失陷后，黄兴退到武昌，军政府即召开军事会议，黎元洪主席，请黄报告汉阳战役经过。黄即席演说，对汉阳失败的原因未能详述，但对于未来军事演变，则认为汉口和汉阳已失，武昌难以固守，主张率领鄂湘两军前往攻取南京。黄的主张被军政府多数人反对，参谋范腾霄愤然说：“汉阳既已不守，武昌又拟放弃，试问还有什么能力可以攻取南京，如果湘鄂两军尚可用，则武昌当然可守。”他的话一讲完被大家热烈鼓掌，死守武昌的提议便成为这次会议的决定。其时黎元洪因都督府被炮轰，所以迁往城外办公。黄兴在会议结束后，乘轮去上海。武昌方面决定重行布置兵力死守。

汉阳之败，对革命军是一个大打击。可是黄兴毕竟不同

凡响，几天后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使革命活动又见蓬勃。独立各省在上海的代表，认为武昌已在危险中，革命事业必须扩大，乃于十四日集议，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即以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政府。这一时期的武昌已经转危为安，倒不是因为武昌有力量固守，而是袁世凯并不想彻底打垮革命势力，幕后原因是独立各省的代表曾于十月十三日开会，通过雷奋、马君武、王正廷所起草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且有一个秘密决议，就是倘若袁世凯反正，则公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亦听到这个消息，所以在北洋军可以一鼓作气渡江攻下武昌时，突然煞车，并派代表至武昌谈和。

武昌和上海两大革命中心在一开始便发生意见，黄兴对于上海方面一再恳辞，于是10月27日重新改选，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军事实上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政府，九月十九日黎元洪曾向独立各省提出建议，请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可是这个电报耽误了八天才到上海，而九月廿一日苏、浙、沪三地都督已邀请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组织统一机构的问题，同时建议在中央机构未组成以前，先行推定伍廷芳和温宗尧为革命军的临时外交代表。当黎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方面为了尊重黎的意见，决定以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鄂军都督代行中央职权。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于十月初四日开会，决定每省派代表一人到武昌参加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留代表一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工作。

各省代表到武昌后，于十月初十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公推谭人凤为议长。这一次会议有一个幕后的，但却是具有历史性的决定，就是在十月十日通过一项决议：“虚临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

原来十月初九袁世凯派了朱其皇到武昌，朱带了一封汪精卫的亲笔函，这是汪写给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函，希望南北达成和议，联合一致要求清帝退位，并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汪这封信恰巧在各省代表大会期中到达，于是大家便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今后“和平与战争”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廷之间，而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倘如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方法是把袁拉到革命阵营来。袁的问题是要给他重大的酬报，他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要拉袁反清，则唯有许以比他在清廷更高的职位，因此如果袁真愿以举手之劳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则革命军唯有享以民国临时大总统，才能引诱和打动得了袁。

袁世凯、汪精卫的勾结，是民国成立前后，政海中一大公案。廿个月以前江谋刺摄政王事泄入狱，震动了海内外，辛亥年袁再起组阁时，汪已获释。袁人京后即曾多次单独和汪谈话，两人所谈何事则非外所可获知，不过汪精卫是同盟会巨头，又坐过监，其革命功绩已世人皆知，所以袁江交往不损于汪的盛名。

袁世凯这时候已实实在在地把北方军政大权总揽于一身了。清开国时，多尔衮致书史可法说：“我大清之天下，乃得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袁世凯现在也是用的这个手法，他

对革命军方面说：“我的天下是得之于清朝，而非取之于革命军。”又对清说：“我今日势力乃取之于革命党，而非取之于清朝。”

袁世凯在洹上村以养足疾为名，已经达到了挟清廷以压革命军，养革命势力坐大以要挟清廷的目的。辛亥年九月十一日他到孝感誓师时，对于当前的局势有了四个决定：

- (一) 谦辞组阁大命。
- (二) 谏阻清廷迁都。
- (三) 稳定南方爆炸情势。
- (四) 清除北方肘腋之患。

根据这四个步骤，他一方面派代表继续向武昌革命政府进行和谈；一方面却令北洋军继续向武昌革命军施压力。

袁的打算都顺利实现，而清廷也接受了他的条件，辛亥年九月十九日资政院通过了清摄政王提名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九月二十三日袁浩浩荡荡地率领大批卫队，威武而显赫地到了北京。九月二十六日组成了责任内阁。

袁内阁成立后，宣统的父亲载沣就解除摄政王地位，而恢复了醇亲王的封号退归藩邸。

袁世凯在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南北双方正式议和。清北京英国公使朱尔典电令汉口英国领事葛福出面，先商双方停战。10月18日袁世凯派出了唐绍仪为全权代表，而革命军方面亦派伍廷芳为全权代表。

十月廿七日午后二时，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首先由伍廷芳提议，自二十九日起停战，所有鄂、晋、陕、鲁、皖、苏、奉等省一律实行，待清内阁回电同意，然

后和谈才能正式进行；唐绍仪继伍起而发言，他表示：立即把伍的建议电达袁内阁，同时请伍亦立即电告武昌黎都督转告各省查照。同时谈到一段故事，就是汪精卫在北京时曾电黄兴谈到促袁参加革命，黄复汪电告以倘袁果能参加革命，即可举袁为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黄这封复电，汪曾交给杨度，杨度乃转交袁。袁表示：“大总统我不能做，应由黄兴做。”因此可以证明袁内心倾向共和，不过身为清臣不能出口耳。于是唐作结论，认为当前和议所讨论的，不是反对共和宗旨，而是先求如何达到和平。这第一次的会谈就此结束。

和谈开始后，南方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就是北方代表（清廷方面）必须首先承认民主共和制的国体问题，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谈，则无和谈的必要。唐绍仪把南方的“和谈先决条件”打电报到北京，向袁内阁请示，并提出唐自己的看法。唐的看法是革命军方面对这个先决条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如果拒绝便无法谈下去，不如绕圈子谈，就是把这个“国体”问题交给一个“临时国会”去做表决，如此和谈还可以谈得下去。袁世凯接到唐的电报，乃向隆裕太后请示，最后终于接受了唐的意见。有人说唐的意见根本就是袁的授意，因为袁的手法就是要假手于革命军来结束清朝的统治，同时为自己“取而代之”留下余地。

南方代表伍廷芳不满意唐的答复，唐再三解释说：“这不过是形式问题和程序问题，这样做法是蜕变，对达到革命目的，并无冲突。”南方代表认为绕了一个弯路也勉强可以同意，因此乃进一步和北方代表讨论如何召集“国民会议”以

解决“国体问题”。双方协议由革命军所占领的十四省和清政府统治的八省，每省各派代表三人，参加国民会议。国民会议的地点南方代表提议在上海，北方代表则表示必须向袁总理请示后才能决定。

11月12日下午6时段祺瑞正式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宣布自现在防区撤退一百里，以示北洋军对谈和的诚意。撤军时军容整齐，秩序亦佳。中外人士围观的有数千人，均啧啧称道。

1911年11月13日，就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一天正是南北双方和谈代表在沪讨论国民会议的组织问题。这个议题有两点要讨论：一是出席代表的产生，由革命军所占领的十四省和清政府所统治的八省，各派代表三人组织之，这个问题北方代表唐绍仪已经接受；二是开会地点问题，南方代表伍廷芳提议在上海召开。北方代表唐绍仪表示要向袁内阁请示后才能答复。唐请示的电报和孙大总统就职的电报同时到达袁的手上。袁听说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很生气地说：“既然已经选了总统，那么我坐在什么位子上呢？算了吧！不必谈和了。”他在一种不愉快的心情下，给唐绍仪一个指令，认为唐未经他许可就同意国民会议的代表权分配办法，应视为无效。同时，这个办法南方占14省对北方的8省，不待开会，北方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了，因此他发电上海声明不同意，同时谴责唐的越权行动。唐绍仪在此情形下，只好引咎辞职。袁接受唐的辞职，同时电请伍廷芳北上直接谈判。伍廷芳则请袁南下，双方和谈变成了电报往还，不得要领。

袁世凯在这时候使出了好几种手法，他既向革命军威胁，又向清政府要挟，他的手法是：

（一）北洋军由姜桂题、冯国璋等发表联名通电：“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这是对付革命军的；

（二）清政府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领衔，电请清帝退位。这是对付清廷的；

（三）命令张勋的辫子军反攻南京，以试探革命的力量。可是辫子军太不中用，先被江浙联军和粤军在固镇击败，又被粤军和淮军在南宿州痛击，张辫帅结果连徐州也守不住，乃逃到山东；

（四）设法取得革命军方面保证，如果清帝退位即推袁继任总统。其实这一默契早已形成，不过袁还不太相信。在革命军这方面由于妥协分子太多，大家认为基于民族主义观念，只要清室让国就已经完成革命目的了，袁手上有北洋军，不该逼他走曾国藩的路，所以只要袁参加革命，无妨推袁为大总统。

南北和谈转入幕后，杨度和汪精卫变成了主要人物。汪已被袁收买，又曾在北京和杨度组织了“国事共济会”，南方妥协分子又占多数，因此，促孙大总统让位于袁，由袁负责推翻满清政府的交换条件便更加成熟了。

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

“当前的革命形势，满清垮台已无问题，可是袁世凯则是革命最大阻力。袁的问题不仅是他本人为一奸雄，加上他还有北洋系的四镇兵力，这四镇兵力无疑的乃是当前最富战斗力的部队，所以袁的势力至少可以达到武汉，甚至湖南，而广东对北洋军来说，因为距离较远，鞭长莫及，自可埋首建立一支反袁的革命部队。目前姚而平已组成劲旅，不过人数不多，若有半年时间，简练民军，全力扩充，则五六万精兵不难组成，以此和袁一拼，才有必胜把握。所以先生目前以留粤为上策，因为现在赴上海，必被拥为总统，这个总统没有能战的兵卒，一定受制于袁，对革命事业是无补的。”

胡的意见很正确，可是孙中山先生却更有卓见，孙先生说：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革命不是靠坚甲利兵，如果我们不能登高一呼，身入虎穴，那么人民所仰望于革命志士的是什么呢？”

胡汉民、廖仲恺都被孙中山先生伟大抱负和开诚胸襟所感动，胡表示愿随孙先生北上。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先生一行抵达吴淞，上海方面革命党人陈其美、黄兴、汪精卫等均在码头欢迎，大家相见狂喜，竟至拥抱跳跃。

孙中山先生抵沪后下榻爱俪园。初七日召集最高干部会议，出席的有：黄兴、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宋教仁、

张静江、居正、马君武等，会商组织临时政府方案，一致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孙先生认为责任内阁不是中国鼎革时所宜实行的制度，但宋坚持，孙中山先生终于勉强同意，并命宋和张继等磋商内阁总理人选。张继主张推宋教仁，宋坚决不肯接受，并提议推黄兴。黄初不肯接受，宋乃请居正、田桐、吕天民等再敦劝黄兴，黄最后才应允。但此拟案，必须交由南京的各省代表通过，因各省代表原已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总统制，而现在却要改为内阁总理制。

同盟会在革命时期一直是个秘密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才决定改为公开组织，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宋教仁、胡汉民、马君武、刘揆一、平刚、张继、李肇甫、汪精卫、居正、田桐为干事。实际责任由宋教仁负责。

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的观念多是“排满”的狭义民族主义，所以革命成功后，部分革命党员以为目的已达，过去结合的因素消失，加上组府的人事问题，革命的其他意见，因此分化的作用便随之发生。章炳麟的光复会本是同盟会的一个支系，辛亥光复后，同盟会主急进，章派主缓进。南京政府成立后，章即脱离同盟会，民国元年1月3日先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来张謇一派的预备立宪公会因同以江浙人士为中心之故，遂与章之中华民国联合会合并，组成统一党，以注意民生采用社会政策、发展国民经济等十一项为政纲。另一方面孙武因不满黄兴，乃约湖北临时参议员刘成禹、张伯烈等组织民社，以拥黎为号召，主张“进步主义，以谋国

利民”为宗旨，这个民社可说是以湖北人作为中心。

中华民国的临时参议院是在国民元年1月28日上午8时正式成立，议员到会的有17省38名议员。孙大总统致祝词，然后黄兴、蔡元培、居正、马君武相继演说。最后推选林森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

孙中山被迫让位袁世凯

孙中山在被选为大总统后，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实际的情况可能比胡汉民当时推测的还要糟糕。反过来说，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目的已经达到，退而求其次也未尝不可。这正是政治家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孙中山名为总统，实际上各省还是处寸：各自为政的状态，军事、财政远不足以达到摧毁北方势力的程度，这也是孙中山不得以而为之的最主要的原因。他在就任总统第二天，即通电袁世凯“文虽暂时承令，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孙中山先生连续又复一电，方去了袁世凯心中最大的一块心病。

袁世凯开始向满清王朝动手。他一方面请假不上朝，一方面逼清廷宣布退位，否则便要辞职。良弼这时便挺身而出，主张隆裕太后批准袁内阁辞职，另组皇族的战斗内阁，派铁良南下统率清军，以不受袁的北洋系牵制。袁世凯这时的实力比良弼当然大多了，他要对付良弼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不愿蒙谋杀满人亲贵的罪名，于是乃采取借刀杀人，移花接木的妙计。这时恰巧汪精卫由上海回到北京，他便对

汪暗示：清廷退位已无问题，目前的阻力是来自良弼，只要除了良弼，一切便水到渠成。汪得到这个消息，便去天津，在天津遇见了旧友黄树中。黄自谋刺摄政王失败，坐监获释后，就改名黄复生。汪劝黄会杀良弼，给了黄一张奉天讲武堂总办崇恭的名片，要黄持崇恭名片去见良弼。黄复生自己不愿去，但答应物色一个“荆轲”。汪走后恰巧彭家珍访黄，黄把江来访的意思告诉了彭，彭很激动，自愿担任荆轲，他讨了崇恭的名片到了北京，找到了光明殿胡同良弼的住宅。民国元年元月廿六日，良弼退朝回家，彭家珍迎了上去，出具不意对良弼扔了一个炸弹，彭自己当场被炸死，良弼炸断了一条腿，当场重伤，第二天也死了。

同一天，由段祺瑞领衔，清军将领联名致电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并各王公大臣：请即代奏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良弼被刺和段祺瑞等著名将领联名通电同一天发生，这一来让清廷万分震动：一方面显示革命党人在北京皇城内外已满布党羽，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握有兵权的北洋军将领已向清廷敲了丧钟，奏了哀乐。因此可把清廷亲贵王公们吓得魂飞魄散，朝不保夕，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纷纷席卷细软，携带妻妾避难到天津、青岛、大连租界，托庇于洋人。还有不能走的则纷纷请袁世凯派兵保护。

1月27日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时，王公亲贵到的寥寥可数，只有代表袁世凯的赵秉钧如时而至。隆裕向着赵哭说：“赵秉钧呵，你快点对袁世凯说，一切事情都好商量，保全我母子的性命要紧。”

民国元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

清白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至宣统退位，共计297年；自顺治入主中国，至宣统退位，则为268年。宣统退位是在民国元年2月12日，就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袁世凯此举成功，算是给革命党人作了一个交待。由于有言在先，孙中山以伟人之胸襟，提出推荐袁世凯候选临时大总统的咨文并辞，元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17省代表人，共计17票。投票结果，袁世凯得1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终于将大总统的位子从孙中山的手中“接”了过来，对于革命党人来说，他们掌握国家政权，连总统椅子都还没有坐热。

不过孙中山先生了解袁是一个只知实力政治而不尊重法治的人，所以他有所保留，附带了条件，促使袁到南京来继任总统而脱离北京的封建势力，同时把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作为一道紧箍咒套在袁的颈项上，借以约束袁的野心，而使其走上法治轨道。

清帝退位后，定都问题成为当时一个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主张仍应以北京为首都，宋教仁、章炳麟持之尤为。章认为南京不能控制满蒙，清命虽黜，遗孽犹在，北军未必没有怀念旧主的，加以蒙古和满洲为其后援，则死灰将复燃。但同盟会要员则恐惧袁世凯在北方有雄厚势力，若定都北京，袁为总统，则推翻清朝换来袁世凯，亦是以暴易暴，所以坚持定都南京。

当2月13日孙大总统辞职和举袁自代的咨文送到参议院

后，参议院对选袁为总统一事全无异议，但对于都北抑或都南一事，则争辩甚烈。议员谷钟秀、李肇甫等力主建都北京。投票结果以 20 票对 8 票的多数，决议定都北京。

孙、黄等闻悉参议院决定，均怒不可遏，急召参议院中同盟会议员黄复生、邓家彦、康宝忠、李伯中，严责参院不该通过此案而甘为袁世凯应声虫。黄兴尤为愤怒，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黄、邓等主张由大总统再交参议院复议。黄兴则认为参议院应自动推翻此案，否则黄将以宪兵入参议院拘捕所有同盟会议员。

2 月 14 日孙大总统率文武官员往祭明孝陵，秘书长胡汉民则称病留府，草拟咨文将建都北京案退交参议院复议。于是参议院临时变更议程，首先讨论此案，争论仍极激烈。同盟会籍参议员痛言此案如不获通过，则将身殉会场。投票表决结果，以 19 票对 8 票的多数，决议临时政府仍设南京。表决后孙大总统才祭陵完毕，一场国都风潮始暂告平息。

出生于南方的孙中山坚持把首都建在远离官僚政治核心的东南方地区——南京，或者武汉。他说：“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故鼎新，当有一番佳境。”

与此相反，满脑子帝王思想的袁世凯，则非把北京作为首都不可。他的判断力并不亚于孙中山，他清楚知道，要维持天威，必须借助于紫禁城的风阁丹墀。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坐落在永定河的冲积扇脊之上。西部连接太行山脉，北部为燕山山地，东面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南面是一片平畴。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北京就

是燕国国都，辽置陪都于此，金正式建都，公元1421年，大明王朝也将首都迁至这里。从此，“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在以后的六百年间，北京便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

作为一个帝都，北京理所当然地被视作皇权的象征。它承担着向普天之下、率土之滨推广政教风化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建立庞大的官僚体制，是势不能免的。在两千年历史里，这一体制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到了明、清两代，已经渐臻尽善尽美了。

在南北双方的谈判过程中，孙中山以固执的态度强调：“在南京建都，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南北主张共和、疾恶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的人们，都会同意。”

然而，北方人并不欢迎这些带有新思想的南方人，而南方人对北方浓厚的官僚作风也觉得格格不入。

尽管人们知道，那个死守帝都的政府是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找到一条根治恶疾的良方妙药。这种政治制度，成了近二百年无数流血革命的直接诱因，但每一次革命，除了制造一批新官僚填补被推下台去的旧官僚遗下的空缺，几乎完全没有触动权力的基本结构。

到此时止，问题的重心便落在袁世凯愿不愿到南京就职了。在革命同志看来，袁世凯虽不是理想的民国元首，可是他已履行了逼迫清帝退位的工作，革命党人都重然诺，所以只有迁就事实，选袁代孙。如果袁能脱离封建官僚遗毒甚深的北京，加上还有国会的牵制，同时正在起草的《约法》是采取内阁制，有这种种因素，总统便没有什么实权，袁当总

统后总不致会太背叛民国的。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袁是个纯粹讲实力政治的人，卅年政治生涯的起伏，使他相信必须要有实力才能谈政治，他怎肯离开他的老巢——“北方”，怎肯离开他的资本——“军队”。所以他的私心，根本就未考虑过到南京去就这空头的大总统。因为他认为叫他南下是调虎离山。

2月18日，南京临时政府派出教育总长蔡元培为首的迎袁特使北上迎袁。

袁世凯用最隆重的礼节，打开正阳门来欢迎蔡等。他对这些客人不再谈到拒绝南来就职，而反过来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商谈南行的路线问题，他打算由京汉线南下，先到武昌和黎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他的这种态度使来迎的专使们松了一口气，认为袁基本态度已有改变，同时南京方面则认为袁的软化是怕南京方面翻脸，采取新行动，或挽留孙中山先生留任，或另行改选一位新总统。

元年2月29日晚上的北京城，突然枪声四起，只见许多身穿灰色军服的兵，到处抢劫，首先受难的是正阳门一带。这时南方迎袁专使们正应酬完毕，回到迎宾馆，忽然人声鼎沸，枪弹横飞，血红的火光浮在窗面，人们奔走相告，说是兵变了。为什么会兵变呢？大家异口同声说是由于北方驻军反对“袁官保”南下，反对专使们抢走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怀恨作乱。专使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由不信，仓皇收拾细软，赶到六国饭店避难。

北京兵变后，北方各省督抚都通电反对袁南下就职，蔡元培专使亦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主张迁就。于

是临时参议院决议，允许袁在北京通电就职，不过就职时必须履行三个手续：（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新内阁名单必须得参议院同意；（三）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大总统始行解职。

民国元年3月8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情势演变至此，南京方面调虎离山，想把袁世凯诱引到南京来的计划是完全落空了，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便是由临时参议院把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完毕。原来当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组成的，其后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加以修改，成为《临时约法》。自民国元年2月7日起，至3月8日止，经过一个月的会议，终将全案通过。

接着，袁世凯正式向南京参议院提议唐绍仪为总理。唐绍仪新内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赵秉钧；

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教育总长蔡元培；

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未到职，由王正廷署理）

交通总长原提名梁如浩，未被参议院通过，乃由唐绍仪暂兼。后由施肇基代理。

这份名单，好像是容纳了各方面，因为唐虽是袁的亲密朋友，可是他又和同盟会方面是好朋友，陆徵祥是无党无派的外交家，熊希龄是君主立宪派，袁系的人只有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三人，而同盟会方面却有蔡元培、王宠惠、宋

教仁、陈其美四人。袁认为这是非常公平的分配，其实则是掩耳盗铃的，因为唐绍仪是袁的老友，而陆徵祥则为袁系的附庸，而君主立宪派在同盟会和袁系间是选择亲袁的路线。因此在唐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军事、交通六个重要部门都抓在袁手中，同盟会所得到的只是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无所事事的冷衙门。

第一届的内阁，由孙中山的同乡唐绍仪担任总理。唐绍仪既是南方人，同盟会贝，也是袁世凯的朋友，他的上台本来带有很浓的“南北调和”的色彩。但北洋官僚们对有这样一位南方人，在他们的地盘进进出出，总觉得非常刺眼。

其实，唐绍仪的总理并没有什么实权，事无大小，几乎都要请示袁世凯，由他定夺。唐绍仪每天都在公府和内阁之间往返奔走，请示报告。他和袁世凯虽然有多年的私交，但现在才忽然发现，这些私交变得分文不值，他们之间再没有敞开心扉的时刻，一切竟然那么陌生。

6月16日，也不和袁世凯打招呼，唐绍仪留下一道辞呈，直奔天津而去了。袁世凯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到天津挽留唐绍仪。梁士诒也是广东人，因与康梁有关系，未为清政府所用。后来邮传部成立，梁士诒得到唐绍仪的汲引，才开始踏足政坛。民国成立，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梁士诒任秘书长，并特许参与各铁路事，兼任交通银行总理。

唐绍仪对梁士诒说：“我与项城（袁世凯）的交谊，你是知道的。据我观察，今天的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不可；而要治理中国，非项城和孙中山合作不可。但三个月以来，审机度势，恐怕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所以不如早作打算。

国家大事，我又怎能以私交徇公义呢？

两位南方人进行了彻夜长谈。第二天，梁士诒回北京去了，接着总统便批准了唐绍仪的辞职。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内阁在成立两个月后便倒台了。

在军事上，同盟会原来推荐黄兴在新内阁中继续蝉联陆军总长，当然这是想限制袁的军事特权，使他不能把国家的军队当作私人的工具。可是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袁世凯是必需要掌握军队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因此决不肯把陆军总长这个人选让给袁系以外的人担任，更不会同意给同盟会的“实力派”领袖黄兴，所以只同意改派黄兴为参谋总长。参谋本部在当时是个有名无实的机关，黄兴当然坚决拒绝接受这个空名职位。

共和与专制的较量

袁氏独裁专制

统一的中华民国的最终建立，是南北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民初形成了三股政治势力相互制约的格局：革命派、立宪派、北洋军阀集团。

立宪派虽转向拥护共和，但左袒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集团，排拒革命派。它延续了自己在清朝形成的妥协性，抱定主意要在袁氏政权下，小心翼翼地推进民主政治。它强调“国家主义”，视年轻气盛，力倡民权自由和极力监督批评政府的革命党人为“暴民”，深闭固拒。时人高一涵评论立宪派说：“这党宗旨在和平改革，无论什么时代，只要容许他们活动，他们都可俯首迁就。到了他们不能活动的时期，也可偶然加入革命。但是时局一变定，他们便仍然依附势力，托庇势力之下以从事活动。”这话颇能传达立宪派的神韵。

革命派让权于袁世凯，实出于无奈，因之其心中并不释然。但同盟会内部又有稳健派与激烈派的分歧。前者以为，清廷退位，袁氏宣誓效忠共和，统一的中华民国既告成立，革命毕竟是成功了。此后的斗争应表现为政治建设，而非革

命破坏，即当以国家为前提，消除党见，同心协力，共图进取。要把对政府的监督和信任统一起来，二者不可偏废。后者反对南北议和，以为孙中山让位于袁，无非“以大好江山断送于操、懿之手”，因此革命并未成功，遑论建设。他们力斥袁氏包藏祸心，立宪派党人为虎作伥，主张实行“二次革命”。稳健派批评激烈派的言论流于偏激，意气用事，于事无补。稳健派主要是一些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在内的同盟会上层人物，属革命党主流派。激烈派则以戴天仇、何海鸣等为代表，属非主流派。但无论如何，其一，激烈派并无与袁抗衡的力量，他们只是言者，而非行者；其二，同盟会仍是其时勇于监督袁世凯政府的主要力量。

毫无疑问，袁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在民初政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是指其控制着政权，而且是指在时人的心目中，袁被视作代表社会稳定的势力，其声望一时如日中天。时任中国银行监督的吴鼎昌评论说，武昌起义后，中国政局风雨飘摇，终因袁世凯出，清廷退位，南北统一，共和始告成功。革命党人经营了10余年未能办到的事情，袁“成之于旦夕之顷”；西方诸国经一世纪血战成的共和政体，“彼定于谈笑之间”，其丰功伟绩非他人所能比。天下归心，大总统属袁，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尤其指出下面一点：“于是革命党人所得之美满尊荣之名位，如火如荼之势力，未及旬月之久，不能不拱手而让诸项城，勉强而成之局也。”这就是说，随着政权落入袁的手中，袁声势日隆，相反，同盟会革命党人却黯然失色了，吴的评论对袁不无美化之嫌，但他指出的后面一点，不仅合乎实际，而且十分尖锐，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袁世凯信守矢志共和的誓言，上述三派政治力量互相制约的格局，未尝不能成为推动民初政治建设的良好机制；但是，袁氏封建专制之性成，与共和制度格格不入，这样，三派政治力量的相互制约和斗争，虽然在1913年宋案发生和激起“二次革命”之前，大体上仍保持在共和制的框架中运作，但它从一开始便不能不表现出共和与专制较量的斗争性质。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1859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的家庭。自幼因父母溺爱，倔强任性。后随养父袁保庆为官南北，居无定处，喜虚荣挥霍，不好读书。日与无赖少年为伍，酗酒纵情，意气自豪。众人推袁为首领，袁发号施令，党徒俯首听命，无人敢违，“或当面撻之，其人抱头鼠窜而已”。又蛰居无聊，想附庸风雅，发起文会；但会中人多嗤其肤浅，羞与为伍。袁便出钱收买人心。终使众人举其为盟主，“袁亦施施得意”。所以，袁自小便有很强的权欲，颐指气使，性喜独裁。

1881年，袁往山东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得吴赏识，很快被提拔充庆军营务处帮办。次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廷派吴率兵入朝镇压，袁也随军前往。这是袁步入官场和逐渐发迹的起点，虽初步显示了军事才干，而其贪权专制的劣根性也开始发展。这集中表现在：一是排挤吴长庆，擅权跋扈。他走李鸿章女婿张佩纶的门子，使李调吴驻防奉天金州，任命自己总理留朝的三营营务，并会办朝鲜防务。同时，袁随意变更营制，一点也不把吴长庆放在眼里，以至于同在一处并为其师的张謇看不过眼，联合幕友请人致书袁，斥其忘恩负义；二是对朝鲜内政妄加干涉。1884年袁在镇压了开

化党“甲申政变”后，竟以监国大员自居，擅自搬进皇宫，对朝鲜国王李熙进行直接监视。同时要各部大臣每天向他请示，“环绕左右听指挥”。李不堪忍受，曾秘密寻求俄人保护。后袁再次入朝，愈加盛气凌人，尤其是对朝驻美大使的行动妄加干涉，不仅增加了朝鲜人的反感，而且引起美国的不满。袁的独断专行，伤害了朝鲜的民族自尊心，实有利于日本侵略势力的发展。

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在小站编练新军。这是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后来得以崛起的最初资本。袁将这支军队变成他私人的工具，依仗的仍然是专政的手段。有一次张之洞问练兵的秘密，他不无得意地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无怪乎在北洋军队中，人人只知有袁官保，不知有朝廷。“服从、报恩不党，三个基本意识可以为北洋军人思想之结晶”。袁任直隶总督后，进一步将新编陆军扩充为六镇，并借巧取豪夺复将盛宣怀把持的一大批洋务企业统统抢了过来，垄断了清廷很大一部分的军权与财权。北洋军阀集团的势力便告完全建立起来了。如果说北洋舰队还是对外的，虽然失败了，袁练北洋六镇则开始就是对内的，镇压人民，镇压革命，镇压共和。

醉心权势的独裁者，一定是绝无信义可言的野心家。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出卖维新派和光绪帝，在辛亥革命中则出卖清廷，这是合乎其自身逻辑的。所以，尽管他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信誓旦旦，但其封建专制的劣根性并未稍易。1911年底，一位英国记者就曾断言说，“我还没有见到袁世凯，但

我肯定，只要他活着就想当独裁者，不论政府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的”。这是十分尖锐的判断。果不其然，北京政府刚刚成立，南方人物纷纷北来，袁即对身边的人说：“他们来，我们是欢迎之不暇的，但是要在我这个圈儿里。”就是说，这位刚刚走马上任的民国大总统，奉行的仍旧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封建专制独裁的既定方针。

当时不是没有人警告袁，其时并不主张反袁的著名记者黄远生，在自己的评论中仍一再提醒袁，当改封建专制的旧路数，否则于国于己，为害无穷。然自其受政以来，积恶日多，“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裕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但是，袁世凯充耳不闻。

一个封建军阀专制之性成的野心家，顶着大总统的桂冠，把持政权，新出世的中华民国其命途多舛，无可避免。

唐绍仪拂袖而去

席绍仪内阁是南北统一后建立的第一个内阁，由于总理和司法、农林、教育、工商四总长均为同盟会员，故又被称

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唐虽原是袁世凯的亲信，却非北洋出身。唐袁共事 20 多年，彼此关系在朋友与部属之间。与奉袁为衣食父母的北洋军人不同，唐之于袁，不存在归属情结，私情与公义，尚判然有别。因之常受袁左右的排挤与低毁。南北议和时，唐已受袁的猜忌，后加入同盟会，且竟然同意南方的提议，派兵护卫国务员北上，尤招北洋军人的忌恨。但更严重的是，唐公然主张袁与孙、黄合作，这在袁等看来无异于否定了北洋集团的独尊地位，是可忍，孰不可忍？凡此种种，都使袁相信唐在挟同盟会以自重，“想独树一帜”。所以，记者黄远生报道说，“自唐氏未入京以先，政界纷传袁唐龃龉之说，来往电报上多有可证者”，绝非空穴来风。

政府北迁后，袁唐矛盾迅速扩大了。这是因为唐坚持约法的规定：总统的命令未经总理副署无效。欲使自己的内阁成为名符其实的责任内阁，严重束缚了袁的手脚。例如，袁在参议院发表的宣言号称“教书”，“中间多经唐氏改窜，乃行发表”。总统府给各省军政长官的重要复电，电稿交国务院酌改译发，甚至径由院方拟稿，未署“国务院”三字。又如，袁已批准张勋请发欠饷 30 万两，唐谓张拥兵自重，居心叵测，只允给 3 万两。袁虽派人代为疏通，不为所动。唐凭着与袁有多年的交情，敢于与总统立异，抗争座上不稍屈，以至于总统府的侍从武官每侧目视之、二人常起争执，唐总是说“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这类的话。袁愤甚，既不便反对，又没有适当的话回答，便常说，“吾老矣，少川，子其为总统”！弦外之音，是指责

唐有抢班夺权的野心。

一日唐驱车过市，途遇骑兵数十人，拥一辆双马车飞驰。居前开道者挥鞭喝令后车躲开，骄横不可一世。幸趋避及时，唐差一点没有挨上鞭子、待此行人过后，一打听，才知道双马车中人乃护卫总统之拱卫军总司令段芝贵。唐不禁仰天长叹道：“吾以为前清摄政王，夫以一军司令之武威，总理尚不能不趋避之道左，而谓实行内阁制度，以无拳无勇之总理，即事与统率陆海军之大总统掣长较短，甚至争辩不已，宁有冀耶！”由是，浩然有去志。

其实，因袁掣肘，唐内阁从一开始便徒具虚名，举步维艰。当时海陆军及内政、外交、财政几个重要阁员都是袁的人，同盟会员只拥有几个次要的部。袁心腹内务总长赵秉钧从不参加国务会议，有事独自与袁商量决定，根本不把唐放在眼里。陆征祥是外交总长，但实际上外交方面是蔡廷干在按袁的旨意行事。他常与英美各国公使进行外交活动，不仅不接受唐内阁领导，其具体的活动情况，内阁也不得而知。在陆海军方面更是如此，真正重要的大事都由袁与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商量决定后，通过总统府军事处和陆海军部分别付诸实施，更非唐内阁所得与闻。财政总长为共和党人，听命于袁，有意与唐绍仪为难。时人谓“唐氏每有异议，必就商于蔡、宋二君”。这固然反映唐绍仪多少代表了同盟会的利益，但从另一角度看，其他总长各行其是，这位总理也只好如此做了。时在袁身边的唐在礼后来说：“当时（袁）是小事由赵秉钧一人独挑，大事就必与徐世昌相商，实际上徐好比宰相，而赵秉钧、坂西、梁士诒等是各部大臣，唐内阁不过

是遮扬的幂幂罢了。”足见唐内阁有名无实，唐本人处境之窘迫。他心中苦涩，自己无拳无勇，要在袁的手下实现责任内阁，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袁世凯不仅架空唐内阁，且处心积虑打击唐绍仪的威信，决心推倒这个碍手碍脚的“同盟会中心内阁”。

借四国银行团之手打击唐，是袁狠毒的一招。由英法德美组成的四国银行团创立于清朝，目的是垄断对华借款。唐绍仪想打破此种垄断，1912年3月和袁共同出面，向条件较优的比国财团借款1000万镑，经南京参议院批准实借500万镑。自由借款本属中国主权，但四国银行团却借口违约，随即向袁提出抗议。袁趁机把责任推到唐的身上，他答复说，“此事系唐总理经手，仍须俟唐总理回京后方能决定”。唐刚抵京，银行团即向他提出抗议，要求废除比国借款合同和赔礼道歉。唐以总理之尊，被迫照办了，但在5月3日的借款谈判中，银行团却又进一步提出外国武官参加遣散军队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有意使会谈破裂。而8日袁接见银行团代表和改由熊希龄直接谈判之后，银行团却立即主动取消了上述苛刻条件，并允许在借款合同尚未成立前，可以酌量提款。这显然是有意对熊赏脸，给唐以难堪，暗示袁排斥唐之后，熊是可以接受的。而与此同时，有人又趁机掀起要求追究所谓唐贪污比款的风潮，更使唐陷于极狼狈的境地。20日，唐被迫向袁提出辞职，虽未获准，信誉已大遭损害。所以有论者指出，“世凯之如此行为，就是借刀杀人之故技”。

袁打击唐更沉重的一招，是他制造的所谓“王芝祥事件”。它最终赶跑了唐绍仪。先是参议院于南京议决接受北方

统治权，各省督抚一律改称都督，并由咨议局改为省议会公举都督的规定。直隶士绅属意驻南京第三军军长、原广西副都督王芝祥，通过正在南京组织政府的唐绍仪代向唐推荐。袁与同盟会协议后也主张由王督直，并征得了袁的同意。唐入京后，重申前后又当面许诺。唐以为此事已定，遂电召王芝祥来京，并于直绅晋见时宣布已得总统许可，等王一到京即可发表。没想到王甫抵京正准备就职，袁却授意直隶各路北洋军队忽然发表通电，指责发动此事的谷钟秀等人接受有巨额贿赂。同时，许多人接到匿名恐吓信，说“谁要附和此事，要拿人头来见”。一时谣言四起，说能取得谷人头者，赏洋一万元等等。于是袁便借口军队反对，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抚使。直隶是北洋的地盘，也是袁的老家底，他是绝对不许外人染指的。唐绍仪没看清这一点，跑去找袁理论，说政府不能以军队反对为由失信于民、两人遂大起冲突唐表示，若不能维持原议，国务员将全体辞职。袁说。我是总统，受全国人民委托，我之用人乃以国家为前提。并未违反《约法》。国务员中有谁想辞职，尽可辞职，但若借同盟会相要挟我就要召开全国大会将此事公诸于下。”未了，唐拒绝在袁给王芝祥的委任状上副署。袁则不顾约法的规定，将未经总理副署的委任状径行发表，并送给王一笔远远超出实际需要的宣抚费，示意余款无须上缴。这样，王既得了钱，又得了官，更重要的是得到了袁的亲切关注。他心满意足，走马上任去了；但是，庸内阁在政治上却受到了重大打击。

至此，唐绍仪全然失望了。6月15日，他悄悄留下一张假条，便不辞而别，独自一人乘一辆人力车至火车站，搭头

班火车赴天津。

庸拂袖而去，正中袁下怀，但他仍假惺惺地派梁士诒到天津慰留。唐对梁说：“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国民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势，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以私交徇公义哉！”二人作竟夜谈，梁见事无可挽，次日径回复命。

唐绍仪3月23日由袁世凯任命为总理，到6月28日正式获准辞职，前后不过一百零几天，其寿命何其短也！

搞垮唐绍仪内阁，是袁世凯破坏共和制度的严重步骤，但时人既多不以此为意，袁初试得逞，其专制独裁的手从此伸得更长了。

内阁混合

唐绍仪挂冠而去，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王正廷四位同盟会阁员随后也提出辞职。袁世凯对蔡元培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则答曰：“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唐内阁瓦解，引起舆论哗然，政潮涌动。

各派政治势力对唐去职反应不一。统一党、共和党不仅对唐冷嘲热骂，且趁机攻击排挤同盟会。统一党发表“宣告同盟会会员罪状电”说，唐绍仪“擅离职守”，“监守自盗”，“畏罪潜逃”，固不应挽留；“宋、蔡则惟务党争，不为国计”，也应听其连罢。共和党也发表了相类的通电。同盟会势力则

起而反击。广东胡汉民致电袁世凯，指斥统一党妖言惑众，要求“治以虚诬之罪”。戴天仇则在《民权报》上撰文指斥共和党人本是“反对共和之恶魔、专制主义之饿鬼”，其依附袁世凯，排挤同盟会，不过是前清立宪派旧官僚的故态复萌。同盟会本部的通电则高度赞扬唐的行为，乃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风度。

可惊的是，唐内阁的瓦解本是袁破坏约法的严重步骤，时人却没有想到去追究其责任。其时各派政党对袁的违宪行为熟视无睹，除了互相攻击外。便是热衷于争执继任内阁的组成：混合内阁，政党内阁，还是超然内阁？这成了当时热门的话题。由此看到，当时政界民主共和意识之淡薄，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

同盟会提出了政党内阁的主张。它认为，唐内阁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不是“纯粹的政党内阁”，而是党派混杂的混合内阁，因之政见不一、难乎为继。6月20日，同盟会代表张耀曾、李肇甫等四人进谒大总统，明确表示本党主张政党内阁，下届内阁“如仍采混合内阁之制，同盟会会员惟愿不再加入”。

在同盟会中，宋教仁、蔡元培主张政党内阁最力。宋以为要建设进步的国家，须有健全的政府、“有权而后尽其能，有能而后尽其责，是之谓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这样的内阁必须由在国会中取得多数议席的强大政党来组成。才可能做到名符其实因之，它同时必须是纯粹的政党内阁。早在筹建南京临时政府时，他就已提出了这一主张，但未能实现。后屈就唐内阁农林总长之职，身历其境，感慨良多，原

有的政见愈加坚定。他在辞职后致书友人说，入国务院凡3月，“大政方针茫然未见，日开会议，惟问例事。阁负各行其是，加以党见分歧，欲求和衷共济，更所难得。夫如是而求其成立集权政府，建设统一国家，岂缘木求鱼之类乎！”他表示，既已辞职、往后的目标就是要为实现政党内阁而斗争，决不动摇。

1912年6月28日，同盟会召开职员会讨论组阁问题。在会上，蔡元培提议同盟会各国务员全行退出，以示本会主张纯粹政党内阁的意见。刘揆一表示反对、他认为同盟会的势力在北京已经削弱，若退出内阁，将来消息愈加隔膜，于自身发展大为不利。但宋教仁态度异常坚决，他说，本人一向主张纯粹政党内阁，因之辞职不可避免。如本会同志不赞成，我宁可退党，也决不改变初衷。经讨论，会议接受了蔡的提议，并议决同意袁提名的陆征祥出任总理，但同盟会员不得入阁；否则开除出党。7月1日、同盟会本部发表“宣布政见”电，公布了这个决议。21日，宋复发表演讲，重申说：“如不能选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

共和党和统一党都主张超然内阁、所谓超热内阁，就是由大总统任命无党派者为总理，阁员则由各党协商推定，故又称“超然总理混合内阁”。共和党通电称“本党迭次讨论，咸以超然总理混合内阁为目前救时之要策。……倘有不以国家为重，坚持政党内阁之议，是直为扶植党利之私，吾党决不承认”。统一党的章太炎也以为，政党内阁“在今日有百害而无一利”。两党明知自己无力单独组阁，但也不愿让同盟会

组阁，故主超然内阁说以为抗衡。

6月21日，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曾举行联合会议，交换组阁意见。同盟会坚持政党内阁，共和党坚持超然内阁，统一共和党同意超然内阁，却反对共和党所提“国务总理必举总统信任者”。结果大家各执己见，不欢而散。

总统袁世凯对第二届内阁组成的意见，自然更引人注目。6月20日张耀曾等四位同盟会代表进谒总统并提出政党内阁主张时，袁曾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唯诸君所说之超然内阁及政党内阁，余均不能赞成。以余之意，现在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第一人材之缺乏，……故以余之意见，非连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同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吾国今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材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今日余之主义，则实不能赞成诸君之说，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

所谓“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不过是袁打出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其实质是在向同盟会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只要我袁某在位一日，就不容许成立政党内阁。同时，据报道，最后“大总统之意见则谓宜组织超然总理混成内阁”。这样，袁的主张不仅与其开头所谓“政党内阁、超然内阁，余均不能赞成”的说法相左，而且也与“只问其才不才，无论其党不党”的标榜相矛盾。说到底，袁的指导思想是：不仅不容许同盟会组织政党内阁，而且也不容许同盟会员再像唐绍仪那样组织混合内阁。

由上可知，对于第二届内阁的组织，实际上形成了同盟会主政党内阁和袁及共和党等主超然内阁两种意见分歧。同盟会虽然是在照搬西方政党内阁的模式，但它对袁明确表示的反对态度却未予重视。这样，尽管同盟会表示对总统任命任何人组织超然内阁予以维持，但它与袁世凯间的矛盾，却无可避免地由是深化了。

陆征祥内阁的风波

袁世凯本想提名徐世昌为总理，组织超然内阁。徐曾任晚清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等职，为袁早年结识的密友。但消息一传出，即遭到同盟会激进派的猛烈抨击，以为袁起用糊涂昏聩的“徐死人”，意在为复辟帝制张本。徐本人也急忙避走青岛。袁感到立即起用徐尚非其时，于是改荐陆征祥。

陆征祥（1871—1949），字子欣，江苏上海人。早年毕业于同文馆，曾先后任清政府驻荷兰、俄国公使，并为唐绍仪内阁外交总长。陆久居西方，精通英语，应酬交际圆满周到，深得外人喜欢，因之有“欧洲式外交家”的美誉。陆于各党超然无所属，袁以为“温顺可用”，遂于6月29日任陆为总理，获参议院通过。

陆的组阁名单是袁代定的。袁为装饰门面，置同盟会关于其成员不参加下届内阁的声明于不顾，仍提名同盟会员孙毓筠、胡瑛、沈秉望三人分别任教育、农林、工商三部总长。记者黄远生评论说，袁固然标榜只问才不才不问党不党，但

同盟会更有许多人才，何以单提此三人？无非“以此三君入京以来，与袁君最愜。又其所持主义又稳健”罢了。同盟会对此十分不满，宋教仁称袁此举是一种“逼奸政策”，并派魏宸组往谒袁，请他尊重本党意愿。7月16日同盟会又正式开会否决了孙、胡、沈三人参加内阁的意见。

但袁充耳不闻，除胡瑛因共和党反对换成王人文外，仍将孙、沈列入陆内阁阁员名单。这样，除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留任和外长由陆兼任外，袁提出的6名补充阁员名单是：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教育孙毓筠、工商沈秉堃、交通胡维德、农林王人文。7月18日陆将内阁名单提交参议院，并到院讲演政见。陆至时，全院肃然起敬，以为这位大外交家出身的总理，于民国大政必有一番崇论宏议。不料，陆登坛后竟是这样讲：“征祥今日第一次到贵院与诸君子相见，亦第一次与诸君子直接办事，征祥非常欣幸。二十年间，第一次回国仅三个月，在京不过两星期。第二次返国，还是在前年，在本国有十一月左右。回来之时，与各界之人往来渐少，而各界人目征祥为一奇怪之人物。征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谓征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所以交际场中，极为冷淡。此次以不愿恭维官场不引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来办极大之事体，征祥清夜自思，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一日。在外国时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颇早，此回可谓征祥再生之日。以上所说之话，不在公事之内。……”

陆的演讲充满了“开菜单过生日”种种不可思议的鄙言俚词，而始终未及政治方针，全院因之哗然。以为民国正当

草创时代，“总理如斯，国务复何望”？翌日，参议院尽数否决 6 位国务员，并提出弹劾总理失职案。陆征祥因之辞职。但袁不许，陆便躲进医院，从此抵死不出来。由是便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袁世凯对参议院公然否决 6 位国务员，大为震怒，以为这是对自己权威的挑战。他愤然说，一个人不擅长演讲并不就说明他不足以担任总理，俾斯麦到议会便面红耳赤，然而俾斯麦却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传出口风：参议院尽可以否决，但提案是我的权利，我总可以找到人，不断提出组阁名单的。

由是，共和党赶急随风转舵，发表拥护陆征祥内阁的通电。否决 6 位国务员本是共和党、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三派议员的共同行动，但通电却将事情全推到了后者的身上，指责他们投不信任票，陷国家于危险的无政府状态。这引起了后者的不满。统一共和党通电反驳说，对于议案同意与否，议员有白决权。是日同盟会与本党到院者不过 50 人，投票者 98 人，反对票竟多达 87 票，足见反对者各党皆有，何以“己党不同意，即置不言，他党不同意，即为亡国”？同盟会也通电指斥共和党居心险恶。

不过同盟会却把参议院否决 6 位国务员认作是超然总理政策的失败，其政党内阁论因是复起。同盟会在什刹海集贤堂开会，会上有人主张宋教仁内阁；有人主张黎元洪内阁；还有人主张蔡锷内阁。一些人兴奋异常，以为因乘利便，政党内阁的建立，此其时也。

事实上，其时袁世凯正加紧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

决心迫使参议院就范。其强硬的一手，便是指使军警向参议院施加压力。7月21日北京军警以反对无政府状态为借口，召开特别大会，对参议院大肆攻击，并通过三项决议：

（一）通电各省都督及报馆，使电大总统再提国务员，早日成立政府；

（二）由军警二界共同致书总理，极力挽回；

（三）致函参议院，请于第二次提出国务员时予以同意。

其电文杀气腾腾。后又开第二次特别大会，纷纷要求武力解散参议院。与此同时，军警印刷的传单，布满街市。有署名“军界公启”的，宣布参议院议员吴景濂、谷钟秀等“罪状”；另一匿名传单声称，但能取得吴、谷二人头颅，赏洋1万元；又有署名“健公十人团”的，分送103封信给议员，扬言再不牺牲党见，将以炸弹从事。还有一个人打电话给参议院，声称军警将对之采取不客气的行动，请务必当心。议员人心惶惶，原住财政学堂的议员，纷纷迁出，有的甚至吓得不敢出席会议。军警一面恫吓参议院，一面则给陆征样打气。7月26日，他们派代表100多人赴国务院向陆征样表示坚决支持。

时陆着燕尾服，一副外交家的派头，出来与代表一一握手，问姓名、籍贯。其答辞称：“我在外国，亦未见军人对于国务员有如此之诚恳者，故我异常感激。”一代表追忆说，这位通洋务的总理，彬彬有礼，只是对其讲话不敢恭维，难怪参议院反感。他讲话声音太低，不仅不脱上海土音，而且语言结构是洋式的。因此如果不仔细静听，实难懂其全部意思。时有记者椰揄说：“有此三种毛病，宜其不为议员欢迎。寄语

诸君，以后说话不可带上海白或苏白，尤不可学洋派也。”

其时，参议院收到的各种谴责函电，高可盈尺。其承受的巨大压力，不单来自军界，也来自政界、新闻界。如章太炎即通电毒骂参议院，主张准许大总统便宜行事。身为同盟会员的孙毓筠也竟然倡盲由总统解散参议院，说什么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此类论言在各报中也比比皆是。所以，政潮汹涌，政府与参议院都陷入了危机。

袁世凯恩威并用，在给参议院施压力的同时，又示以怀柔。7月21日下午约6时，几与上述军警大会同时，袁设宴招待全体参议员，因下大雨，到者约60余人。袁来到大厅，谦恭地向议员们行一鞠躬礼，接着发表演说，强调内忧外患迭起，亟待议员与政府同舟共济。最后表示，“谨遵君之教，尽力担荷，愿彼此无忘今日之言”。言毕，复行鞠躬礼而退。据说，宴毕，众议员“尽欢而散”。

7月25日上午11时，军警公会公所开第二次特别大会，发言者依旧气势汹汹，纷纷要求以武力解散参议会。但就在当天下午2时，姜桂题、陆建章、段芝贵、马金叙北洋军四巨头，却在安庆会馆举办盛大宴会，邀请参议院议员、新闻记者及政界各员70多人参加。陆建章代表主人首先讲话，意谓今日盛会，目的在于联络感情，消除误会。闻近日有一种谣传，谓军人将至参议院干涉，我等“敢保其必无此事。只要试位能查出实系军人之证据，则我等自当惩办。”陆有口才，侃侃而谈，言语得体，颇得好评。但接下去，来宾发言，却大起冲突，使宴会演成闹剧。

先是刘成禹、宋教仁等相继演讲，不外大家无不爱国，

并无党见等语、没料到景耀月极言政党内阁足以救亡，高谈阔论。接着，田桐的讲演更带情绪。他说，别人都说不要党见，我独以为不可不要党见，并主张舆论不正当者，应交执法处处理。这两位同盟会员的发言，惹怒了《北京时报》总理陈绍唐，他起而大骂参议院，扬言要敢再不通过国务员名单，“当宣布参议员死刑”。此言一出，许多议员及新闻记者立即群起而攻之。他们同声鼓噪，“高呼亡国亡国之声不绝”。顿时宴会秩序大乱。张继急起圆场，说我们今天是主人，政治演讲可以少作，不如请大家多吃几杯酒一并应邀唱起了法兰西歌曲，“其声呜呜然；大家皆欢喜”。群情始告安定。这时有人提议，由军界、政界、新闻界共同组织一个俱乐部，场所就设在安庆会馆。众皆赞成，段芝贵即离席说，何不拿簿子来，现在就可以发起。即此看来，此次宴会于“联络感情”多少产生了效应，尽管记者黄远生说，“若此会竟成，则记者必闻风而遁也。”

7月26日，袁将新的6位国务员名单交参议院表决。结果除工商总长蒋作宾一人外（后改刘揆一获通过），其余5人均获通过。是日会场气氛显得格外紧张肃静。一记者用望远镜观察会场情况，忽然发现投票时一议员递一条子与邻座议员，上书“议员无骨”四字。临出场，记者遇见一位认识的军官，身着便服，“胸袋间赫然有物”。记者笑问，“此中得无手枪乎？究竟其中有子否？”对方也笑着回答说：“他们若不要国家，我们也就不要法律。”记者唯唯而退。足见袁在参议院中布置了便衣军警。在其时的气氛下，此项表决结果具有多大的真实性，自然是可疑的。但是，从6月27日唐绍仪辞

职后持续了一个月的政府危机，至此毕竟暂告结束了。

陆征祥内阁的风波虽会平息，却留下了两大后遗症：一是开了袁籍军警干涉立法机关行使职权的恶劣先例；二是袁包办了陆内阁的组成，“陆内阁时代，事无大小，皆总统府决之”。所谓责任内阁从此更尽成虚言，一句话，如果说，袁推倒唐绍仪内阁是在专制独裁的道路上迈出了严重的第一步，那么，平息陆内阁的风波，迫使参议院屈从自己，则说明他已变得愈加肆无忌惮。

张振武之死

陆征祥内阁的风波刚刚平息，北京又出现了革命元勋张振武被杀案。这是袁世凯与黎元洪相勾结，公然破坏约法，联手制造的民初杀害革命党人的大冤案。

张振武（1883—1912），湖北竹山人，原名尧鑫，字春山。早年毕业于湖北省师范学校，任小学教员。参加共进会。武昌起义时，任军务部副部长，与孙武、蒋翊武并称“起义三武”。时黎元洪被迫出任都督，扭怩作态，他曾当面予以斥责。后黎欲逃遁，他大骂黎不识抬举，力主杀之以绝后患，为吴兆麟等人所劝阻。由此结怨于黎。革命成功后，湖北革命党人日益分化，孙武等人依附黎元洪，发起成立民社，奉黎为党魁。唯张振武桀骜不驯，始终不把黎放在眼里，也与孙武不和。虽名列民社，实不过问其事。他谋求独立发展，以赴沪购械为由，领得巨款，广交朋友，自我宣传。黎派人

清查帐目，并电沪督陈其美监视其行动。张大怒，返鄂面质黎元洪：“你凭什么资格查我的帐？”黎唯唯，敢怒不敢言。同时，因辛亥后继续裁减军队，湖北发生过多起兵变，黎相信这些兵变与张有关。他因之视张为心腹大患，必欲去之而后快，但一时无处下手。

袁世凯很重视武汉，因为作为首义之区，这里集中着一批革命力量，令他不安。袁极欲笼络黎元洪，瓦解革命力量。参谋次长陈宦为袁出谋划策。他对黎说：“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夫，大总统召其来京，笼以高官厚禄，转有益于副总统也。”这正中黎的下怀。因是袁便施调虎离山之计，于1912年4月电召包括“三武”在内的16位重要革命党人人京，委以顾问官一类的虚职，以便就近笼络与控制。时黎发给众人的旅费庞大得惊人，足见其心中窃喜。但没想到张振武不甘顶顾问的虚名，想做蒙古屯垦使，而袁又不能满足其要求，便不告而别，于正月中返回武汉。黎对其复归极为不满，遂起杀机。不过他不愿落下一个杀害革命元勋的坏名声，故不敢贸然行事。这时恰好袁派湖北籍议员刘成高等回武汉调和张孙矛盾，并电请张再次入京，黎选定计借刀杀人。黎一方面好言劝张北上，并赠路费4000元；另一方面，当张偕刘成高及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余人于8月上旬到京后，又于13日密电袁世凯，指控张“飞扬跋扈”，“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并要求将张及方维就地正法。电报所罗列的罪名，词意含混，不足论定，且未经法律程序，便要指定杀人，属违法的野蛮行为。

对此，袁世凯心里很清楚，黎元洪是想移窝江东，但他

不动声色，在确认了电报的真实性后，便决意将计就计，捕杀张振武。张在北上前已与孙武和好，到京后复多方应酬，以求联络感情，调和党争。8月14日他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与共和党重要人物；15日晚8点，偕湖北来的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诸将。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也在座，这时他们的身上已带有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命令。宴会未终，段芝贵便借口有事，先行告辞。接着其他客人也纷纷借故离去。此种异常情况并未引起张的警觉。10时许，张振武、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归。冯、张二人的马车同至正阳门栅门内，两旁早就布置的绳索缠住马蹄，同时预伏的军警四起，首先缚冯。冯惊问：“什么事？”一军官说：“你不是姓张吗？”冯答：“不是，我乃姓冯。”原来冯、张二人皆颀长身材，外形相似。“误会了”，那军官说着便令松其绑。张继至，遂被捕，用大车解送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在此之前，方维约于9点也在金台旅馆被捕。

张到执法处后，执法总长陆建章向他出示了黎元洪电，张说电报怕有假。陆答真假我不知道，我主要依据总统的军令。张又说，“余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不过余即有罪，应开军法会审，并要湖北交出证据，不能凭空杀人”。陆答以总统军令只说正法，并未令审讯，此事我也知未免野蛮，为足下抱不平，但爱莫能助。你若有家事交代，我定为转达。张要来纸笔，想作家书，执笔良久，不成一字，遂对陆说，“信可不写，可速处死”。次日凌晨1时，张被绑在执法处西院的木桩上实行枪决。临刑前，张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方维也在同时遇害。张振武被捕后，时功玖马车始到，

见冯嗣鸿仰卧车中，急问其故，大惊，赶紧回共和党本部报告。接着至东城邀来孙武、邓玉麟等人赶往执法处营救。时已凌晨3点，陆建章早已酣然大睡。众人催起问话，恳请保释。陆打断他们的话说：“不必了，张振武已伏刑了。”并出示袁世凯的军令，这军令依据黎元洪的密电，并有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副署。众人遭此变故，哀痛异常，刘成禹抚张尸痛哭，大呼：“无怪外间多骂共和党无人格，似此自残同党，夫何人格可言！”16日早8点，他们又同往总统府质问袁世凯。袁大言不惭地说：“我明知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将骂我；我实不能救他。”意思说自己是代人受过。孙武见不得要领，便商定通过参议院讨回公道。

袁对张案故意不作张扬，得手后只于16日在张、方下榻的金台旅馆门前出一通告，将副总统原电抄录；次述张振武“罪状”，照武昌来电判决。复奖励张起义有功，照上将礼赐恤；未加惋惜之词。袁用心良苦，他想以此种方式，既可以满足黎除张的要求，又可使因张案受伤害的人得到慰藉。但他没想到张伯烈等湖北议员的反应比自己想象的更激烈。孙武等人纷纷向袁辞去顾问之职以示抗议，并不无讥讽地提出要求发放“免死牌”。

8月18日张伯烈等20人联名向参议院提出《质问袁政府枪杀张振武案》，逐条驳斥了黎密电提出的所谓张振武罪状，指控袁、黎“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19日参议院讨论质问案，刘成高要求出席说明，议长不许，谓质问无说明之必要。刘则谓今事非比寻常，于是发表了措辞激烈、痛快淋漓的演讲。张伯烈等人更继之以嚎陶大哭，于是全院为之

震动。各党议员以从未有过的一致态度，对袁、黎串通一气，违法杀人，进行了谴责。张振武案轰动了全国。

至此，黎元洪才发现自己最终上了袁的当，叫苦不迭。他急忙通电自白，并罗织张振武 14 条罪状，实则都没有超出他 13 日给袁密电中所列的内容，所以并不足以平民愤。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以退为进，通电要求辞去副总统、参谋长、湖北都督的职务；同时却效法袁世凯的故技，以“湖北全体士民”与“鄂军界”的名义通电挽留自己，并对参议院进行反扑。其中 8 月 24 日鄂军黎本唐等通电攻击鄂籍议员刘成禺、张伯烈等人，最为猖狂。

黎弄巧成拙，他的上述倒行逆施在议院内外进一步激起了公愤。22 日同盟会本部即宣布开除黎元洪，其启事说：“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国，人神共愤”，本部议决“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许多报刊舆论也对黎元洪群起而攻之。

不过参议院内连日来虽然群情激昂，但各派政治力量对如何处置张振武案，态度并不一致。共和党中的民社派与张关系密切，尤其是刘成高等人蒙卖友之嫌，情绪最为激烈。非民社派则在附和袁世凯。张振武虽是革命党人，但与同盟会关系较浅，故后者虽存义愤，但它更关心乘机改组政府，推宋教仁组织责任内阁。至于追究本案直接责任者，却缺乏激情。不仅如此，21 日下午袁特邀民社派议员刘成高、张伯烈等到总统府恳谈，假惺惺地先高度赞扬张振武的革命功绩，接着讲为维护武汉秩序，黎副总统的密电有不能不执行之理。最后更“自责”说，“此间知法律者甚少，杀之之手续亦不完

全耳”。尚请诸位以大局为重，息事宁人。袁的此番表演又使最激烈的刘成高等人软化了。所以后来参议院虽然提出了弹劾政府问题，但是共和党主张弹劾国务院全体，同盟会主张只弹劾总理与陆军总长，各方无非热衷于枝节问题的扯皮，而于副总统黎元洪主使杀人和大总统袁世凯执行非法杀人此一根本的问题，却置之不问。而实际上总理陆征祥不过是个傀儡，他在张案发生前一直托病住院，与本案无关。且在张案发生后，先已自动提出了辞职，弹劾并无意义。至于段祺瑞等人不过是爪牙而已。8月28日，张伯烈、刘成高等人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刘星楠提出“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虽交到了参议院，但都因许多议员有意缺席，致使参议院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议而作罢。至此，轰动一时的张振武案不了了之。

乖巧的黎元洪乘势假慈悲，竭力为张振武料理后事，想挽回声誉。他给张子2千元作为晋京路费，并特别派专员迎接口鄂。28日黎亲至抱冰堂致祭，并送挽联：

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

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义，此心不负故人。

挽联乃老名士周从煊代笔，据说为黎饬过不少。黎饬军务司给遗属恤金2000元，至其子自立。张家拟不受，张弟振亚怕因此破黎的脸，乃为接受。张振武案的政治风波，说到底，乃是参议院与袁世凯间的较量。最大的赢家是袁世凯。他杀张打击了革命党的力量，而从表面上看，却是帮黎除了心腹之患，自有理由今后者感激自己；同时，他公布黎的密电，又无异：于在全国人民面前指证黎是杀人的主犯，从而

沉重地打击了黎的威望，迫使后者从此不能不进一步依附自己。所以捕杀张、方的当天夜里，陈宦即贺袁说：“此一举可张大总统之声威，降副总统之名望，人必谓张、方被戮，黎元洪杀之，非大总统杀之也。藉此可易湖北都督，武昌方面，革命文武人物，推戴副总统者，群相解体矣。”相反，最大的输家是立法机关参议院。它甚至无力依据约法弹劾违法的政府，威信愈加扫地。

孙中山转向实业救国

由上可知，自北京政府成立以来不到半年的时间，中国已是政潮迭起，南北人心摇动；但令时人惊讶的是，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前大总统孙中山，却常置身事外，视之淡然，以至于许多记者大惑不解，问道：“先生对于近日北京之政争，胡为一若不甚措意也？”此时孙中山总是这样回答：“此时余以别有所图，故不欲干预时事。”所谓“别有所图”，就是脱离政界，转向实业救国。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所以急流勇退，转向实业，原因有一、对同盟会深感失望。他在南京临时大总统任内，备受党内排挤之苦，已不相信靠同盟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时，已流露出对政治的厌倦和急于解脱的悲观情绪。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我已经承认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当时极为悲观，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

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暂行置身事外。”稍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虽力辞理事长不成，但于党务实“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足见失望之深。

二、对时局判断的失当。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的告别会上说，现在满清已退，中华民国告成，民族、民权两主义算是实现了，唯有民生主义还没有着手，所以今后吾人首要的任务便是经济建设。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中国内力日竭，外患日逼，在此种情况下，无论何人执政，于民国政治都不可能有的作为。“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因此他主张“尽让政权于袁氏”。显然，孙中山不仅未能看到共和命途多舛，而且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弄颠倒了。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孙中山自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起，到是年底，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风尘仆仆，往来于大江南北，先后在南京、上海、武昌、广州、北京、南昌、杭州、太原等地发表数十次演讲，苦口婆心地宣传他的“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的主张。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即已提出了民生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平均地权，意谓随着文明进步，土地必然增价，但这既非原主辛劳的结果，应通过核定地价，将因社会进步而增值的部分归国家所有，为国民共享。这时孙的民生主义构想较简略，主要内容就是平均地权，而平均地权的方案，仅提到核定地价，行单一税，至于地价如何核定，地如何征收，皆付阙如。此期则不同，其主张变得更加鲜明确定，在内容上也

有了重要发展。首先他提出“地价税法”和地契税法，使“平均地权”主张具体化和丰富了。他认为，新政府成立伊始，各地地主契约均须更换，平均地权正可于换契之时，轻而易举地付诸实行。具体做法，可由地主自报地价，国家在地契中批明，当国家需要时，随时照地契之价收买。若有人估高其价，然国家竟不买之，“年年预纳最高之税，则已负累不堪，必不敢；反之，故低其价，以求少税，却又担心国家从而买之，“自亦必不敢”，“所以有此两法互相表里，则不必定价而价自定矣”。这样平均地权便被演绎成了：自报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土地国有）的简明模式。同时，收印契税，即换新契时，收一次性地税。孙中山估计，仅此一项，全国每年可得40亿，“即为救贫之第一策”。他甚至认为“民生问题须从税契入手”。把推行契税视作平均地权的第一步；其二，民生主义的内涵扩大了。辛亥前，孙中山只强调通过平均地权以打破大土地所有者对国计民生的垄断，此时他的见解深化了。他看到在平均地权后，“资本家必舍土地投机业，以从事工商，这一方面固然促进工商业的发达，但另一方面西方式的大资本家却又因之得以产生。仅有平均地权仍不足以消除少数人对国计民生的垄断。由是其民生主义合乎逻辑地向前延伸：由平均地权发展到了大企业经营的国有化。他说：“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这里已蕴含了他后来提出的节制资本的思想。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大企业经营的国有化思想是由平均地权的思想派生出来的，二者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构成了其民生主义的丰富内涵。民生主义的

此一发展反映了辛亥后孙中山视野的开阔和求索的精神。

孙中山论其民生主义的本质时说，“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事安乐幸福，则仆之素志也”。实业、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三位一体，互为因果，其内在的本质联系，是此期孙中山丰富多彩的民生主义思想得以演绎铺陈的基本线索。在他看来，中国救贫之策在于振兴实业，但实业的振兴，当循民生主义的思想指导，即“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要在避免垄断。这就决定了振兴实业的具体途径或民生主义实施的方案，当是由孙中山所设计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平均地权（地价税）与大企业国有化（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为振兴实业的基础，这不仅在于它保证了国家的大宗财政收入，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禁绝了土地投机，从心理上和物质上为工商业的发达开辟广阔的前景。“地为生产之原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则易行，如国家欲修一铁路，人民不能抬价，则收买土地易”。“是为实行民生主义第一级”。但是，共和初成，实业肇兴，若不能坚持民生主义，必致贫富不均，不仅将有少数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之虞，而且也不利于工商业自身的发展。要言之，振兴实业要在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的规范下，沿着平均地权与大企业国有的轨迹前进，始能臻于圆满。但为避免误解，孙中山在宣传上述理论的过程中，不忘一再说明，平均地权并非要劫富济贫，剥夺地主；民生主义也不是要排挤资本家，一切都只能在公平、非暴力的前提下进行。

不过孙中山又强调铁道是实业之母，以为“欲振兴实业，

必自修铁道人手”。“今日修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故其实业救国论，说到底又成了铁道救国论、他计划10年内修南中北三大铁路干线：一起南海，由广东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进西藏，直达天山之南；一起扬子江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迄于伊犁；一起秦皇岛，绕辽东，经蒙古，达于乌梁海。拟筹外资60亿元修筑，40年后一律收归国有。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理论和实业救国主张，表现了他强国富民的博大胸怀和勇于探索的可贵精神。他为此奔走呼号，对于推动当时中国社会创办实业热潮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无可讳言，其空想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单一的地价税即便是在其发明者亨利·乔治的故乡，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美国也从来未实行过。在落后的中国，各种经济成份十分复杂，如何能以单一的地价税取代其他税项？同样道理，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统一地契税又如何能施行？当时有记者向孙中山提出了这一问题。实际上后来孙本人也放弃了单一税和地契税的主张。至于他的庞大的铁路计划，不仅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而且寄希望于外国资本家慷慨解囊，也未免失之天真。

当然孙中山的更大空想还在于对时局的盲目乐观：“民国招牌已挂起，此后无足虑者”。事实相反，袁世凯正加紧破坏共和制度，使民国变得徒具空名，待到他凶相毕露，孙中山在国内尚且无立足之地，其民生主义和实业救国的种种崇论宏议，自然只能束之高阁了。

“民国政党，唯我独大”

与孙中山对党务持消极的态度相反，宋教仁力辞农商部长，“专心办党”。他一直渴望将同盟会进一步改组成“强大真正之政党”，以便在参议院占据多数，进而组织政党内阁。在陆征祥内阁的风波中，统一共和党因不满于共和党媚袁专用，谋与同盟会联合。宋教仁等人以为机不可失，于是把改组同盟会以便联合友党的问题，急切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1912年7月16日，同盟会召集全体职员会讨论改组问题。但多数人表示反对，白逾桓、田桐等尤激烈，“痛陈同盟会系数十年流血所成，今日当以生命拥护此名与民国同休，奈何提及改组！”21日，复开夏季大会，再行讨论改组问题。多数会员仍不同意，蔡元培也以为“不能舍己从人，决不能变更名称”。不过多数会员只是反对变更同盟会名称，并不反对改组本身。所以在这次会上，倡导改组的宋教仁仍被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在他的主持下，改组工作继续进行。

7月26日，袁世凯调动军警强迫参议院通过陆征祥第二次组阁名单后，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一样受到了共和党和军警的攻击，会员激愤异常，遂最终决定与同盟会合并，以便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同共和党相抗衡。同盟会争取统一共和党的时机成熟了。

不过，统一共和党提出了两党合并的三个条件：

一、变更同盟会名称；

- 二、废去民生主义；
- 三、改良内部组织。

8月5日上海国民公党得知两党合并的消息，也派代表到京表示愿意参加，除同意统一共和党的三项条件外，还提出取消“男女平权”的要求。7日。三党代表13人举行谈判，集中讨论由同盟会本部干事张耀曾事先拟定的关于党名、党纲、组织的草案。终定党纲五条：

- 一、保持政治统一；
- 二、发展地方自治；
- 三、励行种族同化；
- 四、采用民生政策；
- 五、维持国际和平。

会议推宋教仁、张耀曾和公民党代表杨南生起草宣言。同日，在北京的国民共进会与共和实进会也派代表到会，同意一起加入。13日，以五党的名义公布了《国民党宣言》。

25日，国民党在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约2000人，其中女会员50余人。会上就新政纲删去男女平等一项，发生激烈争论，最后表决。结果举手者占少数，主张将男女平权列入政纲的意见被否决。至此，会场才慢慢安静下来。孙中山于是登台作长篇演讲，主旨仍在宣传他的三民主义理论。大会最终选举孙中山、黄兴、王人文、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并推孙中山为理事长。

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其党纲把同盟会的“实行民生主义”改为含混的“采用民生政策”；把“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空洞的“保持国际和平”；又

不顾女同盟会员的强烈反对，删除了“男女平权”的条文。从党纲上看，这确实反映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其革命的锋芒确有所钝化，带上了温和的色彩。但不能因此便断言，国民党已丧失了革命的精神。在其时，一个政党的党纲上规定的字面上的东西，与实际的主张往往有差距。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其革命的宗旨并未改变。政纲上的措词的钝化，在很大程度上。应看成是适应时局变化的策略行为。

实际上作为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宋教仁，已将此一策略思想作了明确的表述：“……民国虽然成立，而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还是整个存在。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就非继续奋斗不可。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主方面的。……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就是说，党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的精神没有变，但因民国的建立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党的组织形式和斗争策略也不能不随之发生改变，即由原先秘密的革命党，凭铁血精神从事武装斗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政党，藉卓越的政治见解，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宋教仁从现代政治学说的角度，阐述革命斗争策略转变的必然性，表现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同时，国民党成立后，无论是宋教仁还是黄兴诸人，都没有减弱对民生主义宣传的热情，这本身也说明同盟会改

组成国民党后，其政纲表述的钝化，并不就意味着它改变了革命的初衷。

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始终是赞成的。但其时他正热衷于实业，不想过问政治，故曾力辞理事长，后虽勉从，于具体党务仍不过问。

国民党成立后，为扩大势力，片面追求党员数量，吸收党员颇滥。谭人凤说：“青年之士子，跋扈之武人，市侩之商販，皆搀杂于其中，对于大官阔老，则不问其是否同情，预写文凭，强之加入。”作为同盟会元老，他拒绝加入国民党，“且以狐群狗党目之”。何遂也说：“简直是拿着本子乱填，谁要进党都可以登记，大批因势趋利的投机分子都混了进去。”因之，国民党内部成份复杂，思想参差，较同盟会更加严重。不仅如此，它一开始就面临着内部权力分配的激烈争夺。成立不久，共和实进会便因本政团无人当过参议，愤而退出国民党，另组群进党。统一共和党等其他政团，也极力反对以同盟会为中心，动辄以退出相要挟。这种情况决定了国民党始终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因而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强大政党。

但是，国民党的成立毕竟壮大了革命党人的声势。宋教仁在《同盟会本部总务部为建国民党通告海外》中兴奋地写道：“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谁争乎？”同时，国民党在《宣言》中也意气自豪，声言要成为“政治之中心势力”，进而组织政党内阁。由是，参议院中的政治格局固然为之一变，但更主要的是，专制自雄的袁世凯北洋集团愈益感到了威胁，其与革命党人间的正面冲突迅

速临近了。

同时，国民党成立也大大提高了宋教仁的政治声望。记者黄远生评论说：“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逐初一人主持，……（宋）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平心而论，宋君此次主持国民党改党组之功，于中华民国历史的必有不可磨灭者耳”。但也因是之故，宋教仁也成了袁世凯的眼中钉。

孙、黄联袂北上

袁世凯是个极具已计之人。他一方面不断破坏共和制度，同时却又极力笼络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与黄兴，一再派专使专车南下迎接二人北上，说是共商国事。其目的是要借重他们的崇高威望，掩人耳目，并软化革命派势力的抨击。孙、黄从调和南北，维护共和的大局出发，于8月初也决定应邀北上。

孙、黄定于8月18日午后启程。时正值张振武案沸反盈天，人多以北方形势难测劝勿往，至少黄兴应暂时留下。孙同意让黄留下，午后孙登上了安平轮船，前往欢送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有人仍苦劝孙勿往，但孙态度坚决，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这时有一女士请孙入船舱，对他说：“公国民代表，共和坚城，必欲投身虎穴，某誓死反对。”说罢便要自尽，孙急忙劝止，劝导再三，该女士始快快登岸。

袁为接待孙中山，煞费苦心。他先期派赵秉钧、江朝宗等赴天津迎接；又派梁士诒、陈宦等为招待员，负责在北京

车站恭候。同时，把石大人胡同原总统府腾出来，加以修缮，让给孙住，自己却搬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去办公。

8月24日孙中山一行经天津抵北京。袁令开正阳门，以国家元首的规格隆重迎接孙中山。谭人凤曾记其盛况：“先是为欢迎之准备也，上自总统，下至庶民，莫不郑重其事，一切布置整整齐齐。结彩悬灯，铺张扬厉，诚空前绝后之盛况也。孙到时，市民塞巷填街，观者如堵。政学绅商军诸界，排班列队，鼓舞欢腾，实极一时之盛。”是晚，袁在总统府设宴为孙洗尘。他亲至门口迎接。席间并致词说：“世凯识薄能浅，深望先生有以教我，以固邦基。世凯忝受国民委托，用敢代表四万万同胞，求赐宏论，以愿不违。”态度极为谦恭。是晚孙本只打算作短时间的拜会，不意与袁晤谈之后，发现彼此情投意合，顿生相见恨晚、大慰平生之慨。于是留在府中继续与袁纵论时事，夜阑更深，意犹未尽。

28日，袁举行盛大欢迎宴会。他在欢迎词中对孙推崇备至：“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后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诚为民国第一首功。”“此次来京，实为南北统一之一绝大关键，亦即国民前途安危之所系。”袁且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在答词中也称赞袁“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高呼“袁大总统万岁！”

其后，二人转秘密会谈。孙中山在京不到一个月，但与袁晤谈竟达门次之多。每一次会谈，仅梁士诒一人作陪，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三四次谈至二时以后。在会谈中，袁对孙百般奉迎，几所主张，无不赞成。这里有两个生动事例，可见一斑：

其一，据《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记载，一天深夜，梁士诒在结束会谈后送孙回住所，孙问梁说：“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至今尚疑，君为释之。”梁问何事，孙说：“中国以农业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改革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田不可。我谈及此项政见时，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但不反对，且肯定认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能解也。”梁回答说：“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者之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田者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也。”孙听后，大笑不已。

其二，据记者黄远生报道，在会谈中，袁与孙争当实业家，而欲弃总统职务如弊履：“孙君谓自此后当从事于社会事业，且从事于此，当较袁君更为适当。语意中实表明其不愿为第二次总统之意。袁君言下提出抗议，谓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从前在北洋即立意专派实业学生，至于政法学生实在因为不得已而后派去，以自表其慎重实业之证。孙君又力驳之，谓我做此等事，必较君更能取便社会云云。盖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而乃相竞争为实业家，可为吾中国实业前途庆矣。”

袁世凯算是把虚情假意做足了。实际上，他在背地里则将孙中山贬得一钱不值。他曾对其亲信说，“有人说他是个英雄，在我看来，简直儿没有道理。休说于政治军事上，无丝毫经验，连世务人情，还不大懂呢！”但遗憾的是，孙中山显然被袁的虚情假意迷惑住了，丧失了应有的警觉。所以他于

8月29日致电黄兴说袁“绝无可疑之余地”，催其从速北上。9月6日黄偕陈其美、李书城等10余人离沪北上，11日抵京。黄同样受到了盛情款待。袁赞扬黄“光明磊落，一片至诚”。而黄也表示，初次晤谈，即感“情意欣洽”，不虚此行；

孙、黄尽入袁之彀中，二人对会谈十分满意，其盲目乐观的言行，对时局产生了严重误导的消极作用。孙于9月18日离京到全国各地视察演讲去了，黄则晚到10月3日才离京南返。综观二人在京及南返后的言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袁世凯作辩护。孙说，袁为人“很有肩膀”，“思想亦很新”。而且富于政治经验，由他任总统，“可为中国得大庆”。当然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来就不应当全采新法的。有人因此怀疑袁有帝王之思，那完全是一种误解。孙强调，应停止对政府及袁氏的攻击，不然，不仅冤枉了好人，令其一事不能办，而且还会“致激袁总统为恶”。黄兴干脆认为，袁“忠心谋国”，却尽受攻击，这正是国事日危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二，无原则地鼓吹南北调和。孙、黄一再声明北上的目的在于“调和南北感情”。他们无视唐绍仪内阁以来，袁一再破坏约法，造成时局动荡的事实，竟谓此次到京，所见各界现象，十分满意。发现北方“其想望共和之热度”，绝不逊于南方。他指出，人们对袁的无意识攻击，已使袁陷于“可悲之境遇”。他告诫同盟会员，“不应顽固守旧，仍持攻击态度”。同时，孙、黄都认为，经其北上与袁晤谈，“从此南北绝无界限，国内问题今日即为圆满解决。”如此党人再坚持

“攻击态度”，自然是愈加不可取了。

其三，促成虚假的国民党内阁。孙、黄北上期间，正值陆征祥辞职，改由赵秉钧代理总理。袁为敷衍黄兴，示意拟任沈秉堃为下届总理。沈虽是国民党员，但与国民党关系甚浅，且只易总理，仍维持混合内阁也不符合国民党政党的要求。故此项提议遭到一厂宋教仁等人的反对。由是黄兴便决定干脆满足袁的欲望，径直向袁提议由其亲信赵秉钧为总理，并代为在参议院疏通，使其获通过。赵内阁既成立，黄又乘势遍说各国务员加入国民党。黄欣欣然宣布，国民党内阁已告成立。10月6日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上也兴奋地宣告说：“余出京时，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始起。今阅报，国务员已入本党。是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但人多非笑之，以为“非驴非马”，此种内阁与其称政党内阁，不如叫“内阁政党”更切当些。虚假的国民党内阁冲昏了孙、黄的大脑，他们竟由此引出袁世凯已与国民党打成一片，全党当无条件拥护袁的政略：“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成政府及袁总统。袁总统既赞成吾党党纲及主义，则吾党意当出全力赞助他，建设前途，于此望之矣。”

其四，承诺拥护袁为第二期总统、孙在京时反复强调自己决心退出政坛，从事铁路建设，并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他与袁约定，袁为总统10年，练兵百万，自己在野10年，修铁路20万公里。这正中袁的下怀，他欣然特授孙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乐得让他随意空谈去。在国会选举临近之时，孙的此种政治承诺只能加强袁的地位而束缚了国民

党自己的手脚，这是显而易见的。

袁邀孙、黄北上的目的，是要造成举国统一、团结的假象，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这个目的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达到了。袁在会谈结束后，盗用孙、黄的名义，公布了所谓“八大政纲”，强调“中央集权”与“统一”。孙、黄对此没有表示异议，实际上是默认了。这个“八大政纲”与上述孙、黄的言行互相发明，使举国“统一”、“团结”的假象更加突显了。

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对孙、黄北上的言行，持批评态度。如《民权报》就指出，袁劣迹昭彰，孙所谓“勿逼袁氏为恶”，是认错了对象。但稳健派却大受鼓舞，于右任在《民立报》著文说：“中山之言曰：‘袁氏可以为善，勿逼他为恶。’至哉，此言！我实佩之。”“中山入京，竟以十年总统相许，其弄袁氏？抑重袁氏乎？此其中大费研究。我敢断言：中山非确有所见，不敢如此冒昧。”孙、黄误导在党内鼓励了妥协情绪，是很明显的。

孙黄北上前，袁因唐内阁风波，尤其是张振武案，正不断受到舆论的抨击，处境困窘，但经与孙黄会谈后政治地位增强了。1912年1月，上海《国民评论》月报报道说：“黄兴到京后，继续致力于消除党派间的猜疑和纷争，其结果无疑是加强了政府的力量。在孙文博士和黄兴将要到京以前，这些猜忌和纷争已危及民国的生存。”

然而，孙黄与袁的会谈毕竟只是造成一时虚假的南北团结，它掩盖而非解决了南北存在的实际矛盾，助长而非消弭了袁的专制野心。因之，民国的危机不是消除了，而是愈加发展了。

复辟与反复辟

袁氏帝王思想的多元因素

袁世凯的帝王之思由来已久，其肇端可以追溯到 1912 年，即辛亥革命感发之际。时清廷风雨飘摇，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重新起用被自己逐回河南彰德老家“养痾”的袁世凯，袁虽稳居洹上，但其耳目遍布京津地区，家中电报房昼夜忙碌，于国内政局了若指掌。武昌起义后他有三种选择：一，病卧不起；二，出平民党，做清朝的中兴名臣；三，因乘利便，夺清室之鼎、进退之间，煞费苦心。有材料记载说，时袁曾一度茶饭无思，焦灼不安：

项城昼夜环走室中，状类发狂，每阅一电，时而喜，时而怒，时而忧。虽家人莫测其意也。及决定出山而后，犹复分心腹密探南方人心向背，以定依违也。……又言项城当踳踏时，家人甚忧之。辄时进食饮，并慰令休息。项城辄大恶，往往掀杯盘于地，曰：汝等妇女，去知天下大事！其勿与戏言！然数日不食，其元配于夫人忧之，谓为鬼祟，将令道士为拔除之计，袁大公子知项城心事，谓非关鬼事，与母力争

而罢。

袁在迫使清廷委以军政全权后，决意出山。同时，也已成竹在胸，有了取清廷而代之的野心，帝王之思也随之渐萌。所以毫不奇怪，袁甫视师，左右即有劝进者。例如，袁的心腹张一自己就说，“当大总统视师萧家港时，一麋曾驰电动进，是时天下大乱，民无所归”。

此外，1912年初蔡元培等北上迎袁到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袁克定等曾召各镇中下级军官开秘密会议，议定乘兵变入东华门，恭请帝位，效黄袍加身故事。这时冯国璋统率禁卫军，他不曾与谋，且心怀清室，所以禁卫军极力抵御。兵既不能入，遂火焚东华门，继掠东西二城而去。

后来徐世昌在分析袁何以在武昌起义后没有马上接受劝进时，曾指出了以下的原因：

（一）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为后世所诟病；

（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俊、赵尔巽、李经羲等，均具相当势力；

（三）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

（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也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

（五）南方人心向背尚未可知。

徐世昌认为，惟其如此，袁最初表面上维持清室，继而始讨论民主君主，终而清室退位而自为大总统。不得不作迂

回之计，其见解不无道理。

赣宁之役后，袁以武力“统一”了南北，洋洋得意，曾公开表示：“我这个总统是时势造成的，想推辞也推不了；有哪位少年气盛想取代我，他尽可以来取好了！”他以为天下莫予毒，在当选正式大总统后，便踢开国会，毁弃约法，祀孔祭天，并进而欲公开推进帝制，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袁帝王思想的成因，至少可以指出市面几个方面：

其一，袁代迷信“应天承运”。从背叛吴长庆投靠李鸿章，到出卖维新派、光绪帝，投靠荣禄、西太后，袁野心勃勃，不择手段，久植根性；但在晚清的条件下；他终究只能企望成为权臣，而未敢有帝王之思。辛亥革命既起，时移势异。袁大权在握，中外目为“第一强人”，以为欲救中国“非袁莫属”，在此种情势下，其政治野心自然迅速膨胀；但它终至浸成帝王之想，袁氏迷信“应天承运”，是其重要的内驱力。

袁十分迷信，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替他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袁复出后，不止一次请过堪舆家看祖坟的风水。堪舆家说其地一边是龙，一边是风，龙凤相配，袁家合出一代帝主。这些自然都是奉承他的一派胡诌，但袁却喜不自胜，给堪舆家以重赏。一次，他问堪舆家郭某说：“龙兴之运，年数几何？”郭对门：“八二之数”。袁又问“八二之数，八百二十二年乎？八十二年乎？”郭说“天机不可泄露”。袁自语道：“即八十二年，已绵延三世，予愿足矣。

袁败亡后，有朋友问郭，究竟何谓“八二之数”？郭回答

说，当时袁紧追着问，我一时说不上来，忽然想起有八卦、阴阳二气之说。便信口开河、胡乱答以“八二之数”，其实并无什么根据。堪舆家的无根之谈，袁竟深信不疑，足见其思想之迷信。

袁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说：“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堪舆家）这些话，无疑地也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迷信天命，使袁丧失理智，沉湎于帝王梦，无以自拔。

其二，社会存在复辟帝制的土壤。

辛亥革命虽倾覆了清廷，但因缺少广大农村的变动，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赖以植根的封建自然经济依然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共和国虽告成立，而封建的官僚体制并未真正解体；在思想文化领域，自由平等的新观念虽日益传播，但国人所因袭的千年封建纲常名教的思想重负，一时也难尽释。此种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尚广泛存在着的封建“冻土”。是帝制思想赖以复活的社会土壤。这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便是一些人固执地认定共和不适于中国，而依恋于帝制的复活。

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物——茂源酒店的老板赵七爷，革命后将辫子盘在顶上，常常叹息道：“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了这地步了”。他时刻盼望“皇帝坐龙廷”。这虽说是小说中的人物，却也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其时许多士绅坐待复辟的心理。

丁文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科学家，1912年初他新从欧洲

归来。他发现军队中有不少人乐于袁世凯当皇帝。是年5月他给外国友人写信说：“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可能会发现军队（北方的或南方的）对于大总统——这个官衔也许会改变为另一种称呼——过于热诚，这是无足为奇的。至少我听到一位高级军官表示他的信念说。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国家统一起来。我们必须使他当上皇帝！”这不仅说明部分军官拥袁，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取向：只有恢复帝制才能统一中国。

上述还只是反映了某些人的心理与愿望，另有一些人则已在公然上书，要求袁恢复帝制了。例如，1913年4月，湖南人章忠翊上劝正皇帝位表，自称曰“臣”，提出了不可不正位的所谓6大理由。湖北商民裘平治也上书总统，谓：“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如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

袁的帝王之思既是其迷信天命的结果；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也应当看作是他的一种政治选择。

袁虽信誓旦旦，表示忠于共和，但其内心从未相信过共和，而始终认定中国只可行帝制。1912年底，清廷危在旦夕，英国《晤士报》记者莫礼逊曾劝袁顺应潮流，归向共和，袁不以为然，他说：“余深信中国情形，在退隐三年之中，尤为注意。余深信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若今次革命推翻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中国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间，中国将无太平之日矣！”看重清室是假话，强调中国只适于帝制，才是其真意。所以，

尽管袁后来成了民国大总统，但 1915 年他与英公使朱尔典推心置腹密谈时，又一次吐了真言：“当日提创共和者，本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脑中；其或百中有一。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君主，因未尝梦想到也。”即是说，中国人民只懂只认君主专制。

归根到底，意的帝王之思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他所处的新旧更替“乍暖还寒”特定时代的产物。

其三，左右和家庭的影响。

袁的左右多是些思想顽固而又野心勃勃的北洋武夫或善于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他们为个人利禄计，百般逢迎劝进，使袁愈加沉湎在帝王梦中，无法正视现实。袁的家庭影响也是重要的。他妻妾成群。无一不向往帝王家的荣华富贵，自然都积极催促袁帝制自为，以便有朝一日也可以过过皇后、皇妃的瘾。一日，有人上书主复辟清室，袁反复审阅数遍，未置可否，纳入衣袋中。夜归家便拿出来给长子克定看。定曰：“父亲如何批饬？”袁说，“好笑，溥仪小孩子，他如何能做人君？果然还叫他干，那辛亥年，我可不自操心了！”有宠妾接过话，道：“这些人不凑趣，自然上书劝总统做皇帝才是道理。”袁笑了笑，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我还想做甚么皇帝，你瞧我现在所办的事，哪桩与皇帝有别？”没想到在旁边的于夫人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自家是荣耀得很，且将五年任满退位后想一想！”此话击中了袁的心病，他默然不答。袁显然无形中感受到了一种压力：为子孙后代计，他也有责任变

总统为皇帝。袁长子克定同样有野心。袁若称帝，他便是“太子”、“嗣皇帝”，所以于帝制也最热心、以至无所不用其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袁是其子克定和左右的工具。

其四，列强的怂恿。

自晚清以来，当政者十分明晰：不能获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万事尽成虚言。本是靠列强栽培起家的袁世凯，自然更懂得这个道理。他所以敢作帝王之思，列强的怂恿和支持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列强为控制袁进而扩展其在华的权益，竞相怂恿和支持袁推行帝制，在这方面，德国捷足先登。早在1912年，德皇威廉二世即密派要人来华谒袁，呈递亲笔信，表示当全力助袁称帝，请派要员回聘，以助定大计，不久，袁果然派克定携亲笔画往德、谒德皇二世。德皇赐宴便殿，与定多次密谈，力主中国非帝制不能强国。他说：“方今民国初改肇，执政皆帝制时代旧人；革命分子势力甚脆弱。挟大总统之威权，一变中华民国为帝国皇帝，亦英日俄各国所愿，我德誓以全力赞助其经营，财政器械，由德为无条件之供给，中国当信乎能履行诺言。”

德皇且有至袁亲笔函托定携归。袁大受鼓舞。

时欧战起，德国迅速占领罗马尼亚及巴尔干诸国。威震世界，袁益振奋，一切仿效德制。军队操练、改用德御林军步伐；选将一律用留德陆军学生；选制服也以德国款式是尚，袁诸子皆着德国亲王陆军制服，照相颁行，以为倡导。同时，选荫昌为诸子德语教师。每日呈进居仁日览，也让译德皇威廉传。甚至小到蓄须，文武官员也都投袁所好，蓄威廉二世

八字牛角须。

英国公使朱尔典是袁的老朋友、他探知德国赞助帝制，也向袁极力表示英同样能鼎力相助。无须舍近求远时美日结盟，德国在远东陷于孤立，袁终转而与英谋，英使曾与袁作长谈，他对袁说，辛亥时中国选择共和实是一种“失策”，现在只要中国不出内乱，帝制“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得干涉”。

德英争夺，日本则愤甚，乃提出二十一条，想独揽东亚外交。其后英日为夺得中国帝制操纵权，各施纵横捭阖之术，这在下文还将谈到。即便是共和制的美国，当时对袁的帝制也持赞同的态度。袁的心腹唐在礼是参加筹备帝制的重要人物，他说：“就我所知，当时外国使节没有一个对袁称帝表示不赞成的。确实难怪当时袁世凯认为世界列强都在支持他这件事”。

袁既相信天命攸归，列强首肯，便热昏了头脑，在左右的簇拥下，开始迫不及待地将帝制活动推到了前台。

辛亥后两股复辟势力的交错

辛亥后存在着两股复辟势方，一是袁世凯北洋集团复辟势力，一是清朝复辟势力。

时清王朝虽然已被推翻，但根据所谓优待清室条件，清废帝仍占居内廷和保持着皇帝的尊号。他治下的内宫，俨然是一个与民国分庭抗礼的小朝廷。它未曾“改朔易色”，仍用

宣统年号不用民国年号；仍用农历而不用阳历。宣统“君臣”依旧辫发翎顶，保持前清威仪。不仅如此。这个小朝廷甚至仍在发布“上谕”，对民国在职人员赐寿赐职，死后赐谥赐恤，宣付史馆立传。所以，在遗老的心目中、清朝并未死，它只是一时被“缩小”了而已。他们处心积虑企图复辟清朝天下。由满清皇族少壮派组成的宗社党和于式枚、刘廷琛、劳乃宣等封建遗老及康有为诸人，是清朝复辟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这两股复辟势力中，前者的目的在拥袁帝制自为，后者则在实现宣统复辟。其根本的政治利益是对立的，但它们都仇视共和。主张帝制，又存在着某种共同点、因此彼此的复辟活动也就存在着交叉。袁对清朝复辟势力所耍弄的两面手法，就很明显地反映出这两股复辟势力既对立又交错的情形。

当时，代表清朝复辟势力的活跃分子主要散居在青岛、徐州、上海、南昌、武汉、广州等地，其中青岛和上海是他们的聚散地。清朝复辟势力内部大致又分成两派。一是以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为首的少数宗社党人。他们在当年便是坚决反对清室退位的，现在更试图借助日俄等国势力，挺而走险，主张以武力推倒袁氏，复辟大清；二是为数颇多的前清遗老，他们以诗酒唱和，上书言事等方式，鼓吹复辟，对宗社党诉诸武力，颇抱疑议。所以，劳乃宣说：“宗社党之遭时忌，以其将以兵方从事也，若但以笔舌争之，虽乃心宗社庸何伤？”

这些情况袁都看在眼里，他对上述两派人采取分别对待

的政策。袁对宗社党一派严加防范，力予打击。他致函溥伟，令他立即放下武器，解散党徒，并警告说，如若不然，当予逮捕处死，且停拨清室优待费。溥伟回答也很强硬：“君喜好杀良己的百姓，非余所敢过问。余又非皇帝，停止优待费违法和废弃誓言，与余何干？”但在袁的高压政策下，宗社党在京津地区无隙可乘。

张勋虽非宗社党人，但手握重兵，民国成立后驻兖州，他和他的部队都留着发辫，以示不忘故主，人称“辫帅”和“辫子军”。清朝复辟势力视之若拱壁。袁对张很不放心，1912年6月派为张所敬重的徐世昌等专程到兖州去说服他，张对徐表示：“袁分之知不能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本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并让徐转告袁：“袁公在，唯袁公之命是从”。但这并不能消除袁对他的戒备。二次革命起，袁便利用张仇视革命党人的心理，令他率部攻南京，欲使党人与张两败俱伤。张一介武夫，果然一味死战，伤亡惨重。张攻入南京后，纵兵劫掠，激起公愤，尤其祸延洋人，招致列强查究。舆论强烈要求惩处张勋，张陷入了窘境。这正中袁的下怀，他发表冯国璋为江苏督军，坐镇东南，而改令张为长江巡阅使，退回江北。张发觉自己被当枪使了，大呼上当。

袁对另一派人要温和的多。这不是因为偏爱，而是出于对实际利害关系的权衡。因为这派人不仅是封建遗老半属朽木，无拳无勇，不易为患；更主要是他们极为诋毁共和寻乱天下，力倡唯有复辟帝制才是中国的出路；正足以消弭民主思潮。因之，在很大程度可以说，这些人的复辟谬说，是袁乐于利用的一种助力，或云客观上为袁复辟张本。黄毅在

1916年出版的《袁氏盗国记》中评论说，“袁对清室遗老复辟案的处理轻描淡写，是欲藉此以见共和之不宜，而留自帝之余地”。不可谓不尖锐。这正反映了两种复辟势力的交错。

惟其如此，袁极力缓和与封建遗老的关系。他主要采取两种策略：

其一，竭力作出尊崇清室的姿态，以满足遗老们的复辟心理。1913年3月5日隆裕太后寿日，袁派秘书梁士诒前往致贺，国书上赫然写着：“中华民国大总统致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7日后隆裕去世，袁的举动更加动人：他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27天，还派全体国务员前往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所谓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员吴景濂主祭；军界也举行全国陆军哀悼大会，由袁心腹大将段祺瑞主持。其后，炮制《中华民国约法》，袁又坚持将优待清室条件写入宪法。不仅如此，袁甚至有意向遗老们表白，自己“饮水思源”，忍辱负重，也正等待时机还政于清。他对赵尔男说：“（袁）实无意思负大清之意，年来涉足浊流，甘习不韪，皆所以调护皇室，若非如此曲全，皇室早不可间。今日处艰苦异常，何足贪恋？而苦于无可交付，不得不忍辱负重以待时机。”而袁的奸诈虚伪，实无过于向遗老们拍胸脯自称宗社党人了：“人称今有宗社党，我实宗社党之巨擘也”。

其二，以金钱和官职收买。这本是袁的长项。袁深知许多遗老只是表面清高，实则内心仍寄情于利禄。庆亲王奕沂，前清大学士、资政院总裁、时为清室内务府大臣的世续，以及荫昌、溥伦、铁良等许多人，都接受过袁的大量馈赠。同

时，袁还极力表示“优容前清耆旧”，亲自打电报邀请各地遗老到京作官。凡是应邀来的，他无不接见，待若上宾。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命为参政、清史馆馆长，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任命为参政、国史馆馆长，前清学部副大臣刘廷琛则被任命为政事堂礼制馆顾问，如此等等。

袁的上述策略果然奏效。遗老们原都异口同声诅咒袁是王莽、曹操之属，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现在他们中间有了新的议论：“袁世凯究竟是不是曹操？”“项城当年和徐、冯、段说过，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徐、冯、段才答应办共和，也许这就是智取。”

由于自信袁正采取步骤还政于清，遗老们兴奋不已，胆子也放大了。1913年冬，光绪和隆裕“奉安”，在梁格庄的灵棚里演出的一幕活剧，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时赵秉钧率一批国务员前来，致祭前，赵先脱下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了三跪九叩礼。遗老梁鼎芬看在眼里，大为兴奋。他一回头，突然在那些没穿清朝褂袍来的国务员中，认出了前清山东巡抚，现为外交总长的孙宝琦。他直奔到孙的面前，指着他的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孙被这位老朋友问得怔住了，旁边的人也都莫名其妙。梁的手指头哆嗦着，数落孙，嗓门越来越响：“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孙诒经被视为同光时代名臣）！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们一唱一和，又招来了许多人，将孙等围在中间。孙面无人色，

低头连忙赔罪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遗老们热昏了头脑，进而上书袁公然要求复辟清朝。其中又以前清京师大学堂总监、学部副大臣劳乃宣为最活跃。

1912年冬，劳乃宣作《共和正解》等书，宣称“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所以“共和”的本意是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时人倡民主，纯属不学无术。并力育经三年的实验，民主寻乱中国已是彰明昭著。要救中国之危，舍复辟帝制和还政于清，是没有出路的。

劳曾托赵秉钧、徐世昌等人将所著书转呈袁世凯。袁的心思只在帝制自为，劳自作多情，可谓认错了对象。

袁看了劳的书后，只对徐世昌淡淡地说了一句：“把这位老先生请到北京来当个参议好了”。但这样一来就更加使人相信主张复辟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由是除劳之外，刘廷琛有《复礼制馆书》，宋育仁甚至联合国史馆的一批遗老，采取集体行动，发表演讲，上书请愿，公开要求还政于清。到1914年底，宣统复辟之说已是甚嚣尘上，加上风传宗社党人在日本浪人支持下正潜入北京，图谋举事，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恐。

这引起了正义舆论的不满。记者黄远生在《顽民之谬说》一文中，批评政府态度暧昧，对违法的复辟谬说反应不力。迫于舆论的压力，同时也是这帮遗老们太不识相，闹得过分了，袁决意稍加裁抑，泼泼冷水。

1914年11月间，肃政史夏寿康呈文要求“严行查禁复辟谬说”。袁批令交内务府办理。其时袁的党徒多数并不清楚他欲帝制自为的真意，所以奉命而行，内务部通飭各省及京

师警察厅迅速查办。步军统领江朝宗且拘捕了国史馆协修家育仁，杀一儆百。随后参议院孙筠筠等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对倡清朝复辟者，“照刑事内乱罪，从严惩治”。11月23日袁又下了一道命令，“申禁复辟耶说”。由是各省将军巡按使也纷纷通电，一致声讨复辟派。至此，风向陡变。尤其是传言宋育仁已被枪毙，军队正在调动，吓得遗老们赶紧偃旗息鼓，噤若寒蝉。

其实，袁对复辟谬说并无意认真查究，宋育仁在步军统领衙门也颇受礼遇。11月30日，步军统领江朝宗派专人护送宋上车，宋的故旧纷纷前来送行，还有不少人请来写屏联留作纪念。场面隆重热烈，绝不像“递解回籍”，倒像是“衣锦还乡”了。

湖北将军段芝贵接到徐世昌的密电，叫他对宋要特别优待。所以12月3日宋乘火车抵汉口时，段派员备四人大轿到车站迎接，又用专轮将他接到武昌，安顿在清乡公所特辟的精室，待若上宾。段借口视察清乡情况，到清乡公所与宋见面。宋在武昌等候他的眷属，共住了8天。回到四川后，袁便正式撤销了将宋“交地方官察看”的处分。

所以，遗老们虽遭冲击，却疑惑不解：袁既讲“严禁复辟谣言”，又说“既往不咎”；宋育仁虽被递解回籍，却一路风光，叫人弄不清宋到底是受罚还是受奖。只有到了1915年袁的洋顾问古德诺和御用工具“筹安会”相继登台，这帮昏聩的遗老才恍然大悟。

“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一步”

严格说来，袁世凯是在得到日本政府的明确支持后，才放手推进帝制活动的。为此，他不惜丧权辱国。

欧战的爆发，使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陷于欧洲战场而无力东顾。这在日本看来正是自己独霸中国千载难逢的良机。1914年11月7日，日本攻占青岛，德国青岛总督有关承认袁氏称帝的秘密文件落入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的决心，更视为奇货可居。就在这时，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召回国。他在接受内阁训示后，上书外相加藤说：“帝国政府近日攻陷青岛，我方军事行动初告结束。帝国威力，重展海外。同时，欧洲战局尚酣，无暇顾及远东。今正值对中国提出要求之良机。我外务大臣闹下特召回本使，密示由阁会议决定之条件，并征询本使意见，命返职后着手谈判，……自当勉策驽馭，以遂大任。”这里所谓要向中国提出的“要求”，就是日本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2月底，日置益返北京任所，借口回任，请求面谒袁世凯。1月18日，他向袁当面提出了“二十一条”，并谓：“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露骨地暗示，只要接受“二十一条”，便可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当然，日置益也没有忘记对童施加压力，他说，中国国民党人与日有力人物关系密切，除非中国政府能有行动证明对日友好，“日本政府且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袁默然不语，末了，

说：“请贵公使与我外交部商谈”。

一个外交官不通过外交部而径直向驻在国的总统当面提出要求，这是违反惯例和十分失礼的行为。日使的所为既反映了日本独霸中国的迫不及待的心情，也反映了其蛮横的态度。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共分五号。第一号 4 条，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权；第二号 7 条，关于日本在南满蒙古的特权；第三号 2 条，关于日本在汉冶萍公司的特权；第四号 1 条，关于中国全国领土；第五号 7 条，关于中日合办事宜。这些条件包括开矿、修路、设厂、中日人民杂居、聘用日本顾问及技师等。根据这些条件，日本不仅可以吞并满蒙，而且可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警察进行有力的控制。这些条件若能实现，中国只能沦为日本独霸的殖民地。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用心如此险恶，态度如此蛮横，但因其利用了支持帝制作为诱饵，却令袁怦然心动。他很快就作出了与日谈判的决定。在日置益离去的 18 日当晚，袁就立即召集外交总长、总统府秘书长等政府枢要人物商量对策，并制定了初步应对的方案。袁只对第五号表示异议，认为其他四号各条，可以逐条讨论，然后决定取舍。

2 月 2 日下午 3 时，中日两国代表在外交部迎宾馆开始进行秘密谈判。从 2 月 2 日到 5 月 1 日，双方共会谈 124 次。在此期间，日本竭尽外交讹诈和武力恫吓之能事，千方百计欲迫使袁政府迅速就范。

是时报刊披露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英美虽表示震惊，但因无力东顾，只好对日有所容忍。它们只对第五号表

示异议，尤其是英国认为，第五号中日本要在长江流域及华南各省建造铁路的有关各条，侵犯了英国在华势力范围及其权益，故于4月下旬照会日本政府，对第五号表示反对。

日本为换取英美的谅解和支持，遂于4月26日向袁政府提出修正案，且声明这是最后的方案，中国必须接受。这个修正案的内容，于第1——4号实际未作什么变动，只于第五号作了变通，表示该号不作条约内容，可由中国方面声明予以肯定，并保证日后另行协商。

5月1日，中方提出自己的总修正案，除第五号没有接受外，于“二十一条”的其他各条，基本上接受了日方4月26日修正案的要求。但日本大不满意，并于5月7日下午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于5月9日午后6时前作出“满意的答复”，否则日本“将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

5月8日，袁召集政府枢要紧急商议对策。同日，英美等国公使也诱劝中国政府“忍辱负重”，接受日本要求，“以免危机”。在日本武力威胁与各国的诱劝下，袁政府便决心接受最后通牒，并于9日照会日本政府，全盘接受日本最后通牒中所提条件。日袁政府又与日本政府正式签约。这个条约包括两个正约及所附换文13件。它在实质上是日本原来所提“二十一条”要求的翻版，只不过第五号内容暂时未塞进去罢了。

袁世凯为掩饰自己丧权辱国的丑行，不替颠倒黑白，把自己极力装扮成坚定的爱国者。他强调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是忍辱负重的被迫之举，并强调日本答应不将第五号各条列入要求的内容，是自己抗争的胜利；实则，日本作为变

通，不仅是为了应付英美的要求，更主要还在于，这是袁与日本政府暗地作了秘密交易的结果。

在谈判双方提出修正案时，袁早密派顾问有贺长雄携秘密条件往日本，与大隈首相及元老商谈。所谓密件，即以第五号各款作为由日本包办和操纵帝制的交换条件。原为国会议员的刘成禹指出：“放北京会议，为公开之仪式，佯示紧张，掩世人耳目，所争事件皆可告人；而其暗中交涉重心，实在东京”。刘成禹从唐绍仪处得知，该秘密条件为：

（一）大总统称帝，专由日本赞成支持；

（二）大总统变更国体，先由日本密商赞成；

（三）如大总统信任日本以外之国家支持帝制，日本可取其他已充撤消之途径。

而日本所以答应将第五号各款与此次交涉“脱离”，“再议”，也是由密约决定的。当然，日本所以欲包办袁氏帝制，目的乃在于独霸中国。

也惟其如此，袁撇开英国，一心想依赖日本圆他的帝王梦。英公使朱尔典对此十分敏感，他怀疑袁与日本尚有密约，但苦于找不到证据。据刘成禹的《世载堂杂忆》记载，事情后来有了戏剧性的发展。

1915年底，英使朱尔典以巡视各地英领馆为名，道出上海，造访唐绍仪，二人进行了长谈。英使告诉唐，袁世凯明年必称帝，中日交换条件后，袁着着进行，中日间必是订有密件，现在的问题是苦于拿不到密件，双方矢口否认。他说：“不得密件，言无证据，明知密件最关帝制，如得其真本，则证明日本挟此件以独霸中国权利，自无以对中国，更无以对

英日同盟，大可为时贤反对帝制之助。倘诸公爱国，能尽力获得此项密件签字真本，或需财力，英国亦愿相助”。唐绍仪表示稍容数日，必能想到办法。英使满意而退。

唐首先就想到了袁不同。不同父袁乃宽与袁世凯同宗，被认作侄子，总管总统府事。但不同力反帝制，与其父异趋。新近不同从京至沪，曾来见唐，表示“唐总理有何驱使，当竭力奉行”。于是唐便与他商量，能不能从袁世凯处把中日密约偷出来看一看。不同表示总统府内部的情形他十分熟悉。重要的条约文本都放在一个专门的保险柜内，钥匙则不离袁身。不过总统府卫队长句克明与自己最善，通过他不难弄到文件。

翌日，朱尔典来，唐将袁不同的话对他说了。英使表示，事能有成，愿酬金 100 万，请后主持一切。后于是先交不同 30 万，布置各方，说好能将密件偷出，交英使馆一观，再当场交现金 70 万，同时仍将原件退回。

不同入京，找句克明等人密商，最后利用能收集到的各种相似的钥匙，一一套试，果然将保险柜打开，把中日交往全案连夜偷送到英使馆。英使从中找到了密件，加以拍照，并付了余下 70 万元后，让将原件悉数送回原处。

第二天，朱尔典往日使馆见小幡西吉。后者仍矢口否认有密件，英使便拿出密件照片，冷笑说，“证据在此矣！”日使大惊，赶紧电本国请示应付办法。日内阁开会密议，坚决否认，并为顾全体面计，决计反对袁帝制。同时电责袁泄密违约。

袁震怒，严讯总统府上下人等，并将涉嫌的袁不同、句

克明等送军政执法处审讯，但终因缺乏实据，不了了之。

刘成禹的上述记载是否可靠，暂不置论，但它透露了其时英日为操纵袁帝制展开激烈的争夺，却是合乎实际的。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对华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各界人民，纷纷走上街头，发表演讲，举行示威游行。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反日浪潮席卷神州。人们抗议日本对中国的新侵略，同时也谴责袁世凯政府丧权辱国。但是，袁不顾民意，竟于签约次日即5月26日发表所谓“大总统申令”，指斥正义的舆论是“未悉实情，故为高论”。更污蔑人民的抗议活动，是“倡乱之徒”，“纠合匪党”乘机“煽动”的结果。他命令各省当局对反日宣传要“认真查禁”，“严拿惩办”。

任何野心家都是极端的主观主义者。袁自信有了日本的支持，帝制便可万无一失，因而开始放胆进行。但是事实证明，在关键时刻正是日本首先抛弃了他，如弃敝履！

《共和与君主论》

自宋育仁遭步军统领署拘捕递解回籍后，复辟之说稍息。但到1915年春，改变共和国体之说再起，人言籍籍，盛传此次袁总统将帝制自为。袁世凯欲擒故纵，力辟其非。为袁坐镇东南的江苏将军冯国璋，将信将疑，终于坐不住了，6、7月间亲自跑到北京，当面问袁究竟有没有要复辟帝制这回事。袁对此断然加以否定。他说，外间的种种传说，都是无稽之

谈，或误会之至。你不想想，以我今日的地位和权力，即便改为君主，不是也无以复加吗？而且所谓君主，不就是可以世袭吗？我的长子克定是个残疾人，次子克文流连涛酒，不过志在做一个名士，三子更不成材，其余都正年幼。所以，我的这些儿子即便给他一个排长的职位，我都不能放心，怎么谈得上托付天下之重任！“且自古君主之世传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余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之吾子孙也！”谈到这里，冯国璋插话，他有意给袁面子，故换个角度解释说，其实南方也并非绝对反对总统称帝，考虑的是时机问题。若假以时日，待总统将中国治理到转弱为强的地步，我敢说到那时，“则天与人归，恐大总统虽欲逊让，亦有所不得耳”。没料到，袁闻此言，勃然变色道：“说了半天，你还是要在我的身上打主意！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四、五二子都正在英国留学，我已让他们在英国置办了田园，假如他日真有人要逼我称帝，我就只好到伦敦做寓公去了！”

人们不能不惊叹袁善表演。他的谈话，从表面看，确实言辞恳切，丝丝入理，难怪冯国璋当时不仅深信不疑，而且十分受感动。冯告退后向报界发表谈话，替袁力为剖白。冯是袁的心腹大将，他如此说，自然又使一般舆论信以为真。

与此同时，袁下令改建正阳门。正阳门是北京内城的正门。其外郭有三座门，中为御道，一向禁止出入，只有左右两门可通。由于城门狭小，车辆常常堵塞。民国后，曾屡议改建，都无下文。京中传言，其原因是袁世凯惑于堪舆家言，说改建不利于帝制，所以拖延不办。人们都说，“帝政之实行与否，当机正阳门修建与否以为断”。不管传言是否可靠，在

袁的上述谈话发表后，改建正阳门命令随之遽下，又显然并非偶然的巧合。

睹此二事，许多人深信帝制决不至复活，年来的传说都无非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而已。

然而，谁也未料到，进入8月中旬，袁的法律顾问美人古德诺竟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从“理论”上力证中国改归帝制的必然性。人们一时又坠入了五里雾中。实则，洋顾问是奉命而行，其文的出笼，是袁氏帝制活动正式发动的信号。

古德诺（1859—1939），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学博士。1912年7月来华任中国政府法律顾问。1914年5、6月间任期满时，回国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但同年7月又续聘他为法律顾问。古德诺在受聘期间，极力为袁的专制独裁作辩护、1914年2月他发表《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力倡改行总统制。是年夏天他回美国，又接连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中国新约法论》等文，继续为袁的独裁涂脂抹粉。他攻击临时约法“与国法不合”，《新约法》改总统制，使总统成为政权的中心，“贵似前朝天子”，这“与中国之历史、国情更为相合”。他还把袁说成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袁正因其拥护有力，特授古德诺二等嘉禾章。在洋顾问中，古德诺与有贺长雄（日人）对袁的影响最著，记者黄远生认为，二人在政治上发表的意见，常常是袁于政治上有所举措的先声。

1915年6月，正当袁决意公开复辟帝制的前夕，古德诺奉召返回北京，“以备顾问”。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世凯

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在与袁的党徒周自齐、蔡廷干等人反复密商并接受了袁 50 万元的巨额贿赂后，写就《共和与君主论》。8 月中旬，该文被提交总统办公室讨论。在袁的首肯下，即由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递交御用报纸《亚细亚报》于 8 月 30 日发表。

古德诺在《共和与君主论》中，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论点：一个国家无论取君主制或共和制，总须与其本国的国情适应，否则，虽定于一时，不久“必复以其他之相宜之国体代之，此必然之理也”。他认为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因为前者是世袭的，没有选举的纷扰和权力继承问题引起的纷争，故有益于国家统一与安定。近古以前，世界各大国皆采君主制，近代以来欧洲变动，有复君主取共和的趋势，英国曾率先改共和，但终因无法解决继承问题，又复回到君主制。美国革命之初，目的只在求脱离英国而独立，并无意颠覆君主，后行共和制有不得不行之势，因为“其地本无天家皇族，足以启政务之重”，而华盛顿本人也无子可以继其后。加上当时英国的共和派多移居美国，致使最终选择了共和。法国最后也确立了共和，但它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痛苦蹉跎。至于 19 世纪以来南美洲各国纷纷效法共和，多无善果，墨西哥至今仍在痛苦中煎熬，就是明证。

古德诺自然是在胡诌一部世界近史，但他却从中引出所谓的三点结论：其一，行共和制，国民须具备很高的智慧，否则“断无善果”；其二，落后国家行共和制，无法解决好总统继承问题，必引起内乱，国无宁日；其三，内乱不符合列

强利益，必遭其干涉。至此，中国应何去何从，结论是明摆的了。所以古德诺最后点题说：“然则，以中国之福利为心者，处此情势，将持何种之态度乎？将主张继续共和与？抑将提议改建君主制与？此种疑问，颇难答复。然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古德诺博士果然不同凡响，他能从“理论”上和世界“大势”上论证中国复辟帝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袁的手下人自然无一能望其项背。加之，古德诺既是美利坚共和国的著名学者，由他告诉中国人，君主制优于共和，中国应当恢复帝制，自然也更有“说服力”了。所以袁对此十分满意，他曾对人这样说：“古德诺表示美利坚虽然是共和国，却还是赞成中国恢复帝制的。他说中国老百姓不开化，不懂什么民主自由，非帝制不能加以统治。”

《共和与君主论》发表后，日英等国报刊纷纷转载，在中国更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紧接着，筹安会出场，袁的帝制活动公开进行，其党徒无一不是借古德诺的文章立论的。

事后，古德诺曾辩解说，他仅仅是从纯理论的角度谈论问题，是别人曲解和利用了的文章。可是曾充袁顾问的英人莫理循指出，在帝制表面化以前好久，古德诺曾将文章的副本送他征求意见，当时古德诺力主中国必须改归帝制的意见，“是十分明白的”。其实，谁都看得清楚，古德诺的文章绝非是纯理论的，而是在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不仅如此，他甘心充当袁的工具。

“筹安会”推波助澜

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从一开始便是借伪造的民意为护符。在对日交涉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政客徐佛苏、丁世峰等秘密呈请袁改行帝制。袁叫内史夏寿田转达杨度，让他授意徐、丁二人，网罗一批“名流”，组织一个“学术团体”，先为帝制作舆论准备。袁所以不想让杨度直接出面组织，是因为考虑到杨与自己关系密切，怕由他直接出面，易被人窥破就里。但是，杨度却不以为然。他早就看出袁意在帝制自为，曾于1915年4月特撰《君宪救国论》一文，请夏寿田转呈。袁看后大为赞赏，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制成匾额送给他，并将此文寄给湖北彰武上将军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文武长官参考。在杨看来，先机劝进既已得分，如今帝制活动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自己正应激流勇进夺取首功，成开国元勋，如何能甘居人后！杨本身无党派，却又与各党派保持着广泛联系，他利用自身这一有利条件，竭力拉拢各派名流。在古德诺的文章发表后，他显然加快了步伐，最终急匆匆找到了孙笃筠、严复、刘师培、李樊和、胡瑛，加上他自己共6人，凑成了一个小团体，取名“筹安会”。袁曾问杨，会取何名？杨说：“去乱即安，在此一举，某意直名‘筹安’。”袁大悦，立命支20万金充开办费。杨称谢而出，草定章程，招集同党，俨然以开国元勋自居。

这几位“名流”有的是杨强行拉来的，有的则是自愿上

钩的。其中有的是变节的革命党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失意的军人。

孙笃筠（1872—1924），安徽寿州（今寿县）人，祖籍山东济宁。1906年入同盟会，后因参加萍浏澧起义被捕入狱，辛亥革命爆发后获释，并出任安徽都督。后离职赴京，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袁先后任命他为约法会议议长、参议院参政。他又组织了一个宪政研究会，甘心充当袁的政治工具。

胡瑛（1884—1933），湖南桃源人，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杨同谋行刺五大臣。后人同盟会。并在武汉被捕。武昌起义后获释，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都督。袁上台后，派他为陕西经略使，新疆青海屯垦使。他与杨度是好友，1915年5月抵京，从此也甘为袁效劳。

刘师培（1884—1920），江苏仪征人，清末举人。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易名刘光汉。主编《警钟日报》、《天义报》、《国粹学报》，著有《攘书》、《中国民约精义》等书，鼓吹排满革命，自称“激烈派第一人”，影响颇巨，刘承家学渊源，勤于著述，他去世时只有36岁，但仅收在《刘申叔先生遗书》中的著作就已达73种之多，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家。1907年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变节。辛亥后得革命派宽容，却不知改过，复投靠袁世凯，任参政，并被授为“上大夫”。刘参加筹安会后，曾受到《国粹学报》同仁黄节、马叙伦等人的当面斥责，要他即行退出，但刘终不能听。

严复（1854—1921），字几道，又字又陵，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人。曾被选送英国学习海军。归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以翻译《天演论》、《社会通论》等名著，介绍

西方社会科学著称于世。袁很想拉几个大名流来支撑门面，曾先找过梁启超，碰了钉子，自然更加看重严复。但是严复脾气倔强而古怪。杨度登门拜访，开门见山说：“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严复冷冷地说：“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杨接着说：“中国非统一不可，而要统一，又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不可。我们想成立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特请幼老作为发起人如何？”严复更不耐烦了：“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可也”。杨度是机灵人，见话不投机，便改换一种口气说：“幼老差矣，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学贯中西，德高望重，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此话既用激将法，又意存恭维，果然中听，严复也变了口气，说：“你们如要组织学术团体，我可以附骥，但不必列名为发起人。”杨度见严复入其彀中，欢天喜地而去。

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的消息见报，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之列，他只觉得有点茫然。一天，他的老朋友林纾跑来说：“又陵，你怎么会和筹安会搞到一起去了？无论将来袁氏是成是败，都是你的盛名之累呀！要赶紧登报否定！”但严复却不着急，“否定不否定，无所谓的，让他们去胡闹吧！”其后，筹安会的一应活动，严复实际上也均未参加。

李燮和（1874—1927），湖南安化人，曾在长沙求实书院读书，先后加入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参加过萍浏浏澧起义和广州起义。辛亥革命时，在吴淞设立军政府，自称吴淞都督。曾先后被孙中山、黄兴任命为光复军总司令、长江

水师总司令。1913年宋案发生后入京，以调和南北自任，实际上是因穷困潦倒，借此找门路，终被杨度收罗了。

上述杨度等6人，因同为筹安会发起人，后被称伪“筹安会六君子”。其中，杨度自然是主脑人物。

8月14日，筹安会发表宣言。谓：辛亥革命时，国人“激于情感”，“仓率之中，制定共和团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如今国势阽危，人民痛苦，须重新反省。“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据所见，以尽切磋，并似贡献于国民。直言自然没有忘记抬出美国博士古德诺这块金字招牌，它实则已经肯定了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所谓“切磋”、“相榘”，全属虚言。

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挂牌，宣告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笃筠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为理事。同日，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派代表到京，共商国体问题。同时致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各官，寄去古德诺的文章和入会登记表，并请代募会员。它在“启事”中通知会员：“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此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但这无非是骗人的幌子，它的实际活动只是操纵国体表决，所以径直将选票和入会登记表同时分发给会员，要求他们在上面填写“君宪”或“共和”。而且，其第二次宣言公然宣称：“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这明明已是公开号召改变现行的共和制，那还有什

么“研究学理”可言！

谁都看得清楚，筹安会的后台老板是袁本人。因之，希邀恩宠，追求高官厚禄的人，无不视入会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各省官员固乐于通电赞成，并派出代表赴京；更多的人则纷纷填表入会。自然这些人在选票上填的都是“君主”了。

筹安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舆论的谴责。不少人不要斧钺、分别直接向肃政厅、内务部、法院呈文，要求袁总统速将妖言惑众，扰乱国政的筹安会诸人严拿正法，以谢天下。苏州人汪风騫，致书杨度，力言复辟帝制祸国殃民，其书传诵一时。汪且将此文交政事堂机要局长，请转呈总统。张笑曰：“公不畏祸？”汪回答说：“余作此文，即预备至军政执法处矣。”张也不赞成帝制，大受感动，以为汪文“正言可敬”，乃代呈袁氏。尤可注意的是，9月9日肃政厅全体肃政史呈请取缔筹安会，内有“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会议议长，倡此异说，勿怪人心惊疑，应请迅予取消，以靖人心”等语，足见人心未死，正气不筹安会成立后，有人谒袁，问是否应加以干涉，袁回答说：

反正我自己不想做皇帝，而且也不想连任总统，只想早日到井上村，做一名自由自在的钓翁。筹安会是学者研究政治的团体，无论他们发表什么主张，都与我不相干。我占据大总统的地位，对这个问题难于进行研究，但是根据言论自由的原则，只要他们无扰乱治安行为，就未便加以干涉。袁讲得何等冠冕堂皇！但身为共和国总统却容忍筹安会“研究”共和国体是否适于中国，岂非咄咄怪事！而且既讲言论自由，当时反对者组织团体与筹安会对峙，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

国是讨论会等，官厅却不予立案。足见其虚伪之至。

肃政厅要求取消筹安会的呈文递上后，袁才稍稍换了一种口气，批转内务部说：“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具有界说，不可逾越范围。着内务部确切考查，确定范围，示以限制，通飭遵照”。内务部知其意，逢迎说：“该会发起人皆学识阔通，声望卓著之士，于此次讨论界说，范围已郑重声明。倘认为有扰乱秩序之虑，自当加以限制，以保公安。”这是虚应故事的官样文章。事实上，自筹安会成立以来，不仅筹安会门口有警兵守卫，就是杨度等“六君子”的私宅跟前也有军警守护。人们看得清楚，筹安会的活动得到了政府的庇护。

也正因为如此，筹安会伪造民意，变更国体的活动愈加急切和大胆。杨度等人原本打算待各省代表到齐，即开会议决呈请实行，但考虑到这个会不是法定机关，无径行呈请的资格，若由国民会议呈请，召集尚需时日，于是改变计划，拟由各省代表以公民资格向代行立法院的参议院请愿改变国体，但该院定于9月1日开会，各省代表一时又难以齐集；由是再改办法，决定组织公民请愿团，由各省旅京人士分头组织，所有请愿书一律由筹安会起草。所以9月1日参议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这样，从该会成立到组织请愿，前后不过10天，可见筹安会是怎样赤裸裸地伪造民意。

9月6日，参议院正拟审议请愿国体问题，袁忽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院发表宣言书。袁先是说各省国民请愿改变

国体，“于本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但接着又说，总统乃国民公举，于国民及立法院都不应“有所主张”，又否定了前面的话。他欲藏还露，前言不搭后语，但最后还是道出了真意：“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其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于国民请愿，……加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袁世凯并非反对改变国体，只是不愿意让代行立法院的参议院解决此重大问题。他所以如此特示郑重，无非故作艰难，以直逼出“民意”二字，即示意党徒，制造民意还须更精细一些，这也就成了其后国民代表大会出现的引线。

人称机灵的杨度，一时却被袁“不合时宜”的话所困惑，未能准确体会袁的心意，反应稍缓；结果，同道争功，袁的另一员干将梁士诒得以后来居上，从筹安会的手中，夺去了劝进的主动权。

梁士诒后来居上

袁世凯帝制活动的过程，又与北洋政治的暗潮，即粤、皖的纷争直接相关。所谓粤系，又称通系，以粤人梁士诒为领袖其大本营为铁路、关税与交通银行、戊通公司等。所谓皖系，并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近来全国各地纷纷吁请变更国体，足见“君宪二字”已是“吾民之公意”。本

会成立就是要“同心急进，计日成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与筹安会借重“研究”的名义不同，它突出帝制进行的实际操作。全国请愿联合会既以总汇全国各请愿机关为己任，便意味着交通系取代杨度诸人，成了袁氏帝制活动的台柱子。“杨度以梁攬其功，甚愤”。筹安会被挤到了后边，已无用武之地，遂于10月13日通告会员，改为宪政协进会。

全国请愿联合会成立后，不出半个月，所联络和扶植的各色请愿团体已达数十个，总人数有几千人。其中除了人力车夫代表请愿会、妇女请愿团、公民请愿团、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北京社政进行团、旅沪公民请愿团等外，甚至还有乞丐代表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等，五花八门，形同儿戏。

在请愿联合会的推动下，北洋及归附它的各地将军们，也群起劝进。湖南将军汤芑铭捷足先登，于8月25日便致电说：“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定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但在这方面讲得最粗率露骨的当数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大总统高升皇帝，只要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就砍下谁的脑袋来！干嘛来闹这些讨论、请愿的把戏！”这话传到了袁那里，袁大怒：“这个老粗懂得什么！我要重重地办他一下，以警戒那些敢于干涉政治的军人！”袁担心头脑简单的武夫们坏了他的大事。

袁的干儿子奉天将军段芝贵，于9月间联络14省将军密呈“速正大位”，在请愿活动中别树一帜，表现得格外卖力。列名者是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芑铭、江西李

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思远、黑龙江朱庆澜。附名的有将军衔甘肃巡抚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

如前所述，袁世凯不愿意由代行立法院的参议院解决重大的国体问题，暗示要进一步制造民意，请愿联合会便趋承袁意，在筹安会所策动的各省代表请愿的基础上，举行第二次请愿，提出以国民会议作为解决国体问题的机关，参议院因之建议，咨请袁发布命令，定于1915年11月31日举行国民会议复选。国民会议是新约法中所规定的复议民国宪法的机构，其组织法已于12月12日公布。但召集国民会议有一定的手续，为时尚缓。提出国民会议来，不过是袁将擒先纵，欲速故缓的故技重演罢了。梁士诒相对此心领神会，为了早日将袁扶上皇帝的宝座，他一面指使请愿联合会作第三次请愿，借口国民会议是民国的约法机构，不宜于解决国体，同时人数有限，也不足以服众，要求另组机关，征求正确民意；另一方面自己又在参议院纠集几位参政，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问题。参议院于是又据以向政府提出第二次建议，主张即用国民会议的初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

这就符合了袁的心意。10月10日袁发表《尊重民意申令》民团体一再请愿，以为共和不宜于中国，要求速定君主慰人民长治久安之望。本大总统的原意，以为事端重大，殊非所宜。但《约法》规定国家的主权属国民全国体的问题自然也应听诸于国民。“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

己任，民所好恶，良用兢兢，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

不必说临时约法，就是新约法，袁也从未尊重过；现在他却抬出约法来，强调尊重民意，决行复辟，以掩饰自己的背信弃义，这虚伪做法又怎能骗得了人！10月21日，《申报》转载《字林西报》的一篇社论，题目是《喜剧软抑滑稽剧欤》，其中写道：

“袁总统前有幼年即倾向共和之宣言，又有不赞成帝制之命令，今忽然对于帝制运动，不复有不赞成之表示。袁总统前解散国会，手段急切，无异克林威尔，今忽盼望国民代表大会成立，情极殷挚，不啻汉勃登（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前后态度，判若两人，世人安得不窃笑于旁耶？……今连篇累牍之命令，与夫所谓公民团者，请愿书者，果为真耶？果表示若何目标耶？果表示达此目标之一定步趋耶？抑吾人所注视者，不为他物，而为骗局，而为巧行布置，以掩其支离情节，荒谬颠倒之剧本耶？……果尔，则记者敢警告袁氏曰，尔之最后一幕，必为有间断且有苦恼之一幕也！”

可见，袁的拙劣手法，连正直的外国记者都瞒不过，遑论国人！但对袁来说，却是笑骂由人笑骂，帝王好梦我自圆之！

全国请愿联合会推动参议院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的议案，其功用已毕。从此，帝制活动进入了紧锣密鼓的阶段，利用强奸民意以产生皇帝，为期已不远。

洪宪帝制粉墨登场

10月8日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后，在袁氏党徒的操纵下，到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投票均告完成，共计代表票数1993张，全体赞成君主立宪，没有一张反对票或废票。不仅如此，按组织法规定，国民代表大会仅有表决国体之权，推举元首当别为一事。但是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却一致发出推戴书，且一字不差全都这样写道：“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运建极，传之万世。”

12月11日上午11时许，参议院根据各省“国民代表大会”的“委托”，向袁恭上总推戴书，文中用“我圣主”代替了“我大总统”字样。当天下午，袁按既定程序，将推戴书退还。同日下午5时，参议院开议决定再推戴，5点15分，参议院就把长达2600多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写就送出。从开会到发文，统共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如何能这般快？这自然是预先设定的自欺欺人的把戏罢了。

次日，即12日，袁接受推戴书，并发表承认帝位申令，承认做皇帝。袁只推让了两次，尚无三让的耐心，是日上午8点，袁在怀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时文武官员200多人分列两班，在司仪内史监长阮宗枢、礼官黄开文的引导下，向袁行三鞠躬礼觐贺，袁也还礼如仪。接着袁发表了简短的答词，说自己遵从民意，违心地接受了帝位，这是“为救国救民”，

牺牲了自己一身，也牺牲了子孙。

至此，总统变皇帝的连轴戏算是演完了，接着洪宪丑剧粉墨登场。

15日，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被婉拒。

1916年1月1日，改称洪宪元年，公布洪宪元年预算。同日，总统府改称新华宫，公府收文处改为奏事处。

为了庆祝国体变更和袁接受帝位，袁党徒以北京商会的名义，于18—20日连续3天在京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当局下令居民家家悬挂国旗，并于通行之处，扎结五彩牌坊。

但是这些庆祝活动，无非是袁世凯帝制派自庆自祝，与国人并无关系。据记载，时有两名担粪夫在西直门小憩，谈论时事，二人的对话最耐人寻味：其中一人说，“他做总统，我们也是担粪，他做皇帝，我们也是担粪，管他做甚！”另一个则谓，“话还不能这么说，从前本有皇帝，何必又要总统？既然有了总统，何必又要皇帝？他们变来变去，只带连我们吃亏。你没看见吗？现在城里人心惶惶，连小菜都不值钱了。”担粪夫的朴素对话，正中肯綮：袁帝制自为，全然强奸民意。

全国讨袁的声浪

袁世凯公然帝制自为，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强烈的反对。

1915年9月中，即筹安会刚刚成立不久，孙中山为首的

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即发表《驳斥筹安会谬说通告》，不仅痛斥杨度诸人关于中国不适于共和的种种谬说，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筹安会的出现乃是袁复辟帝制的严重步骤，国难当前，唯有革命！12月中，袁公开接受帝制后，孙中山随即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国人奋起“共戮国贼”！

一向依附于袁世凯的进步党也大受震撼，决心脱离袁。《申报》1915年12月14日“北京电”报道说：“今日华宇报称进步党重要人物如梁启超、汤化龙、王家襄等多已托病出境，不知何往。”其党员孙洪伊等发表致各支分部电说，袁公然复辟帝制，“丧心病狂，寡廉鲜耻”，必将乱我中国，“而吾党力挽狂澜，义无旁贷，请诸公及时奋起，共谋补救”。党员安致远等137人的通电，不仅指斥袁无耻，表示与之决绝，而且要求反省过去，甚至对北京的总部表示不信任。它说：“吾党四年以来，拥护袁氏，断送国家，应速忏悔，声罪致讨，以补前过，岂宜希荣苟合，摇惑人心，媚兹一人，负罪万世。”

各地民众团体也纷起声罪致讨。河北同志会发出《敬告全国父老书》，称袁为“该贼”，指斥他复辟帝制，“断送国家”、罪在“叛逆”。东三省公民刘醇一等也发出《警望父老勿再资给盗粮书》，强调袁氏大盗窃国，呼吁国人拒绝向袁政府交粮纳税，以为抵制。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及留日学生，在筹安会刚一露头时，就已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严加取缔，以维护共和国体。

袁帝制自为，即便是在他的亲友中，也遭到了不少人的抵制和反对。

张一居袁幕府有年，向来十分受信任，但他不主帝制，曾向袁谏净，争执达一个半小时。袁不能听，遂免张机要局长职，命继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实疏远他。1915年12月12日，即袁在怀仁堂接受百官朝贺这一天，张请病假在家草密谏，当日进呈。其中有句云：“称帝王者万世之业，而秦不再传；项功法者四十万人，而汉能复活”。提醒他得人心者得天下，不要迷信万世一系的帝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晚间阅报，见袁白天已有“不得不牺牲子孙”的答词，知事不可为，叹曰：“成死者矣，哀哉！”

严修为袁数十年知交。当年袁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出京时，与之相善的京华大官僚都避而不见，送行者只严一人。袁执其手说：“今日始见君之交谊！”迫筹安会起，严极表反对，情词恳切，袁动容说，“你终究是老朋友，他们实在胡闹。你去拟一道命令，明日即将他们解散了”，严满意而退。不意次日持稿请见，却被门卫拦住，说奉命无论何人概不传见。严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被袁耍了，遂即日出都，拂袖而去。

袁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宇为“嵩山四友”，特予优崇：免称臣跪拜；赏乘朝舆，至内宫换乘肩舆；皇帝临朝，得在动政诸殿设矮几以坐；每人给年金2万元，赏穿特种朝服等等。

但4人并不赞成袁帝制自为。早在1915年10月帝制正在紧锣密鼓声中进行时，徐世昌便称病请假，不到政事堂办公，并由总统府迁回东城五条胡同私宅。袁只好先命杨士琦代理国务卿。10月27日又改命陆征祥代理。12月21日正式接受徐辞职，任命陆为国务卿。赵尔巽见筹安会宣言，掷之

于地，骂袁不已，随即力辞清史馆馆长职。张宇先于4月间辞去农商总长职；由周自齐继任。仅允任水利局总裁。到筹安会成立，曾劝阻帝制，见袁不能听，便请假南归。后闻袁的嵩山四友申令，立即电政事堂，干脆连水利局总裁的挂名职务也坚辞了。李经羲于筹安会成立后，也曾向袁进“忠告”说，“别人都町做皇帝，惟有大总统不能，袁氏世受国恩，似未便于此事”，不然将貽万世唾骂’四人反对帝制的出发点与一般国人虽有不同，但其因之反对或疏离袁却是应当看到的。

耐人寻味的是，在袁的亲属中也不乏反对帝制者。袁的姻亲任姝政史的曹树蔚，在肃政厅呈请取缔筹安会不果后，即不告而别。愤然离京。袁的二子克文，字抱存，又名寒云，时也不赞成帝制。他曾作讽诗《感遇》，示讥谏之意。诗云，“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口寒雁淹孤月，东去骄风黯九城。驹隙留身争一瞬，蛋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其兄克定检举涛末二句为反对帝制，禀呈乃父。结果袁大怒，将克文安置在北海，禁其出入。但诗却传诵一时，人谓：“项城次子克文且不赞成帝制，况他人乎！”

据刘成禹《洪宪注事诗本事簿注》记载，袁接受帝位后，其胞妹时为前清两广总督张树声的儿媳妇，称张袁氏，与其六弟世彤，联名在京津各报发表声明说：“袁氏世凯，与予二人完全消灭兄弟姊妹关系，将来帝制告成，功名富贵，概不与我弟妹二人相干；帝制失败，一切罪案，我弟妹二人亦毫不负究。”袁见报，大为恼火，却也无可奈何。

袁七弟世传同样反对帝制。筹安会成立后，世传去见袁

说，“杨度等人如此妄为，是否出自四哥授意？”袁答以不知此事。世传说，“四哥既然不知，现在这帮人倡言叛国，已是彰明昭著，何以不下令取缔？”袁回答说，“这帮人无非书生，闲着无事，聊发空论而已，用不着禁止，自归消灭。民国共和，实存宽大；我总不能学清季专制，动不动禁人结社集会。吾弟怎么不懂这个道理？”世传一想，也有道理，遂默然而退。但不久帝制自为的明令忽下，世传知受骗，归与其母痛哭曰：“吾族有灭门祸矣。”后出资在北京琉璃厂刊印《项城家书》，分送当道，历数袁幼年家居种种不端行为，其意也在划清界限，脱离关系。

袁侄乃宽的儿子袁不同，恨袁帝制自为，曾将炸弹偷偷运进新华宫，想暗杀袁，事泄遁走，不久即给袁来了一封信，其中写道：“国贼听着：吾袁氏清白家声，安肯与操、莽伍？所以无端族祖汝者，盖挟有绝大之目的也。目的维何？即意将手刃汝，而为我共和国一扫阴霾耳。不图汝之鬼域，防范至严，遂未克为愿。……今吾已脱身遁去，……吾他日归来，行见汝悬首国门，再与汝为末次之晤面。汝尚能自悔罪，戡除野心，取消帝制，解职待罪，静候国民之裁判，或者念及前功，从宽未减，汝亦得保全首领。二者推汝自择之。匆匆此警告，不欲言。”袁大怒，令急捕之，却不可得，实则袁不同已南下参加讨袁活动去了。

总之，洪宪帝制虽然粉墨登场，但袁的好梦终难圆。他很快发现自己正为千夫所指，全国尤其是西南燃起了护国讨袁的烽烟。

中华革命党的斗争

中华革命党一成立便确定了进行的方略“以军事为先决问题”，即坚持武力讨袁。所以它成立后不久，就派党人回到国内，先后在江苏、浙江、江西等地接连发动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并不能动摇革命党人的讨袁决心。

孙中山主张讨袁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他认为“宋案”已暴露袁世凯帝制的野心，因之，癸丑之役不能看作是南北战争的开始，而应“认为共和与帝制之战争之发轫”。中日问题发生后，中华革命党于1915年4月9日发布《中华革命党本部为揭破中日黑幕以告国人书》，指出袁企图以承认“二十一条”作为交换条件，取得日本政府对自己称帝的支持。因此“党人于此际，除力行革命，推翻袁氏恶劣政府外，再无以容喙之余地”。其后，随着抗议日本侵华和家政府腐朽卖国的爱国浪潮席卷全国，孙中山更坚信推翻袁政权的时机业已成熟。1915年5月10日他致书邓泽如等人说，现在的形势，“较满清末年铁路国有风潮，尤易激动全国，为吾党不可失之时机”，武装起义必须加紧进行。

与此同时，孙中山派遣军事指挥骨干分任各省司令官，负责组织发动起义工作。其中有广东的朱执信、邓铿，广西的刘峴、刘玉山、苏元涯，四川的卢师谛、向传义，湖北的蔡济民，湖南的林德轩、郭庞，贵州的安键、张百麟，浙江的夏次岩，江苏的周应时，江西的董福开，云南的董鸿勋。

1915年9月，为协调各地讨袁工作的组织与领导，孙中山又着手组建中华革命军，任陈其美为东南军总司令，在上海设筹备处；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在青岛设筹备处；胡汉民为西南军总司令，在广州设筹备处；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在陕西三原县设筹备处。复派胡汉民、许崇智、邓铿等人分赴南洋筹集军饷。到12月中旬袁公开接受帝制，孙中山便立即发表《讨袁宣言》，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救吾民”，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在所不辞。由是，中华革命党在各地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陕西革命党人在三原、泾阳一带起事，攻占数县；山东曾组成东北军二个纵队、五个支队，拥有数千人的队伍。此外，上海党人策划刺杀郑汝成和发动肇和舰起义。影响尤大：

孙中山、陈其美等人研究认定，本党第三次革命，上海作为东南重要区域之一，军事上在所必争。时袁特派心腹大将郑汝成成为上海镇守使，坐镇东南。郑汝成诡计多端，大肆捕杀党人，成为革命凶恶的敌人，因此，“党中乃决定进行程序，光刺死袁党中强健将郑汝成，以寒海陆各军之胆，使输诚于我”。

1915年11月8日，陈其美得到情报，日本大正天皇于10日举行加冕典礼，驻沪日总领事署将开会庆祝，届时郑汝成要亲往祝贺。陈遂于次日召集党人周密讨论了阻击郑的具体方案，凡郑可能经过的各处路口，都派定同志设伏。而孙夫祥、王晓峰、王明山等潜伏在离自渡桥北墩三四丈处。12时半，郑的汽车突然出现在桥面上，孙急发暗令执行。王晓峰立即向郑的汽车投去一枚炸弹，用力过猛，炸弹落在了车

的后面，仅毁其后轮。郑开车门欲逃，王箭步冲上去，拽住郑的衣袖，连击9枪，郑当场毙命。郑卫士开枪反击，但被王明山击退。这时，刚好有一辆电车开来，从车上跳下两名西探。在王明山装弹时，一西探即绕至其后，用铁棍猛击王背，结果王枪落地被擒。王晓峰击毙郑后本可逃走，却立桥头演说一分钟，结果也被捕。二王受审时，神态自若，说：“郑汝成辅袁世凯叛反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12月7日，二壮士从容就义。

郑汝成被杀，对袁是一沉重的打击。时袁正兴高采烈准备接受帝位，问郑死讯，“大为伤感，辍会终日”，后下令追赠郑汝成一等彰威侯。但革命党的精神却为之一振。孙中山指示党务部发布第18号通告，指出：郑汝成既除，“正宜乘时大举”。

除掉了郑汝成后，中华革命党便着手实施下一步计划：占据上海。因之事隔一月之后，又发生了肇和之役。

当时海军兵舰有“肇和”、“应瑞”、“通济”三艘在长江停泊。在杨虎等人的积极运动下，包括舰长黄鸣球、实习生陈可钧在内的肇和舰上的大多数官兵归附革命，应瑞、通济两舰支持举义的官兵也逐渐增多。同时，党人运动陆上军警的工作也颇顺利。总指挥部以为时机成熟，拟于12月中旬举事，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

但在此期间，袁听到了风声，并采取分而治之的应急策略，下令将涉嫌的陆军分别驻扎，或径调往北方次第解散。对海军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派萨镇冰以检阅海军为名，令

各舰出海。12月1日，萨镇冰抵上海，他令肇和舰于12月6日开赴广东。

情况突变。为避免原定的先策反三舰，再藉其炮火制服敌陆军的统盘计划落空，总机关决定提前在12月5日午后发动。

是日下午3时，杨虎率部分党人乘汽艇由黄埔出发，直奔肇和舰。由于事先已安排了内应，杨虎等便很顺利登上了肇和舰，并当众宣布中华革命军的讨袁宗旨，号召起义。舰上官兵欢呼表示拥护。下午6时许，杨虎下令兵舰开炮轰击制造局。炮声隆隆，揭开了起义的序幕。但孙祥夫等人因未及时领取牌照，在乘小汽艇奔赴应瑞、通济两舰时，中途被海关的英国水警截留，被迫折回，夺取两舰的计划落空。

肇和舰的炮声既起，暗伏于陆地租界的数百名党人应声而动，向预定目标分路出击。

谭斌等数十人先是顺利地攻占了电话局，但不久从制造局里出来的袁兵发起反击，党人势单力薄，电话局得而复失。薄子明所部200余人进攻警察局，遇到了袁军强大火力的阻击，无功而退。陆学文等人进攻警察第一区工程总局，曾一度得手，攻入局署，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但拂晓时袁军重新组织兵力大举反攻，将局署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激战，党人伤亡惨重，只得撤出阵地。

至此，党人于陆路分兵举事，均告失败。接着总部机关又遭破坏，陈其美等人逃脱，整个指挥起义系统便陷于瘫痪，各路失去联络，尤其是水陆长久隔绝，这使杨善德得以从容布置，集中兵力对付海军，肇和舰便处于孤军作战的危险境

地。

肇和舰在5日下午6时发出第一炮轰击制造局的同时，即向应瑞、通济二舰发出信号，询问“是否同意”。两舰回应：“正在会议，当可赞同，请勿攻击”。肇和舰因之“坦然无虑”。静待两舰响应。但杨善德等请示对策后，袁下令击毁肇和舰，待后二舰上革命党人说服官兵响应起义时，上海当局贿买二舰轰击肇和舰的巨款送到，舰上气氛陡变，许多人经不起金钱和高官厚禄的诱惑，纷纷改变初衷，不仅反对举事，且答应参与攻击肇和舰。革命党人占少数，要力挽狂澜，从中阻止，已不可得。

清晨4时，应瑞、通济二舰突然向肇和舰猛烈轰击。后者毫无思想准备，仓促应战，发炮多未能命中敌舰。激战持续约一小时，肇和舰屡受重创，伤亡枕藉。不久，锅炉中弹爆炸，船身起火。杨虎见事不可为，被迫下令撤退。后杨虎等人凫水登岸脱险，但舰上陈可钧等数十重伤员被捕获，英勇就义。至此，“肇和之役”失败了。

肇和之役虽然功败垂成，但它震撼全国，有力地打击了袁的帝制的活动。《神州日报》载济南来电说：“上海乱事之警报传来，此间大受影响，尤以附和帝制者以此意外之反动，颇为震骇”。《中华新报》更嘲笑说：“政府答复五国警告，谓帝制运动出于真正民意，若逆民意必生内乱。今则此次动乱之生，实由帝制运动当无疑义。不知政府又何以答外人？”吵吵嚷嚷的帝制活动，因之大煞风景。相反，中华革命党人却愈挫愈奋。此次举义，党人伤亡及被捕者约百余人，损失甚重。但仅过10天，即1915年12月15日；陈其美在《中华

革命党本部通告肇和起义失败经过》中，已在勉励党人同心同德，再接再厉，准备新的起义了。他说：“夫失败者，成功之母。革命事业，不畏百次之失败，终目一次之成功。”

不仅如此，肇和之役事实上又成了护国战争的先声。孙中山说：“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提国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这是合乎实际的。

当然，也须指出，中华革命党由于宗派情绪，未能联络其他革命力量，形成孤军奋斗之势，因此虽举事大小数十次，无一集事。同时他们不愿作深入细致的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急功近利，又使自己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少数人单纯的军事冒险。也惟其如此，中华革命党始终未能在国内真正站住脚跟，因而也未能把握后来护国战争的领导权。

孙黄重携手

共同的讨袁斗争，使一度分道扬镳的孙中山与黄兴，又重新走到了一起。1914年6、7月间，黄兴离开日本，远赴美国。他不愿看到自己与孙中山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希望云天相隔，各行其是，有助于彼此冷却一下情绪。他拥戴孙中山的初衷，始终未变。离日前，一些情绪冲动的同志鼓动他另立新党与孙抗衡，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孙中山，其他不知也。”到美后，他一如既往，处处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与声誉。例如，7月初他接见《太平洋商务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将继续为自由而奋斗

到底。吾等此次赴美，目的不在募款，而在将中国的现状宣布于世人之前。吾人带有孙逸仙博士对美国人民的宣言，吾等希望美国人民了解真理。”这里黄兴把自己说成是孙中山的使者，用心良苦。此外，他还对袁党散布的旨在挑拨孙黄关系的谣言进行了驳斥，努力维护孙的威信，使人足见黄兴心胸坦荡，顾全大局和爱护中山先生情感之真挚。事实上，在美国的国民党力量未曾分裂，跟黄兴维护团结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但是，尽管如此，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孙黄间的关系并未见根本改观。这是因为于导致二人异趋的两大核心问题，彼此依然固执己见。

在政治上，黄兴坚持缓进的立场未变。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强调整顿内部，积蓄力量，不赞成孙中山关于立即筹划第三次革命的主张。欧事研究会奉黄兴为领袖，该会1914年8月成立时有所谓“协议条件”，其中规定：“对于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用种种方法，总期取得其同情为究竟”，实际上正体现黄兴的思想。其后，此种“缓进”主张愈向错误方向发展。1915年1月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向党人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反侵略与讨袁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包括黄兴在内，欧事研究会诸人在认识上发生了严重失误。他们认为“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若不成，政又何有？”因此主张保国为大，应暂停革命斗争，以免妨碍袁政府对日交涉。黄兴诸人将反日救国与讨袁斗争对立起来，没能看出袁勾结日本政府，卖国求荣

的本质所在。他们想以停止讨袁为代价，争取联袁对日，无异于南辕北辙。相较之下，孙中山的见解却要高明的多：“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黄兴等人的电文发表后，引起了一部分原国民党人的反对，不少人以“屈膝投降”相责难，虽失之过当，但批评却非无的放矢。

在组织问题上，黄兴对中华革命党的章程，依旧不能释怀，要求修改。1915年9月底，他向梅培表示，若能说动中山先生修改章程，不仅个人十分感激，相信党内所有健全的同志也都会感激他。言词诚挚，说明黄兴确是衷心拥戴孙中山的，但也反映他要求修改章程，同样是十分认真和执著的。

但是，与此相应，孙中山的原则立场也未曾稍易。

孙不仅主张讨袁，而且随着袁卖国称帝的阴谋日渐暴露，其志弥坚。他始终反对黄兴“缓进”的主张。1915年3月，即上述黄兴请人连电呼吁停止讨袁一致对日之时，孙曾致函黄兴，对他的“缓进”主张表示断然拒绝。孙对彼此20余年的战斗友谊，一往情深。在该信中，他希望黄兴能“即日言旋”，字里行间，殷殷之情可掬。但他于黄兴主“缓进”的政治立场绝不通融，故曰：“文虽至愚，不知其可。”

对于中华革命党的章程，孙中山更一再表示此事无商量的余地。直到1915年8月初，孙还在严厉批评为此说项的党人。他表示自己与李烈钧等人，“绝无私恨”，只是以为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革命所必要，而他们则不以为然，既然如此，“苟且弥缝，勉强联络”，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对李根源等另组欧事研究会不满意，行文至此，颇动感情。他说，“吾

爱吾友，吾尤爱公理”。

耐人寻味的是，促进孙黄关系根本改观乃至最终重新携手，是讨袁斗争发展的结果，换言之，则是袁世凯充当了反面教员的结果。

1915年5月后，袁不仅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修正案，且公然指使成立筹安会，推进帝制。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促进了黄兴的猛醒。5月中旬，他与欧事研究会的主要人物联名通电，不仅指斥袁丧权辱国，而且对自己此前呼吁停止革命，一致对外的错误主张，公开表示了忏悔。由此他决然抛弃了“缓进”主张，转而积极投身组织讨袁起义。7月底，黄兴出任国民党美洲支部恳亲会名誉会长，开始与冯自由、钮永建等商讨“团结一致讨袁方策”。是年秋，黄兴接蔡锷将赴西南发难讨袁的密信，确信袁欲称帝，即令其子黄一欧马上动身去日本，带去给孙中山的信。他在信中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自孙黄分手以来，这是黄兴第一次向孙承认“三次革命”时机业已成熟，且无条件表示愿在孙的指挥下参加讨袁斗争。这封信的发出也是孙黄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改观的重要标志。1916年4月22日自旧金山启航赴日本。

孙中山对黄兴的转变大感快慰。当时讨袁斗争日趋高涨，他正准备回上海主持讨袁事宜，便于4月24日电邀黄兴“直乘原船到沪相会”。但黄兴以为回国尚非其时，就是孙本人回国也早了些，故直抵日本。孙不仅先期派人在横滨迎接他，而且很快给他写了一封长达30叩余字的信。在信中孙跟黄兴具体商量进一步讨袁的策略问题，并提出以孙黄二人的名义，

请黄兴在日本代购军械。孙强调此举关系全局，务请鼎力相助。他写道：“机局紧急，袁系方张，民党无不相提携之理。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忤之感情，弟信兄爱我助我，无殊曩日。此事成否，关系全局。如上云云，望兄以全力图之。”如果我们注意到在二人关系紧张时，孙曾表示要当真正的“党魁”，独立操作，请黄兴不要干扰他；黄兴赴美时，孙虽致函友人善待他，但同时即强调黄兴此行属游历性质，“我未容他参加下一次的行动，因为他在第二次革命期间竟然弃南京而逃，曾使我痛失所望”；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孙发出此长信，主动提出再度联手，共赴国难，表明他对黄兴已尽释前嫌。此后，为购械事，孙黄书信频繁，可以说二人的关系已完全恢复了。

不错，至此二人似乎都有意回避了中华革命党的章程问题。实则，彼此既在武装讨袁问题上取得共识，章程问题上的分歧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孙中山在上述长函中，对此实已作了明白的表示，即“但求贯彻吾人之主义，而宁牺牲一切之办法，求最大之团结力”。黄兴是聪明人，岂不知孙的善意？他很快作出回应。6月1日，黄兴通电表示拥护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以为“豁然大公，无任钦仰”，并要求党人破除门户之见。与此同时，他主动约请中华革命党东京本部的负责人谢持到自己寓所叙谈。

7月8日，黄兴抵上海。孙黄在分隔两年之后，重聚首。孙黄联名的通电又出现了，它昭告这对中国近代史上最出色的革命战友，又重新携起手来了。

但遗憾的是，黄兴归国后不久即旧病复发，并于10月

31 日凌晨 4 时半，逝世于上海。在黄兴病重期间，孙中山曾殷殷探视；逝世后，又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11 月 1 日，孙署名至函中华革命党各支分部同志：

“黄克强先生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同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凡我同志，谅均知悉” …倪强盛年，禀赋素厚，虽此次讨贼未得比肩致力，而提携奋斗，尚冀诸异日。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谨告同志共鉴察之”。

在孙要求下，北京政府决议为黄兴举行国葬。12 月 22 日孙中山致祭，所送挽联云：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

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孙中山永远怀念这位患难与共的战友。

梁启超师生的猛醒

袁世凯倒行逆施，也促使蔡锷和他的老师梁启超猛醒。

蔡锷（1882—1916），湖南邵阳人，原名良寅，字松坡。幼聪慧，14 岁中秀才。1898 年入长沙时务学堂。该学堂是倡导维新变法的新学校，总教习就是梁启超。是年梁 24 岁，蔡才 16 岁，是学堂 40 多名学生中最年轻的一个。两人的师生情谊便由此开始。

蔡锷入学仅半年就发生了戊戌政变，学堂被解散，只好

跑到武昌想进两湖书院。但因他是时务学堂出身，结果被拒之门外。次年，蔡和十几位同学结伴到日本找老师梁启超。梁租房子和他们住在一起。蔡先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后改入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与唐才常等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事，兵败，幸免于难。蔡仍返日本，他对梁启超说：“今日而言救国，拿枪杆子比拿笔杆子更重要”。遂改名蔡锷，弃文习武，投身去学陆军。

1905年蔡锷以优异成绩毕业，被誉为“士官三杰”之一。时清政府正进行军制改革和建立新军，故蔡一归国，各省督抚争相延揽。他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三省主持军事学堂，尤为广西巡抚李经羲所器重。李升任云贵总督后，调他任云南新军协统。是年他不过20岁出头，一步做到协统，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他辖下的两位标统是丁锦和罗佩金，管带为唐继尧、刘存厚、雷飏、谢汝翼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他发动云南起义与护国战争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爆发后，蔡率新军起义，被推为都督，年仅31岁。他感李经羲知遇之恩，派兵护送其出境。蔡长于军事，治理滇也井井有条，因此大得民心。

但是，蔡锷对袁世凯的统治一开始却存在着幻想，以为唯有袁能统一中国，富国强兵。其政治倾向与乃师梁启超是一致的。所以宋案及“善后”借款风潮发生后，蔡极力为袁作辩护。及二次革命起，便发表通电，声称：“讨袁之名，断难成立”，各地独立“不啻以国家为孤注，以人民为牺牲，谓为叛罪，其又奚辞”。他主张此次为首发难之人，“不能不按法惩治，以为破坏大局者戒”。蔡还积极进兵四川，镇压熊克

武起义。

不过，尽管如此，袁对蔡锷久踞云贵，手握重兵，仍感不放心。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便于1913年9月召蔡入京，任其为政治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并授昭威将军，但真意在就近监视。

由是，蔡与老师复得聚首。他们都勉为其难，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袁政权走上宪政的轨道。梁启超后来回忆说：“于是我们在北京常在一块儿又一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我和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于护国之役的——汤公觉顿，专门研究财政问题，蔡公专门研究军事问题。”

蔡锷的思想受乃师的影响甚大。梁启超的政治主张，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概括便是：“只论政体，不论国体。”他的所谓“国体”，就是指现政权；所谓“政体”，就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梁认为，国体与政体是两回事，只要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都可以接受；反之，则都不能接受。“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的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这是因为政体的变迁为进化常有的现象，而国体的变更则是，一种革命，革命危及国本，绝无益处。他说：“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立论何时皆反对革命。”此话说白了就是：无论在何时，都拥护现政权，只求改良，而反对革命。梁的此种将国体与政体截然分开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形式服从于内容，一种政权采取何种组织形式，与该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是紧密相关的。只论“政体”，不论“国体”，事

情必要弄到事与愿违的地步；而一味主张改良，抵拒革命，也终难逃守旧之讥。但梁是坦率的、他讲的是真话。在晚清，他力主改良，反对革命；在辛亥后，他拥护袁政权，只努力“想带袁世凯上政治轨道”，而反对二次革命，都是符合其思想逻辑的。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1914年底以后，梁自谓“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却并未立即离开他，而是继续苦口婆心，力为劝说。

袁氏帝制阴谋早在1915年初已露端倪。是年1月，袁克定邀梁启超到北京郊外汤山赴宴，梁进屋见仅杨度一人作陪，便觉事有蹊跷。三人先是漫论古今，待酒过数巡，渐入正题。袁克定开门见山说：“近来外间议论纷纷，都说共和制度不合我国国情，不知卓如先生对此有何高见？”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梁没有思想准备，吃了一惊，只好支支吾吾地搪塞说：“我平生只研究政体，而很少涉及国体……”

这天谈话没有结果，克定颇为快快。杨度安慰他说：尽可放心，那个书呆子过去主张君主立宪，今天仍然坚持只论政体，而不管国体，足见他是不会反对帝制的。”

梁是个政治上敏感的人，他宴罢回家，细细玩味克定的话，又联想近年来袁氏的所作所为，便怀疑袁有帝王之思。他不愿卷入漩涡，立即把家小由北京迁往天津租界，本人则回广东探视其父亲。但在离京前，他仍然给袁写了一封“墨与泪俱”、“椎心泣血”的长信，劝袁悬崖勒马，好自为之。他说：“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是

用椎心泣血，进此最后之忠告，明知未必有当高深，然心所谓危而不以闻，则其负大总统也滋甚。见知见罪，惟所命之。”6月底，梁返京，经南京与冯国璋结伴北上，并同谒袁，当面再作劝告。没想到袁力表心迹，并无帝王之思，不仅主动说了他们二人想说的话，而且说得更恳切。结果梁与冯都相信了，满意而退。甚至到7月底，梁还接受袁的任命，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十委员之一，出席宪法起草会议。友人因之批评他，梁回答说，我所以就其职，因为所起草的毕竟是中华民国的宪法草案。足见他“想带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是怎样不遗余力。

至8月中旬，筹安会公开出笼，方令梁蔡二人猛醒。他们看清了袁的真面目，毅然谋与袁决裂。

就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蔡锷即从北京搭晚车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讨袁。梁认为，国民党人都逃亡海外去了，在国内的许多军人文人又多被袁收买，“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完了”。蔡则谓：“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密商的结果是定计文武双管齐下。文的一手，由梁发表一篇文章，反驳筹安会，公开亮出反帝制的旗帜，以制造舆论；武的一手，由蔡回到云南、贵州，招集旧部，举兵讨袁。但这里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西南讨袁军的组织不能等蔡回

到云贵后才着手，须预为策划；二是梁蔡关系，人人皆知，梁文一发表，势必妨碍蔡的行动，当如何应付。最终设定相应的具体办法是：其一，由蔡先派人回云南联络，同时打电报把重要人物叫来，面授机宜。估计这须费3个月的时间；其二，蔡锷须施“苦肉计”，对外要极力造成梁蔡“分家”的样子，以预留地步。由是，二人依计分头而行。

8月底，云南会馆举行将校联谊会，会上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活动。这一天，蔡锷来得最早，第一个提笔在请愿书上签名，以示拥护帝制。随后又连电贵阳护军使刘显世和云南将军唐继尧，催促“响应”筹安会的呼吁，速派代表进京，目的自然是要表明西南无异议。同时，他在京到处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袁党的人问他：“你何以不劝劝自己的先生呢？”他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为了让袁党相信自己沉缅酒色，胸无大志，蔡每天都到八大胡同纵情花柳，征逐歌舞。他喜欢云吉班的小风仙，英雄美女。打得火热。蔡夫人因此很不开心，两人争吵不休。夫妻反目，蔡母帮媳妇责备儿子。蔡又出言顶撞，气得婆媳两人收拾行李干脆回到湖南老家去了。

这一切袁都看在眼里，但对蔡仍不放心。1915年10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北京棉花胡同的蔡宅门口，突然来了一帮士兵，吵吵嚷嚷，为首的刘排长带头闯入蔡宅，高声喊道：“检查！”守门人急忙上前阻拦：“放肆！这里是蔡将军的公馆，检查什么；给我出去！”不料这位刘排长来头更大，他一巴掌就将守门的推倒在地。“管你什么菜将军饭将军的，我们

是奉命搜查！弟兄们快动手！”这帮兵痞一拥而入，在各房间翻箱倒柜，却一无所获，最后只好悻悻然而去。

时蔡锷刚刚起床，他知道这些人是袁的特务机关派来的，并不出面阻拦。等他们走后，蔡立即给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打电话，质问他派兵搜查本宅是何用心。对方佯装不知道：“真有此等事？岂有此理！一定是误会了，一定是误会了……”

后来雷又当面向蔡作解释，自然是越描越黑。实际上刘排长等人是袁派来搜查电报密码本的。但他们来晚了一步，蔡早在一周前就已将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藏在老师梁启超的卧房里了。

袁因此次搜查一无所获，多少放心了，也就放松了对蔡的监视。这自然大有利于梁启超师生继续推进他们的秘密计划。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梁启超事后曾说：“我们两人讨贼所用的武器，各各不同。蔡公靠的是枪，我靠的是笔。”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长达1.3万余字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他以笔为武器，按预定计划向袁氏及其党徒发出的一记重炮。它成为当时反对帝制活动的一篇著名的檄文，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但论政体，不问国体”，仍是梁文立论的基础。“故鄙人

生平待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此种理论本身虽不科学，但梁据以反对筹安会诸子鼓吹改变共和国体的谬说，却具有极大的鲜明性和很强的逻辑力量。尤其梁在晚清曾是著名的君主立宪派，现在由他挺身而出为共和作辩护，自然又别具魅力。梁指出，自己在晚清力主稳定国体，故反对共和革命，人不能听，国体终变；但曾几何时，共和初建，胡瑛、李燮和、刘师培这些原是共和的元勋却力倡推翻共和，倒是像自己这样畴昔反对共和之人，犹留恋于共和，这岂非可悲的怪事！他认为在不同的国体下，坚持同样的政治信条，体现了政治家的操守；相反，倒是为求一时的利禄，而牺牲其平生的政治主张的人，无气节。梁文开宗明义，便指明了筹安会诸人墮行丧志的本质，使他们在舆论面前，无地自容。

梁文集中驳斥了筹安会诸子的两大谬说。

其一，筹安会诸子极力诋毁共和，进而强词夺理提出这样的论点：“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梁的反驳是巧妙的，他不作正面批判，而是借排除法将对手逼人窘境。他说，今日欲为君主立宪，谁人可为理想的君主？今大总统屡次宣言不肯帝制自为，自当别求他人，但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即便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其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冲，危险又当何似？所以，于今大总统之外别求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退一步说，大总统肯徇民望，出为君主，但我国民寄厚望于总统，岂容将如此重要人物投诸无

责任的君主如此闲散之地？而且即便总统肯为君主，君主立宪也是不可能成立的。前清末叶，自谓立宪，却无人承认；请问筹安会诸子，你们有何根据，敢担保复辟帝制之后，不会变成假立宪真专制？

其二，筹安会诸子主张变更国体最重要的借口，是强调“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不若帝制万世一系来的稳定”。梁启超反驳说，《大总统选举法》实已让大总统成为终身制，因之，只要大总统健在，并无危险。至于大总统身后能否致乱，决定于今大总统在任期内能否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团结人心，而与国体为共和或为君主，并无关系。且举例说，波斯、土耳其、俄罗斯不都是君主国吗？它们并无选举总统之事，何以近些年来也内乱不已呢？必谓共和招乱，君主致治，谁人肯信！

如果说，梁上述依据“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的理论进行的驳论，还多表现机智；那么，他正告时人，君主既经淘汰，不可规复，则是显示了一种可贵的历史洞察力。梁认为，在历史上君主所以能保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实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于无形中形成的效力作用的结果。君主的尊严一旦遭到亵渎，其神圣的灵光在人们的心中定然消失，无以恢复。中国共和之日虽然尚浅，但其酝酿已历十多年之久，建立民国也已四年，此间民权自由之说，风行天下，所谓君主的尊严，恰似抛人粪坑的神像的灵光，早已扫地以尽，现在还想恢复昔之君主，岂非白日做梦！

梁指斥筹安会诸子“在共和国体之下”，竟敢“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兴妖作怪，淆民视听，当坚决绳

之以法。

梁文表面上是在驳斥筹安会，实则矛头指向袁世凯，只是采取的手法是讽刺，明褒而暗斥。他说，“今大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近年来复辟之说屡兴，大总统一再辟谣，义形于色。当着鄙人和冯国璋将军的面，大总统就曾明确表示过已在英国伦敦购有寓所，若国人逼其帝制自为过甚，就要到英国当寓公去。筹安会诸子难道漫无所闻，定要逼我大总统愤践前言，将置国家于何地！如其不然，筹安会诏子一定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大总统无非说的是假话。这不是对我大总统最大的侮辱吗？梁启超说：“信义如是也，则公等将视我大总统为何人？食言而肥，匹夫贼之没念及此，则侮辱大总统人格之罪，又岂擢发叮数？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这与其说是在斥杨度诸人，勿宁说是在给袁难堪！梁文引人共鸣，而袁党一时又无可奈何，原因也正在于此。

梁是在心情十分激愤的情况下，一气呵成此文的。1915年8月22日，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谈到撰成此文，并说：“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城出没，除非灭夺吾气，使不复能属文耳”。表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当时袁对梁的动向极为关注，此文草成之后，袁即有所闻，便派人送20万块钱和几件礼物给梁，说是送给梁的父亲寿礼。梁认为袁太看不起人了，自以为什么人都可以拿钱收买，正欲发作，忽想到须以讨袁大局为重，不可因小失大，因此隐忍不发，最后婉词谢绝，把20万块钱退回，别的礼物收他两件。同时又将该文交来人转呈袁。送礼的人只好垂头丧气而去。不久，袁又遣人

来，传话给梁启超，威胁说：“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并不示弱，也让来人传话袁：“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者唯唯而退。

同时，就在筹安会宣言发表的次日，进步党人徐佛苏、袁思亮二人同去问杨度：“如此国家大事，为何不让任公参加？”于是杨度找与梁相善的汤觉顿、蹇念益二人，让他们去天津找梁协商。汤、蹇二人见梁，尚未开口，梁先拿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让他们先看一遍。二人看了文章，吓得变了颜色，说：“此文一发表，进步党就完了，咱们进步党人的安全也成了问题。”梁回答说：“这些我知道。可是，前些天袁派人来，送我财礼。事情到了这一步，此文若不发表，别人就会疑心我受了袁的收买，我已骑虎不得不下背了。”

二人以为文章即使发表，也应留有余地，因为袁毕竟尚未正式表示接受帝位，先不必把话说绝。梁于是提笔删去了以下激烈的措词：复辟帝制“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同时，又加上了一段话：“……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夫果未熟而摘之，实伤其根，孕未满而催之，实戕其母。吾畴营所言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万一以非时之故，而从兹一蹶，则倡论之人，虽九死何以谢天下。愿公等慎思之！”经此一增删，梁的主张变成了似乎反对的不是帝制，而是在条件未成熟之前做皇帝了。

不过，尽管如此，梁文对袁党来说仍然是可怕的、杨度知道后赶忙到天津劝梁毁其文。梁不允，并怒斥杨度无耻，杨只好面赤而退、梁随后又写了一封信给杨度说：“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杨度仍不死心，又让蔡锷赶紧去天津劝其老师不要发表这篇文章。蔡锷当天即回来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梁文终在京沪各报发表，全国舆论哗然，推动了反对帝制的高潮迅速到来。袁十分恼火，让杨度四处拉人写文章反驳梁的论点。袁党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曾悬赏3000元登报征文，但如此重赏，却无人应征。袁希望名望足与梁匹敌的严复出来写文章，让夏寿日携4000元去找严复。但严复以“近来哮喘发作，不能作文”为由，拒绝了。袁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想让黄远庸出力。黄是有学识有操守的著名记者与律师，在京交往甚广，与梁启超等最投契。其文章言论，隽永而中肯綮，倾动一时，袁本人亦甚钦佩。不料，黄也拒绝收买。袁一时不便对梁下手，便迁怒于黄。黄无以自卫，只好高蹈远引，赴美避祸。袁氏闻之，尤衔恨入骨，派杀手尾随。黄至旧金山甫登岸，杀手即起狙击。这位近代才华横溢的名记者，终于倒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但是，袁费尽心机，终无法消除梁文的巨大影响。同时，更令其心悸的是，梁的学生蔡锷竟在自己的眼皮下溜走了。

蔡锷一去不复返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后，袁世凯自然加紧了对其师生的监视。但梁蔡却不能不常常会面，蔡每星期都要跑一趟天津。为避免袁党注意，二人在一起便打牌吃花酒，做成很腐败的样子、几个月过后，袁世凯看着这两个人似乎也真没有什么可怕了。

实则，梁启超师生的讨袁策划正积极进行。1915年10月间应蔡电召，刚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戡和王伯群一同到京。他们成为蔡与云贵将领联系的重要居间人。梁、蔡、戴在天津梁寓所共商讨袁计划，议定云南于袁氏下令接受帝位后立即独立，贵州当在一个月后响应，广西则在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蔡派王伯群先期回昆明，他和戴戡、陈敬铭各着大礼服合影，留作“不成功即成仁”的纪念。

与此同时，蔡锷与黄兴、李烈钧等原国民党人也取得了联系。

当时蔡带头签名拥护帝制的真意，只有他的士官同学蒋百里一人知道。蔡住西城棉花胡同，蒋住东城锡拉胡同，两人常相过往，密商大事。筹安会成立后，黄兴正是通过蒋百里从美国寄一封密信给蔡，劝他早日脱离虎口，返回云南组织讨袁军。并告诉他拟派张孝准掩护他安全出险。张孝准是

黄兴在东京的代理人，同时也是蔡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

蔡锷由北京走脱，是护国战争中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但其具体情节，记载不一。

一种说法是：蔡从10月下旬起，便常常称病不去办公，一天利用和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偷偷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派老家人曹福买了两张三等票，早已等候在那里，直到蔡上了车，曹才偷偷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的手里。两人在车上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平安抵达天津。

第二种说法是：蔡锷往哈章家为其父母祝寿，大家玩麻将，通宵达旦。清晨7时许，蔡由哈家侧门出，直入新华宫。袁派的监视人员同样一夜未合眼，见蔡拖着疲惫的步子入宫，心想不会有变，便在门口的传达室小寐。蔡在办公室稍作停留，见监视人员都已入梦乡，便自政事堂出西侧门，装扮成人力车夫，直奔火车站，买了张三等车票，登车逃出北京。

第三种说法是：蔡锷在长安酒楼与友人饮，召小凤仙作陪。酒酣耳热，蔡忽然大呼腹痛，离席入厕。客人见蔡久不归，以为醉酒返家，并不介意。至天明，监视人员发现蔡没有回家，也不在小凤仙处，才知道蔡行金蝉脱壳之计，早已搭夜车去了天津。

究竟哪种说法准确，因当事人并无说明，已难考定。总之，蔡锷巧施计谋，摆脱了袁的控制，顺利地逃到了天津，并住进了一家日本医院。他以养病为由电请袁辞去各项职务。袁派蒋百里到津劝他回去。蒋与蔡密谈了一夜，他回去报告袁说：“松坡不知去向，在津未曾找到。”

这时张孝准也已由日本到了天津。蔡张见面后，商定由

张先回神户布置一切，蔡稍后即到。

蔡锷去向他的老师梁启超告别。临分手的时候，彼此约定两句话：“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师生握别，壮怀激烈。

蔡于12月2日晚易和服变姓名，搭乘日本商轮山东丸赴日。他用十分恭顺的口气写信向袁请假，说东渡就医，不久即回北京。他把随身携带的文凭、勋章和证件都交给张孝准保存，同时预先写好一些明信片，报告他在日本游山玩水的情况，请张孝准旅行各地，每到一处即发出一张明信片，以示本人并未离开日本。实则蔡甫抵神户，即日转乘日轮经上海、香港直奔云南去了。

袁得知蔡锷未经批准擅自到日本去，十分恼火。但因鞭长莫及，只好假惺惺地在蔡的呈文批示“准假”，并希望他早日痊愈，返京复任。

梁启超为了掩护蔡出走，没有马上离开天津寓所。他与蔡约定，大约在蔡到达云南的时候，他便到上海。所以蔡走后10天，梁才悄悄地搭船往大连，由大连转上海。临行前与夫人道别，把事情的真实告诉她。他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后来梁启超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她拿许多壮烈的话鼓励我勇气，‘但我向来出门、我夫人没有送过我，这回是晚上三点钟，她送我到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想。’应当说，其时梁启超为了讨贼，舍家报国，甘冒万死而不辞，确实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精神。

袁派去监视的特务，头一回放跑了蔡锷，第二回又放跑

了梁启超。令袁大为震怒，据说后来都被枪毙了。及云南护国军起，袁才恍然大悟，所谓梁蔡师生“分家”，所谓蔡锷带头签名拥护帝制，沉缅酒色，夫妻反目，以及所谓渡日求医，游日各处所发的明信片，原来都是梁蔡师生一手导演的连轴大戏。袁气极了，他说：“自己一世做人聪明伶俐，不料这回被梁启超、蔡锷装在鼓子里头了。”

蔡锷与云南独立

云南能成为讨袁力量的基地，除了地处边陲，袁的势力鞭长莫及，以及原有 1.8 万余人的两师陆军装备较为精良等有利条件外，主要还在于云南军队的思想素质好。其中下级军官多是留日士官生和讲武学堂的学生，本具民主素养，经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革命思想更为高扬。云南武备学堂是由原国民党人李根源创办的，他曾邀请同学李烈钧、方声涛等来此任职。而云南当时的几个主要当权者，如唐继尧、罗佩金等人原来都是同盟会员或者是有革命倾向的人。故云南与革命党关系甚深。正因为云南有上述的各种有利条件，孙黄革命党人和梁启超进步党人不约而同，都奔集于此。云南护国军揭竿而起，说到底，是两派力量推动的结果。

在蔡锷到达云南之前，这里上下跃跃欲试，已是一派大好的讨袁形势。

孙中山先已派吕志伊在滇发展中华革命党力量，筹安会成立后又电催李烈钧设法入滇。时李寓新加坡，他派方声涛

先行探察。方入昆明，隐居在教官黄箴成的家里。原武备学堂的学生多来探视，得知李烈钧将来滇组织讨袁，无不摩拳擦掌，表示誓死讨贼。到9月底方离滇去沪时，滇军中下级军官的讨袁躁动已无可抑止。时云南将军唐继尧担心敌我力量悬殊，对讨袁一事刀：始迟疑不决，后见大势所趋，态度才逐渐明朗起来。

1915年12月中旬，李烈钧经河内入滇，但在河口海关受阻。他手拟一电给席继尧，说：“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电。”翌晨，唐复电表示欢迎，并派其弟唐继虞迎李入昆明。唐，李以及罗佩金等人，由是加紧商议起兵计划。

袁发现云南不稳，令其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与此同时，唐等也得知蔡锷已离京，特派邓泰中密赴港、沪一带探寻踪迹，但未能相遇。倒是受遣赴京探听虚实的刘云峰，无意中在香港邂逅了蔡锷。刘告蔡赴京的任务，蔡说：“你的任务，我已代你调查清楚了。冯，段对袁此举均不赞成。段在团城拘留，不能见客。冯在南京不敢多言。你去不但无益，反恐有险。咱们一同回去预备打仗吧。”刘答应了，遂与蔡锷及戴勘等一行人，同回云南。

时袁正密切注视蔡的行踪，他于蔡入滇的必经之路，广布特务。蔡经滇越铁路前往昆明，中经阿迷州（今云南省蒙自县）。蒙自尹周沆与阿迷州知事张一鯤便是袁的死党。二人得袁密令试图刺杀蔡锷。由于唐继尧事先加派军警严加防范，周、张的阴谋未能得逞。11月19日蔡锷安抵昆明。

蔡的到来使云南人心愈加振奋。时后继尧感到敌我力量

悬殊，仍心存疑虑，蔡纵论大势，极力鼓励他说，袁称帝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就是北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也不赞成。恰在这时，秘书送来了梁启超的一封密电。电报是由南京宣武将军冯国璋的军署打来的。电报请“唐将军”转“蔡将军”。内容讲袁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特使，准备以卖国条件交换日本承认帝制。这个电报正好印证了蔡关于冯段也反对帝制的说法，因为理由很简单，若冯不反袁，他就不会代梁发出这份反袁的电报了。这电报消除了唐的顾虑。其实这份电报的发出，冯本人并不知情，是其秘书胡嗣暖所为。胡贵州人，逊清翰林，他主清室复辟，反对袁帝制自为，故乐于替梁代发此密电。唐见密电最终坚定了讨袁的决心，这也是历史上的偶然性有时也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生动事例。

12月对日后继尧在私邸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欢迎蔡锷与李烈钧。蔡首先应邀起立发表了沉痛感人的演说，号召义无反顾，兴师讨贼。他说，“我们所争的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李烈钧等接着演讲，同样慷慨激昂。次日夜，唐复集文武要员30余人歃血宣誓，决议兴师起义。众人商定的方略是：先礼后兵，即首先通电劝袁取消帝制，若袁拒不接受，再通电讨袁。

23日，将军后继尧、巡按使任可澄联名致电袁世凯，指斥他“食言背誓，何以御民”，要求立即取消帝制，并将筹安会“六君子”及朱启铃、梁上诒、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通电限袁在24小时内答复。

袁接到此电后，故意装聋作哑。他心想，当初国民党闹

二次革命，有4省响应，都不难一举荡平，今云南一省作乱，充其量不过是小丑跳梁，要镇压易如反掌。只是这时袁还不想动武，怕揽了自己的帝王春梦。他托英使朱尔典电嘱滇省英领事劝解唐继尧，表示“若能杀蔡，即封亲王”，并由汇丰银行汇款300万元酬劳。与此同时，他又让政事堂出面给云南复电，先列举唐以前劝进的各电，然后说：“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以示不予重视。

对此，唐、任均置之不理。25日，唐、任、蔡、李、戴等联名通电，宣告云南独立。这个电报不再称袁为总统，而径斥之为“袁逆”，并明确指出，袁帝制自为，“既为背逆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国人应同申义愤，击鼓以攻之。

27日，唐亲至省议会开国民大会，宣布云南独立。消息传开，昆明“各界人民欢呼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袁逆，拥护共和口号，至夜乃息”。

云南独立后，即成立军政府。先是有人提议定讨袁军为共和军，后为避免与共和党相淆，众议改称“护国军”。大家推蔡、唐于都督、总司令各任其一。蔡唐互相推辞。蔡最后这样说：“此次孤军犯险，惟当引起全国同情，以求多助，惟虞身为地方大吏，如果率师出征，易启侵略之嫌，往岁援川已有猜疑，今再自出，必为袁逆挑拨，中其反间。”蔡情词诚挚，以至泣下。众人大受感动，鼓掌表示赞同。至此，唐始勉从公议。最终定后为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与此同时，军政府发布檄

文，历数袁 19 条罪状。

云南独立的消息传到北京，袁坐不住了。25 日当天，他即召开国务会议商量对策。他在会上埋怨说：“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予为之。”意思是说，都是你们逼我称帝，现在出事了，你们看怎么办吧！时“众默然”。

这回袁不便再装聋作哑了，决定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下令褫夺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的官爵，并派云南第一师师长张家贞代理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巡按使，令他们就近将唐、任押解进京。

袁自然最恨蔡锷。政事堂通令各部署，凡与蔡有关的人一律撤职，在各省中和蔡有关的人也都撤职。不仅如此，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蔡的旧属也都受到了迫害。袁还命湖南当局查抄蔡锷在原籍的家产。可是，蔡虽声名远播，却家无恒产。蔡母和妻子事先已避走，唯余下一个开木器厂的兄弟，但和蔡已分了家。蔡本人只在杨度办的华昌公司有少许股份，于是就把他的股份没收。

袁惯耍软硬兼施的手法。他一面对蔡等人取强硬态度，同时暗中又想软化对方。他知道蔡感李经羲的知遇之恩，对后者十分尊重，便赐李一袭貂裘，打算在必要时请李往云南一行，劝解蔡锷来归。李虽表谢意，但言不及义。

熊希龄是蔡的好友，任国务总理时曾力保蔡为湖南都督。1916 年 1 月中，袁也把这位久被自己冷落的前总理请进京来，共进午餐。他希望熊能到云南走一趟，说服蔡“悔罪自投”，自己保证“不究既往”。熊是湖南凤凰人，此次进京人

称”有凤来仪”，兴许是洪宪新朝的吉兆。岂知熊于2月初南下后，竟一去不返，而云南讨袁烽火却迅速地蔓延开来。

一枕黄粱梦

云南独立后，护国军分道而行：蔡锷率第一军分三路向四川、贵州进发；李烈钧率第二军向广西挺进；唐继尧以都督兼领第三军留守云南。由是，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护国军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当护国军由昆明出发时，社会各界及青年学生数千人齐集状元楼热烈送行。行军所至，沿途群众纷纷给部队送水及食物。朱德说，护国军出发，“自滇以达蜀地，无不箪食而迎”。正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支持，护国军士气高昂。

护国军既定的出师计划是，以四川为进取中原幽燕的要道，辟为主战场。以第一军蔡锷率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出永宁，取泸州，为中路主军；以第一梯团刘云峰部出昭通，取叙州，为左军；以戴勘率部入黔，策动贵州独立后，以滇黔联军出松坎，攻綦江，取重庆，为右翼。李烈钧率第二军入桂，意在扩展势力范围，相机进取。

袁世凯对付云南护国军的战略部署，则是试图取四川、贵州、广西三路进攻。

护国军与北洋军在川南展开激战。由于护国军兵力单薄，饷械两难，讨袁战争进行得十分艰苦。3月中旬，广西将军陆荣廷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宣布独立，为艰苦的护国战争开

辟了新的局面。广西独立的消息传到四川，护国军士气倍增，迅速发起反攻，迫使北洋军节节后退。所以梁启超说：“当时西军成败，间不容发，广西独立，兹役最重要之枢纽也。”

与此同时，护国军全力东向，最终迫使广东将军龙济光也不得不宣布独立。护国军因之得以于5月1日在肇庆设立两广都司令部，举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政，李根源为副都参政，协同两广军事行动。并进而于5月8日在肇庆宣告成立护国军中央机构——军务院，以代行北京国务院的职权。推后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并代理抚军长。推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等为抚军。这样实际建立起了与袁政权对峙的南方权力中心。4月12日，浙江也告独立。至此，护国战争终由云南一隅星星之火，燃成包括滇黔桂粤浙5省的燎原之势，并有力推动着全国讨袁斗争的高涨。

护国军的胜利进军，无情地击破了袁世凯的帝王春梦。

袁本以为滇乱不足平，但没想到前方频频告急，人心浮动。徐世昌驰书袁，主张取消帝制，以息众怒，袁不能听。肃政史庄蕴宽也公然移文国务卿，同样要求取消帝制。袁大怒，庄却已挂冠而去。不少官吏见状纷纷出京，袁只好下令严禁官吏请假出京。

袁本打算于1916年元旦登极改元，但干戈扰扰，人心惶惑，加之各国使馆退还改元公文，只得将登极一再展期，到2月下旬，更明令暂缓登极。其令说，国人屡请早登大位，但现值“滇粤倡乱”，犹惊阊阖，若“遽正大位，何以自安”？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所谓“痛念吾

民，难安寝馈”，因而决意暂缓登极，是假话；实际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同时，袁只是说“从缓办理”，并无意取消帝制。

袁以为作此姿态，即可缓和讨袁声浪；事实正相反，随着广西独立，护国战争的声威愈加扩大。而袁明令延缓登极，其色厉内荏，也就愈为心怀异志的两员大将，即段祺瑞与冯国璋所窥破。段冯因不赞成帝制，久为袁所忌。段虽主持陆军部，但因袁对北洋军不完全信任，拟筹建模范团，又学他练新军那样练一支新军即御林军，由袁克定负责，将段祺瑞架空。1915年5月段愤而辞职，躲到香山“养病”。袁先是挽留，后于8月底便正式免去了段陆军总长的职务。袁段已势难两立。不过段在京，又被夺了军权，一时难得作为。冯国璋亲耳听袁说不称帝，不久又称帝而不满。他坐镇东南，拥兵自重，观察风向，便不能不有所动作。

辛亥革命时，袁在党人与清廷间取巧坐大的历史经验，冯国璋记忆犹新。所以袁要他挂帅征滇，他不干，却暗中与北方军和南方实力派人物保持联系，企图在南北对峙中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等到广西独立，讨袁声浪日高，冯断定袁前途必不妙，便给北洋诸将发去一封密电，建议联名通电，压迫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萝铭很快复电表示赞同。冯以为包括自己在内仅5位将军，声势不够，乃用5人名义密电征求全国各省将军的同意，以造成大势所趋的声威，不怕袁不就范。

没想到直隶将军朱家宝对袁忠心耿耿，他在接到冯的密

电后，立刻把它交给袁看。当时袁正为广西独立焦灼不安，接读电文，惶骇异常，只觉天旋地转，差点没有晕过去。他万万没想到，在关键时刻自己的部将会这样背叛自己。他重重地跌在椅子上，神色凄惶地对身边的夏寿田说：“一切都完了，完了。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第一次是文忠（李鸿章）去世，这次大约要转到我了。”他喋喋不休，又谈到袁家先辈多没有活过 59 岁的，自己已经 58 岁了，怕气数已尽，也过不了 59 岁……

袁自觉心力交瘁，他找来谋士杨士琦问计。杨以为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只可用和平的方式，否则难以平息护国运动，而欲和平，又须先取消帝制。袁老友徐世昌也再次提出忠告，强调“即今犹可转圜”，否则，事无可为。但这遭到了袁克定“太子党”的坚决反对。克定急于当皇太子，将来继承皇位，所以极力怂恿袁复辟帝制。为了坚其父之心，他甚至伪造有影响的《顺天时报》，天天送给袁看，使袁愈加相信复辟帝制为众望所归。后袁无意中发现克定作假，勃然大怒，将他痛打了一顿，骂他“欺父误国”。这说明克定较其父更加利令智昏。现在克定又抓住袁的心理，提出以下理由：“不当皇帝，可以，总统的地位总要保持的吧？可现在西南各省以独立相要挟，要求取消帝制；有谁能保证一旦取消帝制后，他们不会继续要求取消总统的地位呢？总之，得步进步，无已时也。一步走错，全盘瓦解，不可不慎重。”袁听了颇动容。杨士琦以为不必如此过虑，如果护国军逼人太甚，则我直彼曲，就会激起北洋官兵的同仇敌忾，到那时候就不难团结北洋系与之一战了。

究竟计将安出？不顾全国日益高昂的讨袁声浪，坚持帝制是不可能的了，但要宣布取消帝制，这对袁来说，却是十分痛苦的选择。

黄袍加身，登极做皇帝，是袁多年的梦想。为此，他费了多少心机，耍了多少手腕，扳倒了多少政敌，费了多少钱财，才迎来了万民的“推戴”，同时又给他的妻妾儿女带来多少荣耀。眼看洪宪王朝即将建立，梦想成真，他曾是多么的兴奋。他与他的家人，已完全进入“帝王”、“嫔、妃、太子、公主”的角色。

所以，在袁看来，宣布取消帝制，使洪宪新朝功亏一篑，无异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令自己多年的心机枉费。要下这个决心，谈何容易！一次在饭桌上，几位姨太太为争名份又吵起来，喋喋不休，袁把筷子一撂，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饭也不吃，走了。足见其内心的苦楚。

袁最终决定取消帝制，固然是迫于国内的情势，但列强尤其是日本对帝制态度的改变，也是重要原因。

列强。原多赞成帝制，后因欧战爆发，英法诸国无暇东顾，不愿看到中国因帝制引起内乱，危及自己的在华利益，故一再劝袁暂缓帝制。1915年12月中，日英俄意法5国又联合提出警告，但袁急欲过其帝王瘾，并未置理。袁知道，虽是5国联合，领头的是日本。他为获得日本支持，决心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日本承认帝制的交换条件。得日本承诺后，遂以祝贺日皇即位大典名义，派周自齐为特使，拟于12月17日启行，而随员先已出发。日公使特于14

日晚宴请周等，席间且表示了日本政府十分欢迎之意。孰料，16日，日本公使却通知外交部说，奉本国政府训令，不便接待中国特使，请延期启行。日本的忽然变卦，主要原因是侦知袁的统治不稳，帝制必无善果。但日本这一手却使袁威信丧尽。时梁士诒叹息说：“（周自齐）不能去，帝制不成矣！”及滇黔护国军起，日本又提出警告。袁又探悉日本正与包括宗社党在内的各种反对派联络，始知日本存心捣乱，大上其当。国内外情势既变化如此，袁不得不承认帝制无望了。

3月21日，袁请来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开会密议。大家都不肯发言。袁只好打肿脸充胖子说：“取消了帝制，则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如果仍然不肯罢兵，那就是诚心作乱，我们只好再用兵了。”徐段等都表示赞成。但应召入京的安徽将军倪嗣冲却站起来表示反对，他自称“臣”，要求为“圣主”效力，自愿去打护国军。袁将朱家宝转来的五将军通电递给倪，苦笑着说：“你看看这个。”倪看完，顿然张口结舌，颓然而退。

22日，袁召张入见。袁见张，神色黯然，说：“都是我糊涂，当初没能听你的劝告，才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今天的命令，非你来起草不可。”说着把王式通的原稿交张参考，并谓，应明令取消帝制，且将推戴书焚毁。张有所不忍，因之对曰：“此事都坏在小人的身上。”袁说：“这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别人。”

同日，宣布申令撤销帝制案。洪宪帝制的丑剧至此落幕。

袁自接受帝位到宣布撤销帝制，总共只做了83天的皇帝，恰似“一枕黄粱”。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袁世凯不愧为乱世奸雄，其不顾廉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非常人所能及。他虽宣布撤销帝制案，同时却转过身来，试图重新把持总统的职权。

袁发布的撤销帝制令就包藏祸心。它不仅把“主张帝制者”说成是“图巩固基”的“爱国者”，而且把自己说成是始终认为帝制“不合事宜”，但为遵从民意不得不牺牲自我的正人君子。它最后有这样一段话：“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脊而不顾也。”袁自以为撤销了帝制，便可解决一切问题，过去种种，一笔勾销。皇帝我不做了，但我还是总统；不称“予”了，改过来，复称“本大总统”。有人评论得很形象：“袁视帝制的承认与撤销，易如反掌，大有三尺儿童，善捡便宜，不论输赢，横竖由我吃糖的架势。”

袁任徐世昌为国务卿，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并废止洪宪年号，仍恢复本年为民国五年。3月25日以徐、段及黎元洪的名义致电唐继尧、蔡锷等，说：“帝制销，公等目的已达，务先弭干戈，共图善后。”接着，徐于28日又通电独立各省征求意见。而与此同时，政事堂通电未独立各省说：“蔡锷已承认元首仍居大总统之地位”，极力散布西南愿意和谈的空气。这些动作的目的都在于力求和平转圜，以维持袁的总统

地位。

袁企图继续把持权力，这激起了全国舆论的哗然。一些社会团体和名流，纷纷通电指斥袁无耻之尤，大声疾呼“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必须以强力迫使袁退位，决不能养痍遗患。

17 省国会议员通电称，袁复辟帝制，背叛民国，不仅已失元首资格；且成国民罪人。“袁氏一日不除，即国家一日不安。”今袁企图调停，无非想东山再起，为清乱源，永绝后患，“断不取一时姑容”。留日学生也发出通电，反对和谈、要求除恶务尽，“迫袁解职，置之刑典”。华侨联合会的通电同样强调袁已失总统资格，“人民已不公认”，必须退位，“以免辱国殃民”。

袁的故旧则径直致电驰函，讽其自退。唐绍仪自民初被袁赶下台后，寓上海，隐于商，不间政治。这时他致电袁说，既撤销帝制，却仍要顶在总统的位子上不走，“在执事之言，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成以为廉耻道丧，为中外历史所无”。电报既呼“先生”，又称“执事”，讽刺辛辣，心中数年郁积的怨气，一吐为快。

康有为的电文称袁为“老弟”，指斥他帝制自为，丧权辱国，背信弃义，“故致天怒人怨”。提醒他人心已失，想通过和谈，“退保总统之位”，已不可得；惟有自行退位，可贷一死。康有为自戊戌政变以来的不平之气，也算为之一舒。

袁退位与否固然成了时论的焦点，但西南护国军的态度又具有决定性意义。与之关系密切的进步党和革命党人，都急谋阻止护国军妥协。

袁宣布取消帝制并谋与西南妥协之时，梁启超正行抵龙州，尚未到南宁与陆荣廷晤面。他担心陆动摇，于3月28日先致电陆之长子慎堂，告他“对北京断无调停之余地”。29日又致电陆荣廷，晓陈利害，要求他“持以毅力，善始善终”。孙中山也致电滇黔桂诸省，主张讨袁到底。他说：“袁逆恋栈负隅，意犹叵测，际兹时局，一发千钧……吾人志在锄奸，高集群力，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道者生息于国内。”

西南护国军受全国舆论的鼓舞，讨袁立场愈加坚定。4月中，护国军向北京政府提出6条：

- 一、袁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门；
- 二、诛附逆的杨度、段芝贵等13人以谢天下；
- 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约6000万，应抄没袁及附逆的13人家产赔偿之；
- 四、剥夺袁子孙三世公民权；
- 五、袁退位后，按民元的法，推黎元洪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 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照旧供职，但军队驻扎地点，须听护国军都督的指挥。

显然，提出这样的条件，与其说是和谈，勿宁说是最后通牒。想在南北斡旋的徐世昌见事不可为，便于4月22日辞去国务卿，回河南辉县水竹村隐居去了。袁无奈，只好发表段祺瑞为国务卿，但段要求：将政事堂改为真正的责任内阁，宣称若无实权，他就不干。袁于5月8日不得不下令废政事堂，恢复国务院。不过袁是不会轻易放权的，国务院是恢复

了，责任内阁则徒托空言。与此同时，袁仿照辛亥年的作法，让四川将军陈定先与蔡锷实现局部停战，全局的和谈则请冯国璋出面主持。这便给怀有政治野心的冯创造了条件。

冯主张召集未独立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借口是先协调北洋集团内部的步调，以加强与西南谈判的地位。但其真实的目的，是想仿效辛亥年各省代表齐集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参议院，选出临时总统，然后召集国会产生正式总统。他认为，作为东道主和盟主，自己是很有希望被推举为临时总统的，且自己作了临时总统，袁不倒自倒，护国军兵不刃血，就取得了讨袁最后胜利，他们何乐而不为呢？为此，他拟提出惩办祸首，大赦党人等条件，以拉拢护国军和国民党。

冯本想拉张勋、倪嗣冲一道行动，不料张意在复辟清室，在复辟条件未成熟前，他宁可暂时保存袁的总统地位以为过渡，故其对冯的想法不感兴趣。倪忠于袁，自然更不为所动，冯无奈，遂于5月1日通电提出8条主张，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承认袁暂时留任，俟国会成立即辞职，另举大总统，行责任内阁；二是军队各回原地，军政官吏一仍其旧。前者径直否定了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总统的可能性，显然是为自己出任总统预留地步；而后者则无异于取消护国军。冯因不赞成帝制，曾一度获得好名声，现在许多人都看清了他的政治野心，众起而攻之。旅沪22省公民代表，包括唐绍仪、谭延闿、汤化龙、谷钟秀等名流在内，共1.39万人，由唐绍仪领衔通电反驳冯的8条主张，指斥他“名为保袁，阴实自重，狡谋益彰，无可掩饰”。

冯陷于窘境。5月初他到蚌埠邀请倪嗣冲到徐州，与张

勋3人联名发起召集南京会议，电请未独立各省派代表出席。

袁对冯的政治野心自然是知道的。他同意冯召集南京会议，有更深的考虑。

冯班门弄斧，想仿效辛亥故事，在南京召集国会，窃取总统职位，如何瞒得过袁。5月11日袁电冯张倪三人说，自己自退隐田园，无心问世，后因时势所迫，出任国事，而心长识短，早存退志。现在唐继尧等以退位为要求，正获我心。“自己决无贪恋权位之意”，只是撒手即去，听国危亡，非我救国本愿，“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现将军既集各省代表会议，讨论大计，不胜欣慰。“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负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一致立见倾复，幸盼易极！”

原来，袁是将计就计，他一面冠冕堂皇地把退位问题交南京会议讨论，同时却通过操纵和破坏会议，达到拖延时日、赢得时间重新布置用兵的目的。

冯、张、倪虽联合发起召集南京会议，但同床异梦。冯想利用这次会议培植自己的势力；张想做盟主，为清室复辟张目；倪则忠于洪宪王朝。袁看得清楚，他极力利用冯、张、倪矛盾，从中操纵。他派张镇芳、阮忠枢到徐州拉拢张，又派蒋雁行列席南京会议，以便监督。

5月18日南京会议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除西南外各省区代表20多人。在第一天会议上，山东代表丁世峰得冯暗中支持，提出了袁须退位的建议。湖南代表附议，其他省代表也没有反对的。一时退位问题占了上风。不料，当晚倪嗣冲带三营卫队到达南京，形势遂为之一变。次日开会，倪抢

先发言，力主保持袁总统地位。丁世峰站起来反对，其他代表也多附和。倪勃然大怒，质问丁：“你是不是靳云鹏将军的代表，靳将军是拥护中央的，你为什么私通南方？”其他人替丁解释说：“不是不拥护中央，而是君子爱人以德，也是为了袁大总统。”倪气得脸色铁青。冯担任主席，见状赶紧把话岔开，将会议议题转到“能战始能和”问题上去。加上张勋代表万拭绳也站在倪一边，其他人便不敢再发言。退位问题遂不作结论。但于备战一节，各省代表多闪烁其词，不肯承担责任，结果也无下文。

20日举行第三次会议，冯首先声明，“关于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应召集国会来讨论决定”。代表们一致同意，可又提不出召集国会的办法来。经过后两天的会议，通过了吐峰的提议，电邀西南独立各省代表来参加南京会议，解决总统问题。

张、倪坚决反对与西南五省代表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二人联名发出通电，歪曲会议的精神，说经讨论，“多数皆以拥护中央，保存元首为宗旨，是退位问题，已属无可讨论”。不仅如此，通电还把冯说成是主战派，强调在他的提议下，代表已形成共识，为求和平，“非先以武力为准备不可”，回去后即行整军备战，西南各省若一意孤行，“即以兵戎相见”。这样他们便把本是讨论袁退位问题的会议，说成了是讨论对西南用兵的会议了。

南京会议开得稀里糊涂，最后不欢而散。但它却为袁赢得了时间。正是在南京会议期间，袁已命梁士诒赶筹军费，命曹汝霖以优厚条件向日本换取政治贷款。并拟定了一个

“征浙、定陕、固鲁”的计划。及张、倪通电发出后，北方主战空气上升，袁喜不自胜。赶紧电召张勋到北京商讨进兵西南问题，并命倪嗣冲到汉口组织征湘司令部。西南五省通电拒绝出席南京会议，冯国璋只好宣布结束会议，保境安民。而袁却气焰愈张。5月29日，他以大总统的身份发表《宣布帝制案始末》，进而把改变国体的责任推给各省公民，而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这是他准备对西南大举进攻的重要信号。

北洋集团内部早已四分五裂，袁能否组织起这场新的军事行动，固然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这位野心家、独裁者，内外交困，力心交瘁。死神已向他招手，也实在没有时间容他再作恶了。

独夫民贼之死

袁世凯虽然一向身强体壮，精力过人，但毕竟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云南独立后，他陷于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境地，为应付时局，疲于奔命，心理压力太大。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健康。袁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说：“我父亲的生活习惯，在这个时期里也同样有所改变。我们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容，而是比较紧张。……他的‘洪宪称帝’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反对。他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压力为他致病的主要原因。”这是比较客观的说法。

但究袁起病的直接导因，却是其心腹四川将军陈宦的宣布独立。辛亥革命起，陈先归黎元洪，为参谋次长，并入京

代黎元洪执行总长职权。由是复投归袁世凯，为之出谋划策、深得宠爱，遂成洪宪帝制中的重要人物。袁特命陈为四川将军，替他坐镇西南，监视滇黔楚。陈临出京时，进谒袁，伏地九叩首，且膝行而前，嗅袁的脚，说：“大总统如不明岁登极，正位中国，陈宦此去，死都不回。”袁大受感动，曰：“一切照汝策划，决正帝位。”陈这才站起来。时曹汝霖在场，心鄙之，事后对人说：这种嗅脚礼，只有中世纪欧洲人见教皇时才行的。陈宦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能这样做，真是无耻之尤！

一个人甘卑躬屈膝媚事他人，必有所图，因而也是最靠不住的。陈宦正是这种人。他在四川见护国军起、袁大势已去，便极力与蔡锷等人通款，另谋出路。5月22日陈致电袁，宣布四川独立，这是对袁独立的第7个省，其电文说：“……项城所谓退位云者，决非出于诚意。……宦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陈的这封宣告断绝关系的电报到时，袁正在吃馒头。每个馒头切为四，梁持电报进来时，已食其三，袁问梁，情况如何？梁说不会有什么事，袁乃吃下第四块馒头，与梁同阅来电。袁便拂袖而起，他没想到自己最新提拔和最为信任的人，竟也背叛自己。这对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两颊泛红，精神恍惚，喃喃道：“二陈厚爱我若此，夫复何言！”遂病。

一周后，袁所信任的另一员干将湖南将军汤彦铭也被迫宣布独立。消息传来，又一次使袁感到“人心已变”的痛楚，

若雪上加霜，病情加重了。由于袁病倒时正赶上陈宦、汤芎铭及陕西的陈树藩先后打来独立电报，故时人揶揄说，袁最后是喝了一剂“二陈汤”（中药名）送命的。

袁致死不肯放手权力。病中他每天仍要举行榻前会议处理公务，其后病情变化，便叫袁克定在榻前主持会议。

袁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时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请西医诊治。罗瞎子、王神仙一类草药医生，也来奉药，延误了时日。到最后几天，不能吃，不能尿，生命垂危，在克定的坚持下，终于请了法国医生卜西尔，确诊为尿毒症。但病入膏肓，虽力图抢救，为时已晚。

袁自知不起，电请老朋友徐世昌到京来见最后一面。6月5日，徐匆匆赶到了袁的榻前，只见袁仰卧床上，面无人色，危在旦夕。他与袁交谊40余年，今日亲见袁“英雄末路”的惨状，不禁老泪纵横，心中为之惋惜。袁看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菊人来得正好，我已经不中用了，……”徐在床头俯下身来，安慰说，“总统不必着急，静养几天，就会好起来的。”袁欲言无语，只摇摇头，便闭上了眼睛，两行泪水自眼角滚落下来。

袁陷入了昏迷。卜西尔为袁打了一支强心针，才又慢慢苏醒过来，口中喃喃道：“是他害了我。”“他”指谁？是指儿子克定，还是指筹安会六君子，抑或是指北洋部属，无人知晓。时袁托孤的四个人，即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徐世昌都在场，还有袁克定也站在榻旁。徐见袁要不行了，赶紧趋前轻声说：“总统有什么话要交代吗？”袁上气不接下气，

费了很大劲才说出“约法”两个字来。在场的人都摸不到头脑。《约法》有新旧两种，旧《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接任，可它已被袁废止了；新《约法》是袁自定的，关于总统继任问题，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预先写下名单，藏在金匱石屋，待总统死后当众取出，在三人中决选一人为总统。

正当众人茫然无措时，袁克定提醒了一句：“金匱石屋。”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再口头看袁，他已说不出话了。

6月6日清晨，袁世凯这位一生追逐权势的独裁者，终于撒手尘寰，享年58岁。

袁死后，众人打开石屋，发现总统继承人名单上面依次写的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第三人原先写的是袁克定，袁病重时临时改过。他知道家天下已属虚妄，不如送个空头人情。

7日，袁遗体大殓，头带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俨然一个“大行皇帝”的模样。徐世昌、段祺瑞出席了在怀仁堂举行的大殓礼。礼甫毕，袁妻妾及子女环跪痛哭，要求徐段二人担保袁氏家庭将来的安全。二人反复劝说，并愿担保绝无安全问题。众人始哭哭啼啼退去。记者伤感地报道说：“当时情景非常凄切，雄才大略的袁项城，当亦未必逆料及此也。”

同日，国务院通令全国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员停止宴会27天。政府公致赙仪100万元。

31日举公祭，段祺瑞代表继任总统黎元洪主祭。仪式极

为铺张。

与北京当局的作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西南独立各省于袁人殒这一天，张灯结彩，燃放鞭炮，以示庆贺。全国人民也为独夫民贼之死，拍手称快。记者报道南京情况说：“一般人民心理，以为袁氏一死，满天云雾消散，……从此永享和平幸福，皆喜形于色。”

北京政府“国葬”袁世凯，固然反映了官方尤其是北洋集团对袁的“褒扬”，但社会公正的舆论却反其道而行之，无不斥之为大盗窃国者，以为袁身败名裂，无非自取灭亡。

尤可耐人寻味的是，教育家黄炎培在袁死去的当天，即1916年6月6日，发表了《吾教育界之袁世凯观》一文指出，全面评价袁氏不妨留待史家，但仅从教育界的视角看，于袁氏的败亡也当引出以下的“大教训”来：

- 一、道德不灭；
- 二、不道德之势力必灭；
- 三、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之行为必败；
- 四、其知识不与其地位称必败；
- 五、欲取大巧适成大拙；
- 六、欲屈天下人奉一人，必至尽天下人敌一人；
- 七、以诈伪尽掩天下人之耳目，终必暴露以强力禁遏天下人之行动，终必横决；
- 八、以不正当之方法诱致人于恶而不悟人之即以其道诱致之恶，以底于败且死；
- 九、尽其力以图无道德，其结果资以证明道德之不可得而灭。由是观之，袁氏何人者，被盖牺牲其一生之功业名誉

与其性命，亲以其身为道德试验品，而昭示人以至明显之结果，俾永不复须第二次之试验者也。”

黄炎培还呼吁，定6月6日为“道德纪念日”，以“昭其青年毋忘此民国开基大教训”。

单从道德批判的角度评论袁世凯，当然是不够的；但仅就黄提出的9点“大教训”而言，无疑又是十分深刻的。袁世凯从此成了阴谋家、野心家、大盗窃国者的代名词，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北京当局对袁的评价与国人大异其趋，又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它说明袁氏虽死，阴魂不散，想继承其衣钵者大有人在。所以，袁死后中国并未出现国人所热望的政治清明，安居乐业的时代，相反，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割据纷争，愈加黑暗的年代。